

资本精神

卢德之

目录

序言：为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重塑经济伦理——谈卢德之

王松奇

导言：寻找市场经济的灵魂

第一章 资本精神和资本主义精神

第二章 中国资本和资本精神的早期历史简读

第三章 创造财富的神圣激情

第四章 创造与超越

第五章 创造与再创造

第六章 实践：企业、企业家与社会

第七章 实践：中外慈善思想与慈善事业发展

第八章 资本精神与 21 世纪中国

后记

序言：为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重塑经济伦理

——谈卢德之

卢德之博士是个有着丰富从政和商业经历的实践者。前不久，他把自己的悟道心得《资本精神》书稿拿给我，让我提提意见。因为5月份是博士论文答辩的高峰期，6月份也有较多的出差和活动，所以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得以“交差”。

在对《资本精神》进行了逐字逐句的阅读后，我发现：对这本涉及了哲学、历史、宗教、伦理学、经济学及企业管理学等诸多内容的书稿进行评论实际上已超出了我的知识结构范围，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我已深深地被这本广征博引、妙语连珠的新经济伦理宣言式的著作所吸引。

卢德之博士从博览群书深刻思考和自身成功的商业实践中总结出了一整套理论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资本精神”的概念。显然，在他对“资本精神”的系统阐释中可以看出，他已跳出了以法人资本为分析对象的传统理论中所谓“人格化资本”的冷冰冰的伦理批判分析而转向以自然人资本为分析对象、以进取、节欲、积累、发展、行善为行为特征的“资本精神”的赞美性分析。甚至，他还从“资本精神”这一新概念出发进一步诠释了马克斯·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并试图在这两个“精神”之间搭建一座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逻辑桥梁。从这本书的内容说，它实际上已经涉及了：生生不息的人类社会何以会创造出今天这样辉煌的物质文明？资本主义社会早在十九世纪就已“敲响丧钟”（马克思语）但为什么现在仍然生机勃勃并在20世纪与以计划管制经济为特征的社会主义传统制度的竞争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中国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在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为什么几次业已站在商品经济门口的中国没有推开这扇社会发展之门，不仅没有推开这扇门，而且还随手扔掉了开启这扇门的钥匙？基督教文化体系和儒教文化体系在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演进过程中发生的作用到底有那些不同？中国的企业家怎样在财富追求和财富积累过程中以至善为核心价值观加强自己的道德积累？等等。所有这些重大而又饶有兴味的牵涉哲学、经济学、史学、伦理学的问题，卢德之博士在这本《资本精神》中都进行了深入思考和

探索性回答。

本书的写作初衷不是学术和理论，而纯粹是一本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中成长起来的有知识、有理想、有市场成就、有道德情操、有社会责任感、有民族复兴抱负的新一代中国企业家文化代表人物的精神宣言。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上，由于封建社会的持续时间过长，因而，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制度的真正转型期只发生过五次。第一次是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转化，发生在夏商之交；第二次是春秋战国之交，奴隶制时代转向封建制时代；第三次是辛亥革命及 1919 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封建时代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层面开始向半封建、半资本、半传统、半现代的方向转化；第四次是 1949 年中国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后用“一边倒”学苏联的路线将经济强制过渡为以计划统制和公有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第五次是邓小平在 1978 年领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摒弃了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走向以融入全球化和市场导向为改革目标、以混合经济为基础的新发展道路。应当说，历史上每发生一次制度变迁都会产生新生产方式的代表阶级或社会阶层。可以认为，在本次经济转型中，混合经济体制新出现的代表者就是众多的民营企业企业家，而最大的社会受益群体则是散布于各种行业职业中的中产阶级。这两部分人会变成党的改革开放路线的最坚定拥护力量。

但是，也应该看到，伴随着经济转型和三十年发展的巨大成功，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文化价值观的提升速度远远滞后于财富数据的变动速度，除了政府官员利用权力寻租、民营企业通过造假赚黑心钱这些原本就属于违法和败德的现象外，许多企业家和社会新富阶层的人在钱袋鼓起来后出现了普遍的精神空虚和信仰迷茫也是不争的现实。中国自古就有轻商抑商的传统，现在由于社会贫富分化严重，许多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阶层出现强烈的仇富情绪自然也合乎规律。怎样将中国建成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我想，政府要做的就是制度供给和官员的廉洁自律；企业家要做的则是象卢德之博士所说的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去拼命地赚钱，通过研究全球化和市场经济规律尽快地做大做强，赚了钱以后以感恩的情怀时刻想到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通过慈善捐款等形式扶助弱者，回馈社会，在“至善”人生目标的追求中做一个“讲责任、讲义气、讲原则”的优秀企业家。我相信，中国如果能产生一大批卢德之博士、李光荣博士这类具有“资本精神”和“三讲”特质的新企业家，全社会的仇富情绪肯定会缓解消解许多。中国的新兴企业家阶层在追求财富积累的过程中同时注重自己的道德积累，对建设和谐社会做扎扎实实的贡献，也就是为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目标做贡献。

王 松 奇

2007-7-2 写于北京

导言：寻找市场经济的灵魂

经过近 200 年的反复，21 世纪的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的形式、文化、思想和精神，主要发生发展于欧美国家，因此，有必要先对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基础和来源，进行认真的考证和探究。我的这种研究，是在大量实际经验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每一个论点，都浸透了我们在市场经济海洋中摸爬滚打的汗水和泪水。

为了便于梳理这些成果，我特别提出“资本精神”这一新的范畴。这里所说的资本精神，是一个用于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长精神思想基础的专门概念，特指资本形成、发展的各种行为动机和这些动机背后的道德精神。这类动机具体化为：资本形成、增长所必需的对于财富的渴望和对效率的追求；为增长而积累的动机；专注和持久的职业精神；理性与节俭的生活；诚实守信；财富属于社会也应当用于社会的思想，等等。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资本就是增长，就是发展，发展的愿望就是资本精神。

资本精神呈现以下特性：一是革命性。这是由资本的特性决定的。资本就是发展，这种发展的意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发展必然要突破所有的守旧性障碍，勇往直前；二是人文性。资本精神的发展一方面具有历史的阶段性，同时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在整个过程中它的主体是人，人为资本精神之本；三是资本精神的民族性，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经济无国界，资本无国界，但资本精神仍然是有民族界线的，它保护和发展的的是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

必须强调，本书还不是规范的学术成果，甚至称不上有学术意义，但是它基于实际的经验，饱含真诚的希望。这是一份我自认为表达历史责任感的答卷，也是我对于如何使我们的文明由稳定导向转变为发展导向的思想宣言。

我国对于市场经济形态的引进和学习，已经有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显现出来。对于在市场环境下成长的中资企业和企业家们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已不再是如何积累资本，如何找钱找项目，而是要找寻、探索一种支持中国市场经济的精神，找到中国企业家应具有的靈魂，找到我们发展动机中的道德支柱，找到使中国企业成长壮大推动财富不断涌流的精神源泉。否则，真正的世界性大企业就难以出现，出现了也难以持久，国家进一步的发展难以为继，甚至出现发展停滞或社会动荡。我所说的资本精神，就是这种能够成为指引我们的企业长期持续发展的灵魂

的那么一种精神。有没有这种精神，决定着中国市场经济能否由“远离均衡状态”转变为“接近均衡状态”，并使这种趋势长久地继续下去。¹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在 13 至 14 世纪之间首先出现于意大利半岛，几百年之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这个概念。资本主义之所以兴起于西方世界，除了那里具有物质因素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源于西方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在起作用。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即合理地、系统地追求利润，再以合理的方式处置他们的道德态度。要是没有这样一种精神，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不可能的。仅有世俗的动机如赚钱的欲望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超越世俗理性的精神力量。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抑制人贪图享受的本能冲动，造就一种将劳动和事业当作人生目的的全新工作态度。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意义比资本主义的物质前提，如资本原始积累更为重大。

十六、十七世纪，西方企业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与封建地主的竞争中，他们不仅取得了经济优势，也取得了道德优势，并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全力积累资本加克制消费欲望。即通过积累资本取得了经济力量，同时通过禁欲行为取得了道德力量。世界上

¹有关“远离均衡状态”和“接近均衡状态”，参阅乔治·索罗斯《开放社会》中文版第 126~127 页。王宇译。索氏的均衡理论认为，所谓开放社会为接近均衡状态，封闭社会为静态非均衡，革命活动乱为动态非均衡状态。

大多数的大企业家都产生在美国、德国这样的国家，从近代的洛克菲勒，福特到当代的比尔盖茨，巴菲特。我们谈到美国的时候，多数人看到的只是他们的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体制，三权分立，很少有人看到这种东西背后的最根本的东西：那就是基督教的文化价值观。基督教，特别是其中的新教禁欲主义解决了两个根本问题，一个它不竭地创造财富的动力，它创造财富不只为自己所用，其中绝大部分是自己所不需要的财富。这在中国传统文化是“勤”。第二，有极多的财富而又甘愿过最俭朴的生活，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讲的“俭”。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勤俭”这两个字早已有之，《尚书》中记载：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唐代诗人李商隐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但是中国的古人们却没有将勤俭进行经济哲学上的价值升华。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的引进和学习是极为重要的，但规则并不是万能的。没有精神的规则肯定没有生命力，因此，我们必须找到市场经济活的灵魂。当然，资本有共性，民族有差异。¹如果我们把基督教的思想简单的引过来的话，肯定会水土不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那就更不好说了。但我们确实有责任要找到这样一种精神：第一，激励人们以不懈的努力去创造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第二，他赚的钱主要不

¹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在不同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发生作用的方式，里亚·格林菲尔德在《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一书中有精彩描述。欧洲当代经济学家托尼在分析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时，曾经指出清教主义在英国“水土不服”的情况。《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4 年出版。

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为了一个他所高度认同、认可的神圣的目的。借用一个广泛流传的清教徒的说法，就是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的目的而花钱。这是一种神圣的精神。这种精神的神圣性，表现为人和社会对于增加财富、为神圣目标使用财富的极其强烈的欲望和激情。挣钱、省钱、挣更多的钱并把钱为神圣的目的而花出去变成一种欲望，一种激情。我把这种精神称之为资本精神。大家请注意，清教徒所说的这三个拼命，在我看来是有顺序的：首先是拼命的挣钱，其次才是拼命的去省钱，若没挣钱，你怎么去省钱。最后才是拼命的为神圣的目的而花钱。探讨这种精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一项非常神圣的职责。这种精神到哪里找？一要到人类最优秀的文化宝库中找，包括基督教；二要到中华文明瑰宝中找；三到市场经济伟大实践中去找。研究、倡导这种精神的意义在于找到一个改良土壤的武器，几千年的儒家文化把我们这块土地变成了工商业的盐碱地，我们现在要造就一种工具来改造它，我找到的就是我所称的资本精神。在资本精神的引导下，使穷人变成富人，使富人变成好人，使经济科学发展，使社会和谐发展。可以说，提出资本精神，在强调经济发展目标的同时，也强调企业、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是我们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的结果，也是我们对市场经济基本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果。

马克斯·韦伯是第一个积极宣扬资本主义精神的学

者。20 世纪初,他发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提出:西方经过宗教改革形成的新教,尤其是从荷兰、德国和美国的新教徒孕育了一种“资本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²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如何成为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精神基础呢?

首先,新教伦理以宗教的方式确认了正当追逐财富的合法性。经典经济学中著名的“马太效应”就出自圣经。新教伦理视合理地追逐财富为上帝的意愿,肯定了赢利活动的合法化,使西方社会走出了视“赢利冲动”为罪恶的中世纪传统宗教伦理的禁锢。

其次,新教伦理在主张合理追逐财富的同时又强调合理限制消费的必要性,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资本积累。“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

第三,最具有实践意义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把“为上帝努力赚钱”和“把所有的钱分给穷人”同时作为上天堂的条件,既使经济增长保持强劲动力的动力,又使社会在经济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保持和谐。现在看来,要实现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解决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

² 里亚·格林菲尔德认为,韦伯把经济的发展取向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而把定向于发展且有能力发展的经济称为“资本主义”。这使得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定向于稳定而牺牲发展的停滞型经济特征有了新的观察点。相关论述见《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一书导言。

新教伦理哺育了近代西方企业家的崛起。从资产阶级的产生看,新教伦理使他们不仅获得了追求财富的合法性,使其聚财活动受到“上帝的恩宠”。从工人来看,它使工人认为劳动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是获得上帝恩宠的惟一手段,从而使其变成了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从劳资关系看,它实现了雇佣劳动的合法化,“把雇主的商业活动也解释成一种天职”。也正是上述一系列条件的具备,提供了企业家崛起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心理基础,使新的经济人应运而生。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思想,从一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批评。但是 150 年来的历史表明,他的理论中的核心内容,具有不可摧毁的正确性。

我们所说的资本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明显差异:从时间上来说,资本精神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就存在,在古希腊、古巴比伦、古代中国,我们都能发现他们的痕迹,而资本主义精神是人类在一个特定阶段对资本精神的历史自觉;从空间来说,资本精神存在于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都普遍存在,从秦、汉帝国到罗马,从阿拉伯人到英国人,从伊斯兰教到新教,这种精神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从普适性来看,资本精神与超然的人类道德精神联系更为紧密、更为深刻,与公平、正义、善和良心相连,超越于肉体,超越于物质,超越于现世。

财富被创造的过程就是世界形成的过程,一代又一

代人对财富的渴求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催生了新的时代。有关财富的所有活动成为历史前进的关键因素。因为时代和社会条件的缘故，不同时代的人有着独特的创造财富的手段。从物物交换到货币的产生，再到贸易的发展，资本家和银行家出现。

我们必须承认企业家在创造社会财富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财富和财富的创造者必须受到尊重，同时企业家也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值得人们尊重。如果你的财富只是用来满足你自己的私欲，不管你有多少财富，人们也没有理由尊重你。个人或少部分人拥有过多的财富，而又不承担与财富相称的社会责任，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即便他所有的财富是合乎一般道德规范的。所以，企业家总是要把多余的财富以合情合理的方式拿出来，分给那些财富匮乏的社会群体。

企业家的道德要求要高于一般人，因为他要“自觉地”承担用自己的财富去帮助别人的责任。马克思曾引用过这样一段圣经：财主要进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意思是说人要舍弃大量的财富是极为困难的。³依照人性的常识，人们不愿意为别人创造大量财富。所以他们赚够了一定数目的钱就应该不干了，或者就把它们挥霍掉。因此，社会便失掉了一部分创造财富的动力。能赚钱的人不去赚钱，大家都会

³ 和合本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 19 章 23-24 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没有钱。如果他们赚了很多的钱又不愿拿出来一部分，或者就去挥霍，就会出现两极分化、资源短缺、社会风气败坏等问题。这些问题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社会的对立、分裂甚至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最终使大家都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这种局面显然是最坏的。财富是用来建造社会的，而不是用来毁掉社会的。假若有谁要用一种体制性、制度性安排直接去剥夺企业家的财产，他们就甩手不干了。社会就又回到了大家都没有，大家一起贫穷的局面。这等于把会下金蛋的母鸡抓起来炖肉吃了。所以，企业，企业家必须对企业负责，也必须对社会负责。同样，社会也必须为企业、企业家的创造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给他们以应有的保障和尊重。对于双方来说，尽管这不是一种完全出于利他主义的道德行为，但从实际意义上讲，却是对自己最有利的理性选择。

第一章 资本精神和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产生之前，资本主义的精神就已经存在了。他举例说，尽管富兰克林生活在手工业时代，但他已经是一个“充满资本主义精神”的人。⁴可见，他不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活动、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物，正如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一样。托尼在《宗教和资本主义的兴起》一书中也说，资本主义精神自古有之，并不是在清教出现之后才产生的。

这里所说的资本，仅指资本最基本的含义：个体创造的用于创造新财富的财富。资本是资本主义的基石，是个体发展的动机，是当时社会用来建设资本主义大厦的砖瓦等等。这里所说的资本精神，也仅指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的更原始、更个体化、基础更广阔的一种精神。我们提出这个概念，主要是为了更准确地说明中国的情况。我们的历史，没有发育

⁴马克斯·舍勒、松巴特等人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秩序的“第一原因”，但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与马克斯·韦伯所称的资本主义精神只有部分相同。他们大致把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称作“积极的资本主义精神”，指资本主义中的英雄成分，“具有王者气概的商人”。松巴特、舍勒等人认为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部分。真正的资本主义精神，是所谓“消极资本主义精神”，是指普通市民、小生产者对自身处境的不满和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的恐惧，如我们现在的人们对于贫困、疾病、衰老、社会不公正的恐惧。关于这部分内容，除可参阅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外，也可参

阅松巴特《资产者》和马克斯·舍勒《资本主义精神三论》。

出资本主义，但资本是有的；资本主义精神缺乏，但不一定缺少资本精神。

资本是可见的、具体的存在。资本不是资产。一片森林、一块土地都是资产，但不是资本。把一片森林、一片土地的出产卖掉，也不是资本。只有把这些卖掉产品的收入用于购买更多的森林、土地，或者购买设备、雇佣更多的工人，以获得更多的产品，才是资本。用于增长的资产才是资本，而其背后的动机就是资本精神。积累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积累的方式、规模，决定着什么是市民经济，什么是资本主义。

玉石如何成为资本？

资本产生的原始条件，是人类社会有剩余产品。如果人的产品只能满足原始状态的生存需要的话，就不会产生资本，相应的，也不会有政治。如果剥夺一个人的结果是被剥夺的人无法生存，权力就没有意义。中国文明发祥的标志是玉器的出现，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以玉器为标志。已经出土的玉器中有相当的部分不作为实用器物。这说明当时的生产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剩余。玉器大概可以作生产水平和能力的物证，但还不能直接作为资本出现的物证。《史记》中关于玉的用途的最早记载是在《五帝本纪》中。舜继尧位之

后，就曾用玉来观天象，测天意，定法度：“舜乃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玉的第二个用途是颁发给诸侯做权力授予的信物：“揖五瑞，择吉月日，见四岳诸牧，班瑞。”⁵可见，玉尽管可以证明尧舜时代有了很高级的剩余产品，但它只是政治权力的凭证，不大可能用于交换，成为可以增长的活的财富。当然，玉石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和资本过程发生联系。

有剩余产品是产生资本的条件，但剩余产品不等于资本。资本只是一部分剩余产品或者劳动。统治者把贵重的玉石用来作为政治符号，一般不会产生资本。但如果他是向原来开采、加工这些宝石的人买来的，那就可能产生资本。这里的第一个问题是价格，买玉石的人不管政治地位有多高，必须有合理的出价，是一个等价交换行为，而不是作为赋税或者奉献。

价格是如何确定的呢？这就出现了第二个因素市场。货物的交换平台是市场。参与的各方都要有剩余的、用于交换的货物，这就是商品。参与交换的各个方面是平等的，可以自由选择交换的对象和条件。如果没有这种平等和自由，那就不是市场，而是剥夺或者掠夺了。价格就是交换的一般条件。价格形成的原始条件，一是有多个同类商品供应者。如果只有一个供应者，需要的人便没有选择的自由，只能由他一口价了。二是各个供应者地位平等，都不享有特权，交换

⁵ 班，同颁；瑞，同圭，宝玉。

完全由当事双方自主决定。三是买卖双方都有必要的关于交换物品、竞争者的信息。如果玉石是在上述条件下，以双方接受的价格成交了，这就是一次公平的交易，一次平等的市场行为。

如果，那个拥有玉石的工匠，在和某个王室作了“平等”交易之后，换回了一大笔钱。他清偿了所有的债务，生活也大为改善，再剩余的钱该怎么办呢？第一，他可以去盖房子、买够三辈子吃的粮食等等，还可以纳妾养孩子、花天酒地、买绫罗珠宝。第二，他去买一块更大的矿山，扩大开采和加工玉石的规模，生产更多的玉石产品。这就是投资了。在第一种情况下，财富是静止的，用完了就没有了。在第二种情况下，财富成为会生长的种子，成为会带来增长的财富——这就是发展的细胞。这种用于增长的财富就是资本，谋求增长的动机就是资本精神。

资本精神源起——雅各如何得到他的羊群？

照圣经《创世纪》29～31章所述，以色列人雅各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年轻时他的父亲要他到他母舅拉班那里，娶拉班的女儿为妻。雅各在拉班那里为他放了二十年羊。用七年的工价娶了拉班的女儿利亚，又用七年的工价娶了利亚的妹妹拉结，再用六年的工价换回了他为拉班放牧的羊群的一

部分，有了自己的羊群。

雅各的婚姻、子女和财产都是以交易的方式得到的。雅各付出的是艰苦的诚实的劳动：“我在你家这二十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过；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着，我常是这样。”⁶通过二十年的工价，雅各与拉班交换得到了两个妻子和一群羊。他把妻子和羊群作为资本，让他们都努力生产，又得到了五个儿子和更多的羊群。“于是雅各极其发大，得了许多羊群、仆婢、骆驼和驴。”

现在我们就来看雅各积累资本、发展经济的动机。第一个动机是爱情。雅各爱拉结。“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着七年如同几天。”⁷但狡猾的拉班在新婚之夜，用拉结的姐姐利亚掉包。说要娶妹妹拉结，先要娶她的姐姐。而要娶拉结，就还要做七年苦工。雅各为了得到自己所爱的女子拉结，又为拉班做了七年苦工。

如果爱情是雅各的全部动机，那么得到了拉结，投资的动机就不再存在了。但实际上雅各的经济扩张活动一直在继续。他的产业中，妻、妾、子都在增长，羊群在增多，还有了骆驼和驴等等。这种蓬勃的增长热情，就来自第二个动机：

⁶ 和合本圣经《创世纪》31章38~40节

⁷ 同上，29章20节

家族的使命。

在雅各动身前往外祖父家之前，他的父亲以撒嘱咐他说：“愿全能的上帝赐福给你，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族，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使你承受你所寄居的地为业，就是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地。”⁸这是一份兼有灵俗两种元素的祝福。子女、土地、民族是属世界的，神的赐福是属灵界的。这使雅各的产业发展不但承担家族使命，而且有了神圣的意义。神所代表的是超越于世界的生命。

世俗财富的意义附属于生命。生命没有了，财富的意义也就没有了。雅各从父亲那里领受的是家族的使命，是去使神的赐福实现为世界的产业，从母亲利百加那里领受的则是得到新的生命。

雅各的哥哥是以扫。以扫先是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雅各，雅各又在母亲的帮助下，用诡计得到了父亲的祝福。以扫心里怨恨，要杀雅各。他们的母亲利百加知道以扫的企图以后，叫雅各到舅父那里躲避。在母亲来看，这关系到她最重要的两个生命。

除了两个儿子的生命以外，还关系到他们的母亲利百加的生命。“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犹滴，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实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⁹利百加就对以撒说：“我因这赫人的女子，连性命都

⁸ 圣经和合本《创世纪》28 章 3~4 节

⁹ 同上，26 章 34~35 节

厌烦了；倘若雅各也娶赫人的女子为妻，像这些一样，我活着还有什么益处呢？”¹⁰所以舅父的女儿、雅各的妻子不但承载着爱情、家族的使命，是神赐给亚伯拉罕产业的产业，而且是一种新生命。

神所代表的超越不仅是雅各努力积累财富、创建产业的最深刻的动机，而且是他的产业的保障，是最高的道德体现者，是他的勇气、忍耐力和智慧的来源。雅各和他的妻子们，带着他们的财产，准备从拉班那里逃离时，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神圣的。雅各的妻子们显然在神和父亲之间选择了神：“上帝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的一切财物，那就是我们和我们孩子们的。现今凡上帝所吩咐你的，你只管去行吧！”¹¹在拉班准备追回雅各和女儿，夺过他们的财产时，神出现了，警告他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¹²上帝对雅各的创业活动和他的产业进行了有效的保护。他对拉班说“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的苦情和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¹³拉班和他的儿子们只好认可与雅各的交易，让雅各把女儿和羊群都带走。在这里，权力对交换规则的破坏，由于受到神的保护，使规则得到维护，正义得到伸张。

雅各的羊群，包含了资本精神的所有基本元素：获取财

¹⁰ 同上，27 章

¹¹ 圣经和合本《创世纪》31 章 16 节

¹² 同上，31 章 24 节

¹³ 同上，31 章 42 节

富的神圣动机和激情、毅力和忍耐力、诚实劳动、信守诺言、对代表超越能力的神的畏惧、遵守和机智利用规则、节俭、重视家庭和后代。圣经时代早期的代表人物都是富有的，如诺亚、亚伯拉罕、雅各、约书亚、大卫、所罗门。圣经中当然也有穷人，但主要的是富人。

人的富有是上帝所赐，也是上帝所愿的：“上帝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¹⁴圣经把后代的养育和地球的各种物质都看作上帝的产业，而人则是上帝产业的管理者：“上帝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¹⁵所以新教徒把世俗的获取财富的努力，解读为实现上帝对人的恩典，是对上帝的荣耀时，有充分的来自圣经的依据。

大家都知道，经济学中的马太效应来自圣经中的《马太福音》：上帝要出门了，叫了三个仆人，一个给了五千块钱，一个给了三千块钱，一个给了一千块钱。上帝回来了以后，要汇报了，给了五千块钱的人赚了五千块钱，一共一万块钱，很诚实交给了上帝；给了三千的人，赚了三千，一共六千给了上帝；唯独给了一千块钱的人说：你走了，我把这个钱埋在地下，还是一千块钱。他也诚实的把钱交给上帝。上帝说：

¹⁴ 圣经和合本《创世纪》1章29节

¹⁵ 《创世纪》1章28节

你不知道我的钱不够吗？我要行善天下。上帝就把第三个仆人的钱交给了第一个仆人。上帝是要钱的，而且是最精明的老板：“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去，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在那里并要哀哭切齿了。”应当注意，所谓马太效应是一个资源配置问题，而不是产品分配问题，意思是把资源优先配置给最有效率的财富创造者。

圣经还有一个骆驼穿过针眼的故事。有一个青年财主跟耶稣说，你怎么不带我进天国啊，耶稣说你把你所有的财产全都卖了，分给穷人，你跟着我走吧。这个财主觉得自己好不容易挣那么多钱，心里不免犹犹豫豫。耶稣就告诉门徒：这个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

这两个故事似乎很矛盾。一个要去挣钱，另一个说有钱人很难进天国，那为什么还要挣钱呢？它实际上要讲明的道理，就是你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挣钱，因为那是向上帝证明你的能力，你所赚得的钱都是归给上帝的荣耀。你挣的钱，无论多少，都不是你的，是上帝的。如果你舍不得自己的钱财，就证明你的努力不是为了荣耀上帝，你就进不了天国。上帝知道人不能摆脱肉体欲望引诱，而且为此痛心疾首。穷人想贪婪而不可能，所以圣经中讲人的悖逆、背叛，讲天国的门是窄的，主要是对富人讲的。在《传道书》中，上帝通过所罗门的口告诉人们：“贪爱银子的，不因得银子知足；贪爱

丰富的，也不因得利益知足。这也是虚空。”¹⁶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祸患，就是财主集聚资财，反害自己。因遭遇祸患，这些资财就消灭；那人若生了儿子，手里也一无所有。他怎样从母胎赤身而来，也必照样赤身而去；他所劳碌得来的，手中分毫不能带去。”¹⁷ “货物增添，吃的人也增添，物主得什么益处哪？不过眼看而已。”¹⁸

这两个故事及相关的教训，包含了资本精神的两个主要内容：为了上帝而努力创造赚钱；然后按照上帝的要求，把所有的钱还给上帝的其他儿子——穷人，那都是你的弟兄。

这就是资本精神神圣性的最初来源，即普遍地为增长而积累的最初的动机。

资本动机的另一道德来源

我们已经初步了解了资本主义和圣经的关系。我们所熟悉的另一种社会思想——社会主义的起源与基督教也有密切关系。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有着—位至高的独—真神。在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中心的山岗上，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神殿。安德利亚直接把他的理想国命名为《基督城》。早期社会主义这所构想的理想社会中，都有神的位置。近期

¹⁶ 圣经和合本《传道书》5章10节

¹⁷ 《传道书》5章13~15节

¹⁸ 《传道书》5章11节

的考古发现证明，在圣经时代，就有着一些实行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社团。这些社团可能是最接近使徒生活的犹太人后裔，也可能是最接近基督本身的人。¹⁹

社会主义思想早期的三位奠基人圣西门、傅立叶、欧文都是资产者。社会主义的产生，出于社会主义先驱者们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怒，而不是对资本或者资本主义的愤怒。社会主义的思想先驱曾经这样谴责社会的不公正：

“……现在的社会完全是个是非颠倒的世界。

这是因为国家把穷人应对富人宽宏大量作了一条基本原则，结果不得温饱的人，每天还要省出一部分生活资料，来为阔佬们锦上添花；

因为一些重大罪犯，即一些欺压全体公民并每年从他们身上勒索三、四亿法郎巨资的大盗，却在负责惩处违反社会秩序的轻微罪行；

因为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好逸恶劳和穷奢极欲是社会上的大人先生们的特点，而勤劳能干和节衣缩食的人却身居贱位，被他们当作工具使用。

“……各行各业都是由没才能的人治理有才能的人；在道德方面，都是由一些道德败坏的人去陶冶公民的操行；在分赃的法庭上，都是由重大罪犯去惩处犯了轻微罪行的小罪犯。”

¹⁹ 关于早期基督教社会主义社团——库兰宗团和艾赛尼教派，可以参阅最近的关于死海古卷的考古发现及其研究成果。关于社会主义的其他参阅文献：《乌托邦》，托马斯·莫尔著，戴镗龄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太阳城》，康帕内拉著，陈大维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基督城》，凡·安德利亚著，黄宗汉译，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圣西门对社会不公的谴责，不是对资本或者资本主义的谴责。相反，他把优秀银行家、商业家、农场主、工厂主，与优秀科学家、艺术家、工程师、技术工人等并称为“法国社会之花”。他说“精于有益劳动的出类拔萃的人物是奇才，而天地间奇才本来不多，尤其这类奇才更是凤毛麟角。”这位商业奇才兼卓越思想家当时深受“政治机体病了”的困扰，但他显然不认为资本、资本主义、资本家与社会不公有什么必然联系。这位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不是一个反资本的人。他所谴责的社会不公等等，与中国传统的“不患贫，而患不匀”的小农平均主义，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和内容。

社会主义的产生，与基督教有着深刻的关系，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参照系。资本精神中关于社会责任、诚实劳动、注重专业的内容，部分地来自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现代资本主义的许多基本制度，如社会民主和自由主义企业制度、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也部分地来自早期社会主义者的思想。

从资本到资本主义

²⁰ 见圣西门著《组织者》一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类，他没有把银行家、工厂主视为食利者，而是视为财富的创造者和社会有益的建设者。这与后来的社会主义有着明显不同。这一思想实际上为大多数现代社会主义者接受。可参阅《圣西门选集》，钱继大译，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

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出现的基本条件，是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基础，也可能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

资本是伴随城市和工商业的兴起出现的。资本的大量产生并集聚不会出现在农业社会。农业所产生的剩余是有限的，分散且缺少可流动的元素，所以作为资本的意义不大。事实上，在工业革命之前，不存在资本主义。布罗代尔说，那个时候“讲资本嘛，有。讲资本主义，没有！”

资本主义²¹是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还是在投入市场活动中的贵族中产生的？这实际牵涉到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

资本的产生是工商业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是资本的一种特别形式。资本主义就是大规模的资本集聚，大批大型工商业企业、跨国企业出现，日新月异的产业发展和层出不穷的产业创新，对市场的疯狂追逐等等。

大规模的资本集聚是资本主义的基础。这样的资本集聚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从谁的手里集聚资本；第二，谁来聚集，用什么方式聚集资本；第三，谁来使用这些资本，怎样使用。

相应地就有了这样三种人。第一种是大量的有富余积累的市民，他们想让自己的积累有所增值，又不愿意承担风险，

²¹ 布罗代尔认为明确提出资本主义范畴是二十世纪初由维纳尔·松巴特 1902 年在《现代资本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

就把自己的积累放到他信赖的金融机构里。他们有资本，但没有资本主义。第二种人是银行家、证券商一类。他们把市民们的积累集中起来，并向他们支付利息；同时他们又把这些钱大量借给资本家，并向他们收取更高的利息。第三种人是资本家，他们把钱大量从金融家那里借来，投资到各个不同的产业当中，把金融资本变为产业资本，从中赚取利润，并向银行支付利息，或向股民支付红利。资本主义主要是第二、三种人的事，但谁也离不开第一种人——没有他们，就什么都没有。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

在历史上，也有通过战争、掠夺、贩毒、海盗等形式形成资本的，但这不是主要方式，且多为 19 世纪之前的事实。国家的掠夺，一般不会形成资本。如日本使用中国的战争赔款进行军备扩张和国民教育。

在典型意义上，大量市民、小生产者、自由职业者、技术人员等等所谓中产阶级，是资本的来源，资本的提供者。银行家等，是资本集聚的实现者。对市民等资本提供者来说，他们是利益的来源；对资本家来说，他们是资本的提供者。

布罗代尔在《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中指出：“有两种类型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竞争性的、几乎是透明的；另一种是高级的、复杂周密的、具有支配性的。两类活动的机理不同，约束的因素也不同。资本主义领域所包含的不是第一类活动，而是第二类活动。”布罗代尔所说的第二类活动，

大致可以认为是指银行家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他认为这里才有资本主义。而第一类活动，只有资本，并没有资本主义，因为这和千百年来小商人、手工业者等等的致富方式，没有什么不同。尽管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只能到社会的最上层去寻找，但“一切都驮在物质生活的巨大脊背上。物质生活充盈了，一切也就前进了。”布罗代尔强调，“整体运动才是决定性的。一切资本的轻重大小首先取决于支撑他的下层经济。”从资本到资本主义，有着明确的分界，但又是一个整体，一个连续的过程。

资本主义的特征是高效率的产业发展、市场扩张和新技术使用。其中最活跃的分子是被称为资本家的企业家。资本家通常是发展和扩张的发动机，而市民常常既是资本集聚的来源，又是市场扩张的对象。资本积累和市场规模决定着资本家的兴趣；而市民阶层或中产阶级的规模和富裕程度，又决定着资本积累的规模和市场的规模。

从资本精神到资本主义精神

既然资本主义是两部分不同的人，分成两个不同层次活动，那么其背后的动机也会有所不同。一种是市民不断积累的动机，另一种是促使资本家不断进行大规模投资活动的动机。

一般而言，经济是一个冷静地、理性的、斤斤计较的过程，它不适合于那种精力充沛、积极进取、热情洋溢、目光远大、心胸开阔的人。令巴松特着迷的，正是那些“生物学和精神上都秉性甚高的”“实干家”们，是怎样和为什么心甘情愿地进入到商业活动中去的。“他们怎么会竟把自己那热烈的、伟大的、勇往直前的灵魂，献给了在古代和中世纪早期人类活动中大受鄙视的这一分支呢？属于英雄和天才类型的人，是怎样被推到其本质是清醒而连续的劳动和计算的这个领域里去了呢？”在欧洲的传统中，这种卓越的英雄式的人物，只能出现在政治、宗教、艺术、战争等超越个人的领域。松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的出现，是一批具有卓越品质的伟大人物，把自己的能力和热情投入到算计收入、赚钱这类完全是个人的小事情上，成为“有王者气度的商人”。这些人活跃在银行、证券交易所、政府机构和各种社交场所，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去寻找商机。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资本家的道德常常成为市民阶层批评的对象和不满的原因。那些积极进取又充满活力的人，对财富的欲望和对女人的欲望常常是同样强烈。松巴特认为，“性感不断高涨，并脱离整体情愫，变得不加选择，这恰恰是特有的资产者现象”。实际上，这种情况一般只出现在资本主义的早期。当资本主义秩序已经稳定，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成熟，资本背后的精神和文化开始引导社会，资产者成为一个稳定的社会阶层之后，

他们的道德和生活方式就会回到正常的轨道。

当资本集聚的规模，达到资产者个人的消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时，人就可以超越物质、欲望对人的束缚，宗教信仰、哲学、道德等对人的深刻影响就开始显现出来。一批最杰出的资本家，会用自己的难以想象的高尚行为，表现资本和资本主义精神中的更深刻的内容。人会从更广阔的视角看待自己的财产，在更大、更高的意义上使用财富，渴望自己的生命有更深刻的意义，“把财产给穷人”就成为一种对神的召唤的响应。

资本精神中的另一部分，即松巴特和舍勒所描述的“市民精神”，是更普遍，可能也更重要的部分。马克斯·舍勒认为不是野心勃勃的资本家，而是“心中充满怨恨的小市民”是形成资本主义精神的主体。因为“他们渴求最安稳的生活，渴求能够预测他们那充满惊惧的生活”，所以他们拼命地赚钱，拼命地省钱，然后把积累存进银行、买保险或者买股票，成为资本家手中源源不绝的资本。

这是资本精神，而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因为这是人类社会中古已有之，普遍存在，以后也将伴随着人类长期存在的。没有这种精神，资本主义不可能出现，更不能发展。这种小市民的、老百姓的、世代普遍存在的精神就是资本精神。雅各的增长动机和创业激情，是资本大亨和锱铢必较的升斗小民所共有的。它不是全部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是资本主

义精神大厦的基石和主要材料。市民的大量存在是银行家、资本家出现的土壤；资本精神则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土壤。土壤肥厚，且没有大的灾害，才能长成壮大的树。东西方都有孕育资本主义的土壤，但肥沃程度不同，灾害发生的程度、频率不同，所以资本主义首先出现于西方。

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精神的培育，是一个全民族的整体行为，甚至是全人类的整体行为。或者更广义地说，是文明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方式和基本内容。

第二章 中国资本和资本精神的早期历史简读

中国的资本发育并不晚于西方。《史记 管晏列传》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管仲治理下“通货集财，富国强兵”，通过商业发展而使国家富强起来。管仲本人集聚的财富，也达到了“富拟于公室”的程度。战国时代齐楚诸国的经济繁荣程度，应不下于当时富裕的希腊城邦。

中国的古代，可能有四次到五次机会走向资本主义。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一次是在西汉，一次在唐朝中期，一次在北宋。还有最后的，也是最有争议的一次是在明朝末年。但这些机会，由于当时的内外形势及一些偶然性的原因，都失去了。清朝从整体上是走下坡路，也可以看成是落到谷底后的转折。我们从资本成长和资本主义发育的角度，检视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应当是有好处的。

中国资本精神发祥

《史记 越王勾践世家》记载，春秋时帮助越王勾践复国的大夫范蠡，在灭吴之后，拒绝了勾践“孤将与子分国而有

之”的命令，“乃装其轻宝珠玉，自与其私徒属浮海以行，终不反”。范蠡不要勾践给他的半个越国，带着细软部下乘船出海到了齐国。在齐国，范蠡更名改姓，“自谓臯夷子皮”。他在这里“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齐国见他能力出众，就要他做齐国的国相。他不肯。又一次“归相印，尽散其财”，到了陶。陶是“天下之中，交易有无之路通，为生可以致富矣”。范蠡自称“陶朱公”，在陶“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据无何，则致货累巨万。”范蠡在越国是当官致富，在齐国是务农致富，在陶就是经商致富了。当官用了二十年，务农用了“几何”时间集聚数十万资财，而经商则只用了“居无何”时间，就积累了“巨万”资财。“巨万”应当是当时能够集聚财富的最大规模。

《货殖列传》载，到战国时，这种经商“巨万”级的富豪多在关中。所谓天下财富，关中“十居其六”。其中著名的有田氏、栗氏、杜氏、无盐氏等。

司马迁认为获取和积累财富是一种需要创造力和专业精神的活动：“富者必用奇胜。”他举例说：“田农，掘业，而秦扬以盖一州。掘冢，奸事也，而田叔以起。博戏，恶业也，而桓发用富。行贾，丈夫贱行也，而雍乐成以饶。贩脂，辱处也，而雍伯千金。卖浆，小业也，而张氏千万。洒削，薄技也。而邵氏鼎食。胃脯，简微耳，浊氏连骑。马医，浅

方，张里击锺。此皆诚一之所致。司马迁一口气列举出农、掘墓、赌博、沿街卖货、贩脂粉、卖水、磨刀、卖羊肚、兽医等九种作小生意而成为钟鸣鼎食之家的致富方式。这些都可称为“精简节约，慢慢扩展自己的行业、手工业或小买卖的小市民”，即松巴特所谓“第一代有名的粗人”。²²其他一些工商业门类，如冶铁、蚕桑、丹砂、铜业、盐业等，已经是全国性的、规模庞大的产业。这说明在 2000 年前，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中国的资本活动就已经是百花齐放的局面了。

司马迁所说的“用奇胜”、“诚一”都包含着现代商业智慧和商业精神。

战国时的另一位大商人白圭，《货殖列传》称他“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他的理财名言是“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意思是吃得越差，你的钱增加得越快；你买的种子越好，你的粮食就越多。在强调整俭、刻苦、克制贪欲的同时，他还强调对于商机的敏感和对财富的渴望：“趋时若猛兽鹜鸟之发”——见到赚钱的机会要像鹰一样猛扑上去。趋时，即抓商机，这是资本活动的特征。司马迁曾这样总结资本发生发展的一般步骤和形态：“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没有资本的

²²松巴特，也译作桑巴特、宋巴特。松巴特在这里描述的是前资本主义时期，约 13、14 世纪欧洲的情况。松巴特认为小市民与资本主义产生没有直接关系，但他又认为富兰克林用英语说说的一切，阿尔贝蒂在其《论发家致富》一书中早就说了。阿尔贝蒂是 14 世纪佛罗伦萨人，被视为市民精神的最早代言人。

人要靠体力劳动积攒财富，少有资本的人靠脑力竞争，资本丰足的人则靠捕捉商机。

战国秦汉时代，商战已经十分激烈了。所以白圭认为商业之精彩不逊于政治与军事，不是凡俗之辈可以领悟其奥秘的：“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以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以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白圭所谓取予之道，即聚财散财的学问。了解取予之道的人，才能说是仁者。范蠡“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两次把财产散给穷人，该是个践行取予之道的有德商人吧。取利而成仁，该是经商的最高境界了。

范蠡两次散尽千金，但子孙却生财有道。《越王勾践世家》说他“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致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一个散尽财产的人，却成了财富的符号；其子孙未得遗产，靠自己而得巨万。财富的聚、散、守，确有某种人类共同的规律。

转折点

范蠡由政治而转营农业，由农业而转营商业，都大获成功。另一个著名的大商人吕不韦走的是一条相反的路。

《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范蠡由政治起家而逃离政治，吕不韦却是由商业起家而热衷于政治投资。他的第一笔投资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子楚。第二笔投资是把自己已有身孕的姬妾献给子楚做了夫人，她生下的儿子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嬴政。于是吕不韦就成了秦始皇的生父，太后的情人，秦朝的相国，分封十万户。但是这个贪得无厌的政治投资商还不满足，继续进行他的投资，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找了一个“大阴（阳具）人”嫪毐介绍给太后，做太后的面首。嫪毐与太后又生下两个儿子，并密谋让他们的儿子继承皇位。阴谋败露，吕不韦自杀。

吕不韦的失败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吕不韦之后就再没有一个商人对于政治过程有如此深刻、积极和有效的参与。吕不韦死后二十八年，项羽率领诸侯攻入秦国，杀子婴，秦朝灭亡，汉代秦兴。汉初的政策是重农轻商。《史记 平淮书》载，高祖刘邦在位时，“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但在亲历目睹秦始皇的政治浪漫主义的悲剧结局以后，汉朝的统治者不能不转向现实，经济成为要务。

“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汉初对商业和商人还较为宽容，在发展农牧的同时，还能够容忍商业和商人，为了发展经济，连皇帝也带头厉行节

约。文帝世家载，汉文帝“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者，收恤孤独，以育群生”，“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

安定和平的环境有利于经济稳定发展，征战平息使大量财力转为民用，统一国家降低了地方之间的阻隔，促进了商业发展，也降低了行政成本。刘邦集团多出身下层，作风简朴，对民生疾苦较为了解。秦亡于严苛，亡于奢华，亡于好战。亡秦去之未远，汉人历历在目。强秦大厦一夜倾倒，这使得刘汉从一开始就处处反其道而行之。高后文景时期，对内轻徭薄赋，减宦官，放宫女，尊老恤幼。对匈奴和各藩侯的挑衅一再隐忍。《平准书》说，经过 70 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继位时，“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廩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致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闲成群”。

汉武帝继承了文景两代留下的繁荣，开始了他的文治武功。他即位几年之后，派严助、朱买臣收复东瓬，进攻两粤。派唐蒙、司马相如开凿千余里山路，打通西南夷，扩大巴蜀的地域。又派彭吴穿越秽貊、朝鲜，设立沧海郡。元光二年，就是汉武帝继位后的第八年，发动马邑之战，汉匈和亲关系断绝，开始了与匈奴的 50 年战争。战争耗费巨大，安置投降的匈奴也需要花费大量资财。《平准书》载，元光四年，卫青第二次出击匈奴，军事上大获全胜，经济上花费巨大：

“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俱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司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黄金重一斤，值钱一万。²³一万金，合钱巨万；二十万金，合二十亿钱。到汉武帝元光四年，也就是他即位十年时，文景时代积累下的国库已经用完。汉朝进入持续数十年的战时经济。

国库一空，而花费并不稍减。元狩五年夏，卫青、霍去病各率骑兵五万、步兵夫役数十万出击漠北，大败匈奴，到狼居胥山祭天而回。“赏赐五十万金，军马死者十余万匹，转漕车马之费不与焉。适时财匮，战士颇不得禄矣。”此时朝廷给将士的赏赐，也已经无力支付了。匈奴浑邪王率部族降汉时，朝廷派两万辆车去接匈奴人。官府没有钱，只好向老百姓借马。老百姓都把马藏起来。“上怒，欲斩长安令。”²⁴战争频繁，灾害不断。黄河连年溃堤，农业、漕运都受影响，赈灾、修河堤都需要大把花钱。在主管官员建议之下，朝廷开始卖官，允许囚犯以钱赎罪。

国家开始加紧经济控制，以集聚物力用于战争。《史记 平淮书》和《汉书 食货志下》载，在经济学家桑弘羊主持下，大盐商和铁业巨头被任命来主管财政，各地都成立了盐铁部

²³ 《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黄金之外有白金，为银锡合金。“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环之，其文龙，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直三百。”

²⁴ 此事见《史记》卷一百二十《汲郑列传》

门。“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商人做官来管财政，这是武帝时期的特别现象，可见汉武帝本来对商人并无恶感。

“浮食奇民与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羨，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大商人们作了官以后，就想垄断盐铁行业。他们不断在朝廷上发出的垄断的议论，利用新的政治身份，来获取和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对于私自煮盐冶铁的老百姓和小商人，处以严厉的刑罚。

商人的表现却越来越让大臣和百姓失望。国库空了，百姓越来越穷，但大商人却仍然富足：“于是县官大空，而富商大贾或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铁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桑弘羊和他所代表的巨商阶层没有解决战争财政问题，反而使大批商人进入官场，使整个商人垄断集团与越来越穷的政府对立起来，也和政治领域的传统优势集团——地主阶层发生尖锐冲突。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积极帮助国家的道德榜样——大地主卜式。这个卜式上书汉武帝，表示愿意把家产的一半捐献给国家，弥补边防费用的不足。卜式对皇帝的使者说：“天子诛匈奴，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有财者宜输委，如此而匈奴可灭也。”当时的丞相公孙弘认为他在说大话，有不轨企图，建议不要任用他，也不能拿这样的人作为榜样。一年多

以后，卜式又捐钱二十万救助移民。汉武帝想起了他，就任用他做中郎，并布告天下，让人们都向他学习。²⁵

政府和百姓都对商人不满意，“于是天子与公卿议，更造币以赡用，而摧浮淫兼并之徒。”浮淫兼并之徒，指骄奢淫逸，肆行兼并的商人。既然商人不肯为国家赚钱，就干脆铸造新币的办法来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也让商人们集聚的金钱贬值。结果当然是通货膨胀。由于在政府铸造新币的同时，官员和民间还大量偷铸钱币，金融的混乱就更加无法收拾了。开始铸造新币之后，由于私铸钱币而被判处死刑的就有数十万人。因为“犯者众，官不能尽诛”，只好把他们都赦免了。另有自首者百余万人，没有被发现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商人当然知道大量造新币的结果，便改集聚金钱为囤积货物。“商贾以币之变，多集货逐利。”这使官僚和地主集团更加愤怒。

整治商人更直截了当的办法是增加税收。新税只对商人征收，征收的办法是由商人向官府报告财产总数，再由官府按财产总数征收。据《剑桥中国秦汉史》，原来的税额大约是每一万钱的资产征一算，每算约一百二十钱。新税额为每两千钱资产征一算，制造商每四千钱财产征一算。而资产的折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事的官吏。

²⁵ 卜式的事迹见《史记》卷三十《平淮书》

《汉书 食货志》载，开始新税时结果并不理想。朝廷想出了新的办法：“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于是告缗钱纵矣。”“告缗钱”，就是鼓励人们告发瞒报了财产的商人，凡告发的人，可以得到没收钱财的一半；被告发的人，没收本金，罚守边一年。为了防止商人弃商务农，政府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儻。”商人不得购置田产，有违反者没收田地仆人。

当时负责推行“告缗钱”是杨可，负责审理此类案件的是酷吏杜周。“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氏皆遇告。杜周审之，狱少反者。”通过“告缗钱”，政府“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

政府因为向工商业课以重税，财政状况渐渐好转，便开始大兴土木。“自杨可告缗，上林财物众，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满，益广。是时粤欲与汉用船战逐，乃大修昆明池，列馆环之。治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于是天子感之，乃作柏梁台，高数十丈。宫室之修，繇此日丽。”

“告缗钱”对商人阶级的打击是灾难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商贾中家以上大氏破。”整个阶级都破产了。更重要的是积累资本的动机被摧毁了：“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臧之业”。不事蓄臧，无积累也。无积累当然就无资本。

工商业集团在于地主及官僚集团的对决中全军覆没，中

国走向资本主义的大好局面毁于一旦。历史在这里转向，中国走向专制、保守、封闭的农耕社会。

摧毁是彻底的。汉武帝元封年间，皇帝命百官求雨。卜式进言：“烹弘羊，天乃雨。”可见这个地主对这个大盐铁商的政治代表恨之入骨。汉武帝死后六年，桑弘羊被杀。²⁶

儒家的宇宙秩序如何阻碍资本和资本主义发展

我们说到中国资本主义发育时，常用的一种说法叫做“土壤板结”。不是没有土壤，但土壤板结了，长一些小草小苗还可以，树木就长不大甚至长不出。土壤是厚重的东西，我们在前面说的那些一时政策上的变化，某一两个商人的遭遇，还不能说就到了根本。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观念变了，人的脑子变了。

生活在汉代的商人和市民是很压抑的。不能穿华丽的衣服，不能乘车，子女不能做官，朝廷没有钱了随时加重税负。加税全没有一点章法，可以一下子加四倍。最可怕的是告密，有一半的商人都因为告密被没收了财产，还被送到边境去服劳役。如果你不堪忍受，买土地去种田吧——不可以，一经举报，土地没收，仆婢充公。这哪里是市民，完全是贱民。

²⁶桑弘羊及其所代表的盐铁官营势力，是政府通过大商人来垄断市场。这一政策受到中小盐铁商和民间的强烈杯葛，但大盐铁商显然在盐铁垄断官营中是获利的。汉代政府和大、小资本的博弈，具有相当近现代特征。桑弘羊被杀是一个有漫长历史回声的悲剧。

这就是汉武帝时期的现实。

汉武帝这个人，也很难说就是坏人。他用宫刑侮辱了司马迁，但司马迁还是写完了《史记》。你要是比较一下《史记》和《汉书》，就会有一些很有趣的差别。《史记》的《孝武帝世家》对汉武帝的记载，实在是很搞笑的。汉武帝的文韬武略、军国大事等等，一概付之阙如，从头到尾都是迷信活动：神君女仙、方术巫术、长生不老、拜太阳拜月亮拜山神，临死前三年还到东海上寻访神仙。这和《汉书》的内容完全不同。试问，汉武帝以后的人，有谁敢这样写；汉武帝以后的皇帝们，有谁能容忍这样的事发生？《史记》中有陈胜和项羽的传记，而且是正传，这种气度也是以后的皇帝们所没有的。与匈奴之战，是两国交兵，与战国、秦相比，无特别残暴之处，对来降的匈奴还可说是相当宽厚。军纪严厉，对违令者依律处罚，有过严之例，失察之例，但还不能说是普遍情况。

汉武帝的残暴事实，主要发生在晚年。天汉三年，也就是开始实行酒类专卖的那一年，御史大夫王卿自杀；匈奴入侵雁门，太守畏罪自杀。第三年，腰斩公孙敖。征和元年，发生巫蛊案。第二年，丞相公孙贺下狱死，两位公主因巫术案自杀。是年七月，韩说、江充称在太子处发现巫蛊，太子、皇后起兵拿江充，与丞相刘屈氂大战于长安城，死者数万人。皇后、太子先后自杀，御史大夫暴胜之自杀，司直田仁被腰

斩。第三年，丞相刘屈氂腰斩处死，其妻斩首。²⁷汉武帝的晚年，可以说是腥风血雨了。依据常识来判断，这位皇帝的精神已经失常，有阵发性迫害妄想狂症状。皇帝疯了，如何得了，何况汉武帝不是个普通的皇帝。一个人在“老子天下第一”的状态里搞了几十年，疯狂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根本就不是人的状态。用索罗斯的理论来说，这种状态“高度偏离均衡”。

春秋战国时代，天子弱而诸侯强，天子受诸侯制约，诸侯也受天子制约，诸侯之间也相互形成制约，文人商人们有游走回旋的空间。强秦吞并六国，天下归于一统。秦始皇成了老大，谁也管不了他了。有些书生想用道德伦理来约束他，所以有了焚书坑儒的举动。但秦始皇和秦朝很快就走到头了。汉朝继承了大一统，但刘邦时代四方不稳，文景时代休养生息，皇帝们还小心约束自己。到了汉武帝，天下太平，国库满满，兵精粮足，最重要的是当时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对大汉皇帝有真正的威胁，此正老子天下第一时。汉武帝知道自己已经得到了自己的前辈从未得到过的至高地位，这种地位甚至是亘古未有过的。但他还是对这种地位心存疑虑：真的没有什么更高的存在可以管“天子”了吗？汉武帝穷其一生都在找神，说明他对自己的地位始终怀疑。司马迁只记汉武帝的鬼神事迹，大概也是悟到只有鬼神才能管帝王，使

²⁷ 以上史实见《汉书》卷六《武帝刘彻》

权力无边的帝王们有所畏惧，有所约束。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果如此，司马迁的深刻足以穿透两千年的历史。

武帝继位时，汉朝的意识形态还很模糊。秦用法家而秦暴亡，法家不能用了。文景时代无为而治，予民生息，经济至上。汉武帝频频用兵，急需统一国家的意志和力量，黄老之学的迂缓与他急于建功立业的心理发生冲突。他接受儒家，起初应当是策略上的选择：法家过于刚硬严厉，黄老之学失之柔阔迂缓，儒家居于两者之间。他到后来完全接受儒学，正式把儒家奉为国家意识形态，则是汉儒们根据武帝的心理发展儒学的结果。

《汉书 董仲舒》载，“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任用大批儒生入朝做官，大兴儒学等等，都与董仲舒与汉武帝的册对有关。这些册对把孔孟的思想加以处境化，使其成为对现实的研判和指导。针对汉武帝有敬天敬鬼神的思想，董仲舒把儒家解读为天命的承受者，意图对皇帝有所制约：“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模糊地指出，天命是由“圣人”向“王”宣示的，所以“王”应当听从“圣人”的意见，谨慎地处理“人”的事情。

就一般的道德主张而言，董仲舒是主张行人道，行德政的，其册制言辞华美，不乏悲天悯人的情怀和伦理的光彩。

“天道之大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天之任德而不任刑”。儒家原典如《孟子》当中也有明确的民本主义。但儒家对人王的约束都是软约束，并不起实际的作用。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道是什么呢？“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即为君臣，就有高下之分了。既为人臣，即使是圣贤，也不能违背皇帝的意志，否则就是违背了“天下之达道”，就是不守本分了。到后来宋明诸儒更言明三纲六纪，人王更取代神成为宇宙间秩序的顶点。

汉武帝正式确立儒家为国家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有什么关系呢？汉儒以人王为四维的核心，宋明更以人君为宇宙的顶点，使社会失去推动发展的核心动力。帝王在董仲舒等人设计的国家结构中，有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有效制约的权力，因此他有权力便有一切，丧失权力便丧失一切，所以权力的稳固就是他的最高利益。儒家的思想的核心，正是以稳定的政治社会秩序为目标的伦理体系。天不变，道亦不变。天、道的载体在孔孟那里还模糊，更多的时候是指上帝或者圣人。董仲舒以后，这个“不变”的道，不是神之道，上帝之道，超越之道，而是人之道，帝王之道。人都是有限的，帝王也是人，所以帝王也是有限的。他拥有天下。江山稳固，他就一切都有了。所以他不需要发展，发展对他没有意义。

而资本的本质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就是发展主义。一个

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和主体意识形态没有发展的动机，在两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工商业都被视为“浮末”之业，商人、市民被视为政治、社会和道德贱民，当然就不会有资本的正常发育和集聚，资本主义之树也不可能在这种土地上成长。

资本的本性是个体的，它一般是个人长期的经营活动的结果，它既是欲望的结果，又是抑制欲望的结果；前者是创造的动力，后者是节俭的原因。资本是活跃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果，也是节制欲望的结果。资本天性是自由的，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有资本。儒家基本是一个农业社会，小农经济的理想，人固定于土地，然后形成君臣父子夫妇上下井然有序的理想社会。²⁸春秋战国时代，诸侯林立，相互割据，上人们和他们的货物，可以在列国间自由流动，诸子百家这样的学问家可以周游列国，纵横家这类政治权术家也可以出没于各个宫廷之间。在这样的条件下，甚至可以“商而优则官”——你生意做得好，说明你有能力，就来管理国家吧。所以出现了管仲、范蠡、吕不韦这样的大商人。当时商人并不受歧视，管仲等人也都曾掌握巨大的政治权力，成为著名的政治家。汉武帝以后，中国历史上就再没有出现这样的杰出人物了。二十四史中，只有最早的《史记》既有民间的经济史《货殖列传》，又有政府的经济史《平准书》。前者讲人的活动，讲市场，讲人的丰富多彩的财富活动；后者讲政府财政，讲

²⁸ 孟子对他理想中的社会有清楚地描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见《孟子注疏》卷五上

经济政策和经济控制。《史记》以后的历史，就只有《食货志》这种以粮食、盐铁和钱币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官家经济史了，其中关于商人、工商业、商品、资本活动的记载，可谓少之又少。这就是经过董仲舒诠释的儒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之后的社会现实。对皇帝来说，实行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使他的权力更大了，财产更多了。但对于个人而言，由于汉儒政治设计的保守本质，人被固定在土地上，社会等级森严，权力的触角扩展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的自由反而更少了，人和人之间、阶层和阶层之间反而更不平等了。没有自由和平等，就不会有资本的蓬勃发育。没有资本的发育和壮大，就不会有现代化国家。中国社会自秦汉以后没有发生真正的进步，停滞两千多年，原因在于此。

第三章 创造财富的神圣激情

资本活动中良知的召唤

资本精神是一种有明确目的的追求，是人的意识活动的产物。资本来自人的欲望，具有动物的野性，冲动活跃。因此要用道德来规范它，用神性来约束它。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是以人王为核心的宇宙秩序，没有超越于人的东西，所以一般人的内心是无所畏惧的。即陀思妥耶夫所说的“既然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可以干”的情况。没有超越的存在，人的心智就成了脱缰的野马。所以中国在传统上是谋略家的天堂。一部二十四史，阅尽人间沧桑，王朝更迭，但很难说有哪一次改朝换代可以称得上是道德的胜利。胜者王侯败者贼，历史都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胜就是一切，可以不择手段，因为是非是以成败论定的，所以成败以外无是非。中国的宫廷生活以阴谋盛行，以无情、血腥和残暴的权力争夺著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个个都是宫廷阴谋的高手。帝王们是中国儒家意识形态终极受益人，他们最是只论成败不论善恶。

权力原始的含义便是支配财富的权利。当人的全部精力都用于应付自然，权力便没有意义，文明也不会发生。中国的文明史，从黄帝战蚩尤，即两个部族争夺统治权开始。

春秋战国以后，形成了一个财富的终极拥有者，“天下”成为帝王的私人财产。汉武帝又利用董仲舒又把这种大一统的权力-财产秩序意识形态化了。这种权力-财产结构的独特性，使得中国传统上把功夫下在如何支配财富，而不是下在创造财富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抓住了统治权力，一切就都有了，“天下”便成为一人的财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是指通过科举考试获得政治权力。有了政治权力，财富和性欲都可以得到满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财富不过是政治的使女，商人不过是供官吏驱使的差役。商人没有必要的保障，甚至没有独立的人格。在这样件下，资本和资本精神如何能够发育起来？所以，中国的中央集权封建专制主义是自由资本的最大障碍。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这种特性，经过意识形态的装饰，一般都不会明显地表露出来。但是到了这种秩序面临大危机的时候，这种皇权背后最隐秘的动机，就会成为统治者的行为。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当时的清朝统治者面临内外双重危机。外部是英法美俄等外国侵略者，内部面临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农民起义。这时的满清统治者，选择向英法让步，与外国侵略者合作，镇压国内的农民起义。在北京条约上签

字的奕昕等人上奏：“就今日之事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内患威胁到清朝的统治，皇权不保，所以是心腹大患。外忧虽丧权辱国，国家尊严尽失，但王权可保，所以是小问题，是肘腋之忧、肢体之患而已。所谓“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就是此等险恶心性的暴露。当年溥仪在日本人支持下，在东北建立满洲国时，也做的是同样的选择。到了大厦将倾时，儒家设计的所有装饰全部取下，我们就在这大厦倾倒的一瞬间，看清楚了中国专制王权的本来面目。

春秋战国时期，以人王为宇宙核心，为社会道德原点的精神秩序尚未建立起来，所以有了一些以财富而得到权位，或者弃政治地位而求取财富的现象，如范蠡、吕不韦。自汉代把儒家改造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资本便彻底被政治打垮了。曾经在战国和汉初蓬勃兴旺的资本、市场发育，变成了六神无主的浪子。财富对政治的独立性，取决于是否有超越政治的道德理想存在，即是否有最高权力者也不得不敬畏、服从的精神原则和力量存在。人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超越自己，只有超越于人欲的东西才能停止权力对财富的侵犯和剥夺。董仲舒及宋明诸儒的宇宙秩序的设计是以“人君”为起点和归宿，没有什么能够能够约束那个掌握了最高权力

的人——尽管他和别的人一样充满了七情六欲，一样的会作恶，会疯狂。既然由人取代了神的超越地位，那个不可约束的人便不可能自己用什么道德绳索把自己捆起来，人欲必然取代公理，整个国家、全部历史便都成了以帝王为中心的人欲史、权力争夺史。

如今，我们这个民族，或者不如说我们的这种文化，从未如此痛切地感到有终极意义的道德理想的缺失对经济的影响，对社会的影响，对政治的影响，对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如此深刻、全面和持久，一切有正常理智和良知的人，都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按照人类共同的经验，按照普适的标准重建我们的强大的道德体系，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对于一个有着自身传统的民族来说，这是需要巨大的勇气、智慧和创造性的事。我们相信，在 21 世纪，有五千年伟大文明滋养的中华民族，有足够的自信和能力在新的基础上重建我们的道德规范。

善是人灵魂深处的道德本源

我们把存在于人的灵魂深处的道德理想叫做善，把其中终极的普适的核心部分叫作至善。

人是一种动物，但又是与其他所有的动物都不相同的动物。人与动物不同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灵魂。人类被称为“万

物之灵”，那意思应当是人类是所有动物的灵魂，或者是人类是动物中唯一有灵魂的动物。

灵魂是什么？灵魂相对于肉体而存在。肉体的存在产生欲望，食欲、色欲、情欲、权力欲、荣誉等等都是。由这些东西产生的思想、审美等，是精神。这种精神与灵魂是不是一个东西？不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由人的肉体产生的，不具有超越性。

一切从肉体产生的东西都倾向于恶而不是善。因为所有的欲望都是以满足自身肉体的需要，即上述食色情权美名等等为目的。所有的善都是超越自我的存在。任何以自我作为出发点和受益人的活动、动机，当然都不是善。如果我们的理想，只是最大限度地满足那个必定要由泥土到泥土的躯壳所需的话，那它必然会随着泥土一起被抛弃在荒野。

从自身的肉体出发是所有的动物共同的特征。这种特征导向恶而不是善。所谓灵魂一定是超越这种动物性的。肉体天然导向恶，那灵魂必然要导向善。

善就是道德超越。超越肉体，超越自我，超越欲望情感。人的生命充满了无我的辛劳，那就是善了。但彻底无我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与我们的本性相悖。食、色，性也。欲望是人的本性，不可能改变。所以，任何人，即使是那些最具有道德感的人，也不可能成为完全的善人。

如果人不为自己，而是为了他人辛劳，譬如为了国王，

是不是就是善了呢？不是。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出于肉体、欲望的目的，都不具有道德超越性。当众人努力去满足一个人的要求时，只会产生更大的恶。让众人去满足一个人的贪欲，除了增加他的贪欲和罪恶之外，不会带来任何道德上的收获。因为要求都出自欲望。只要是人，概莫能外。善是自然自在的超越。任何一个肉体，不管它是多么崇高伟大，都不具有这种超越。即所谓“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道德不承认国王。在这个领域里，和法国人的房子一样，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

至善是人终极的普适的道德理想

至善是善的终极存在，既是开始，也是终结。如果说善超越了欲望的个体，至善则超越了欲望的整体。至善是超越之后的超越，是存在于所有现实、现世之上的道德理想巅峰。人只有在灵魂的最深处，才可能仰望他。

至善是关于人类一切自身问题的终极解决方案，是人类理性的至高处。它超越人类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是人类惟一共同利益的关怀者。它是高踞于人类理性之上的纯粹的道德理性。在这个人欲横流的时代，至善是引领我们驶出这波涛海洋的灯塔。

至善是普适的存在，它不仅是一种高高在上的道德理

想，同时它又是现实的存在，是可以通过人的行为接近的目标。

人怎样接近至善呢？首先让你的心接受至善，让他的阳光照到你幽深、浑浊甚至是肮脏的心里，使你的心由一个从属于肉体、欲望的心，逐渐地变为一个向善的心。这时人就会进入一种新的境界。道德感会洗清欲望的污泥，使生命变得干净，变得灵动起来。你会具有新的眼光，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你会有新的能力，做到你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这种状态，我们的祖先叫做“良知良能”。

当你有了一颗向往至善的心，当你成为一个良知良能的人之后，你就会有了新的追求，你的追求也才会有超越于欲望，超越于你所处的环境的深刻道德动机。当人的创造动机脱离了自身肉体，脱离了利己欲望的时候，他就获得了第一次超越。当人把生命的过程看成是通过生命中的创造，表现那个至善的道德理想时，人就获得了最后的超越——生命成为那高居云端的终极道德理想与人世间的纽带。由此，生命获得了最深刻的激情。

至善是无限的财富

财富是许多人所向往的东西。许多人把自己的一生的目标与所得到的财富联系在一起。财富不但是生命的基础，甚

至就是生命。我们不断地听到人们在这样教育孩子“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各种媒体上每天都有为钱害人骗人杀人的报道。既然财富就是生命，所以那么多人爱财如命就不是什么令人奇怪的事了。即使在一向要求远离铜臭的大学里，如今也越来越喧闹，到处是庸俗现实主义者、肤浅的行动主义者。如何在最短时间里取得最多财富的课程成为最受欢迎的课程，“利益最大化”成为最时尚的大众辞令。在那种铜臭熏天的时代，人们因为财富而欢欣，而痛苦，却很少有人去思考财富背后的意义。

人们把财富等同于利益。他们的所谓利益就是满足人的欲望的权利。追求财富，就是尽力使自己的欲望得到满足。庸俗现实主义者把这种追求看成是人类社会繁荣与进步的原动力。他们认为，人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努力挣钱，经济就繁荣了，社会就进步了。

欲望发动机驱策下的人果然可以创造繁荣吗？古希腊有享乐主义，中国战国初的杨朱和其后的《管子》提出了一种叫做“侈靡论”的经济学说。意思都是欲望创造需求，需求产生市场，市场刺激生产。欲望越多，需求越旺，市场越大，生产越多。由此循环往复，经济就繁荣了，社会就进步了。

真的是这样吗？

第一个问题是，当人的财富足以满足他所有的欲望之后，他还会有继续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动机吗？要知道，他的躯体

变成泥土之后，欲望便消失了，作为“满足欲望的权利”的财富对他已毫无意义。即便我们把欲望的范围扩展一下，比如可以包括他的子女——他肉体的延伸，那也总还是一个有限的范围。如果说欲望创造繁荣的话，那么到了一定程度——他的所有在他的处境下可以满足的欲望都可以满足的情况下，他就没有了创造更多财富的动机。

第二个问题是，必须承认有一些人是比别人更会赚钱的人。这往往是那些需要或想要钱而不会赚钱的人所崇拜或嫉妒的对象。如果那些会赚钱的人所有的欲望都得到了满足，而众多不会赚钱的人却连基本的欲望(如吃饱饭，有避寒的衣物)都不能满足的话，那会是怎样的情形呢？一种情形是会赚钱的人把自己的一部分钱——那些自己节省下来的“满足欲望的权利”拿出来给那些缺吃少穿的人，这样双方都会满意，是一个和谐社会。

如果那些有钱人不把他多余的钱拿出来，在他们门外徘徊的穷人们就会用充满嫉妒的眼光盯着他们，这种嫉妒积累起来，就会变成仇恨。他们中的个别人，在哪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就会往有钱人的屋子扔石头，或者干脆翻墙头进屋去抢。冲突便发生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所谓繁荣和谐等等变成了泡影。洛克说无法律便无自由，意思是说，如果人有随时受到暴力威胁而得不到保护的可能时，便没有自由。在同样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无至善则无自由。因为迟早有一

天，仇恨会把所有人的自由都夺去。贫穷是对人的捆绑，财富、权力同样是对人的捆绑。古人所谓无产一身轻，无官一身轻，说的就是这个事情。

圣经上说，富人要上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我们把“天国”解读为一个理想和谐社会，其中的关键就是要让富人们把他们的钱拿来分给穷人。在上帝的天国里，能挣钱的人还是要努力地挣钱。如果不努力，就要把他“丢在黑暗里”，要这些“又懒又恶的仆人”在那里“哀哭切齿”。对于要上天国的富人们来说，他们必须做到以下两条：第一，努力挣钱，挣最多的钱，这才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第二，把所有的钱分给穷人。这当然是很难得做到的事情。但是为了上帝繁荣而又和谐的天国，骆驼必须穿过针眼。这两条有一条做不到，就拿不到去天国的门票。

还有一个问题是，资本是满足需求以后剩余的财富，这种剩余的财富又要用来创造更多的财富。因此，剩余的部分越大，则可用来作为资本的那部分越大。反过来说，人用来满足自己欲望的那一部分财富越大，则用于作为资本的那一部分越小。这里就出现了节俭问题，也就是人如何主动地约束自己的欲望的问题，或者说是人约束自己欲望的动机问题。如果财富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为什么要节俭呢？任何一个不是傻瓜的人，都会在自己变成泥土之前，把自己所有的财富用完。

所以，人只为自己的肉体、欲望之需而创造财富，一定是有限的，最终一定会导致动力枯竭、社会分裂动荡、奢侈挥霍这三个问题发生。只有超越于人的肉体、欲望的至善，才有可能使人具有无限的创造力，才可能使一个具有巨大创造力的人节俭地使用自己的财富，并且把自己的财富看作为公共品。只有怀抱超然道德理想的人，才能够超越自我，为一个神圣的使命而创造和奉献。

肉体是暂时的，情欲是有限的。人的肉体、情欲等等不产生至善，不具有超越性。神圣的激情只能产生于超越于肉体、情欲的道德过程。追求至善，超越才能持久，才能永不枯竭。

任何人都不可能有终极的道德

人不可以没有道德，但道德的来源和界限似乎又是模糊的，所以就有了伪道德出现。

譬如，如果没有终极道德的约束，谁来管那个或那伙任何人也管不了的人？掌权者就会把满足自己的欲望强加给人群。这个凡夫俗子，这个充满各种丑恶欲望的人，不但是道德的最高裁判者，甚至可以把自已的一己之私，一己之欲说成是道德的方向。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时代，一切，包括物和人，都属于最高统治者皇帝。“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里，统治者的欲望被赋予终极的道德意义，人君的无限制的占有权被官方意识形态神化了。宋明儒家把人君神话为神，由此来统一人的行为，统摄人的灵魂，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法律制度和统治机器。宋儒称“存天理，灭人欲”。但这个“天”不是神，而是人，是皇帝。皇帝的需求就被描述为“天理”，人们只能湮灭自己的欲望（灭人欲）去满足那个僭越了神位置的、和自己一样甚至更坏的人。那结果使大家的恶也许小了，但那一人的为恶则大大扩张了。

人就是人，不可能是神，因为所有的人都是自己肉体欲望的俘虏，没有人会有超越自己欲望的能力。人的有限性使任何试图把人神化的企图，最后都成为一场骗局。把人神化为神，让人抑制自己的欲望去满足一个皇帝或者别的什么人的贪欲，其实质无异于一人对众人灵魂的强奸。封建专制主义是一个装神弄鬼的导演，他导演的是一场以人为神的灵魂骗局。

至善不是人对人的剥夺，对人的剥夺决不能在道德的旗帜下进行。至善是给予，是普世的施恩者。至善是超越的，它对人没有任何需求，财富、欲望、情感等等对它没有任何影响，它只是一个对人的生存境况的终极道德关怀。

以人的欲望为出发点的道德体系必然是伪道德，因为人的欲望在空间上限于一己，在时间上限于一生，不可能有普

适终极的道德意义。真正的道德只能出自超越的神圣道德理想——至善。

财富的神圣激情

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是极言人舍弃自己的财产,放弃自己肉体享乐的权利的难。财产越多,舍弃越难。总共只有两个鸡蛋,舍掉就舍掉了。我转身就可以对上帝说,上帝,我已经把我所有的都给你了。但如果是两匹马,就比较难了。如果更多,如两幢房子,两个庄园,甚至是一个国家,那就更难了。所以富人要上天堂,不是普通的一般的愿望就可以的,它需要更深刻的、更多的动机和理由。

柏拉图、康德和《圣经》都认为人无往不在捆绑之中,绳索就是你的欲望。财产就是你满足欲望的权利。欲望是没有穷尽的,完全不受理性约束的。人无论有多少财富,也不可能满足他所有的欲望。一次太空旅游的价格是两千万美元。若是每天到月亮上打一个来回,即使有比尔·盖茨那么多的钱,要不了多久也会用完。一个穷人约束自己的欲望很简单,他的很多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权利。但一个富人,特别是一个大富人,他有权利满足很多的欲望,有什么理由才能够让他放弃自己的享受更多的权利,满足于简单的与穷人相近的

生活呢？如果人创造的财富不是为了享用它，创造财富的动机在哪里呢？

首先要明白，人的绝大多数欲望是多余的，毫无意义，也没有去满足它的必要。你每天要吃饭，要穿衣，要睡觉，要工作，要休息。这是生存所必需的。还有是义务，如娶妻生子。吃饭，营养够就可以了，不必要每天山珍海味，不需要良田万顷来供养你。穿衣，能够蔽体保暖就可以了，可以要求舒适得体美观，但不一定非名牌时装不穿。睡觉，有一张安定的床就行了，不一定非要花园洋房大别墅，更不一定非要一万间大房子(真要是那样倒真的会睡不着觉)。既然大多数欲望对人的生命毫无意义，去用大量的财富来满足他们就是多余的。

既然人并不需要过多地为自己的欲望去创造财富，那岂不是小富即可，够用就行了？我们要创造那么多自己用不着的财富干什么？

人类自认为是有灵之物。我们的生命表现为肉体及其欲望，但我们又认定自己不止是肉体 and 欲望。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是在现实中回应我们灵魂深处永恒的呼唤。我们的灵魂就是我们的生命与永恒相联系的管道。具有永恒意义的存在必定是超越于我们的，但同时它又必然是关切我们，并且有能力关切我们终极命运的存在。我们把这种有终极关切能力的存在称为至善。康德把道德和灵魂联系在一起，是一个对我

们有极深启示的见解。一个有能力创造大量财富的人，我们当然认为他也是能够感受和响应我们灵魂深处永恒道德召唤的人。对于一个有杰出能力的人来说，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倒是一个愚钝懒惰的人，理解起来会十分困难。俗话说，聪明人看了会心一笑，愚蠢人看了胡说八道。

如果把创造，包括财富的创造看成是我们的生命的唯一方式，我们必须通过这种方式来表现我们对于灵魂深处的道德召唤的回应，我们的工作及其成果因此而具有神圣的意义，难道还需要别的什么动机吗？

第四章 创造与超越

人如何通过自己的行为逐步接近至善

1、确知我们生命的有限，坦然承认自我的欲望不会导致善，感知、领悟我们灵魂深处至善的呼唤，从而使我们的创造活动，包括对财富的追求，趋向于由善到至善的动机。至善是人的终极的普世的神圣道德目标，它存在于我们灵魂的深处。当我们看到自我的本质时，我们才可能接近至善。

2、至善作为最深刻的道德理想使我们的精神发生改变，我们的良知被激活了，我们成为一个有“良心”的创造者。

3、道德理想的超越使我们具有了超越自我的深广眼光、博大胸怀和强大能力。我们成为一个具有“良知良能”的超人。

4、这个具有超人能力的人用全部的智慧、能力和精力去创造财富。

5、按照至善的道德原则处置自己所有的财富，从而完成一个用生命的过程彰显神圣的道德理想的过程，使自己的生命超越自我，超越肉体，获得永恒。

领悟至善的召唤——获得良知——获得良能——为至善创造财富——为至善处置自己所创造的财富，这就是有限

的人接近无限的至善的过程。

接受至善的呼唤

人都是有限的：生命有限，情欲与肉体的自然状态指向恶与罪。出于我们自然的本能，有限的人不会，也没有必要无限制地创造财富。

所以，当一个人处于道德的自然状态时，如果他侥幸地获得了大量的财富时，除了顺从他肉体的自然要求，满足自己的种种物欲、色欲、权欲、名利欲，穷奢极欲，花天酒地之外，他还会有什么别的表现吗？不会。因为这就是他创造财富的目的。

如果人不能超越自我，仍然是欲望的奴隶，他会把自己获得财富看成是自己能力的结果。这又会使他自认为自己有高人一等，使别人服从自己欲望的权力。这就是为富不仁的精神根源。在一个没有超越的道德理想的地方，人一旦获得了财富，不但一定会穷奢极欲，而且一定会为富不仁。

我们这个物种不是畜牲，而是不同于畜牲的灵物。这是因为我们的灵魂可以感悟到超越于我们物欲的深刻道德召唤。那些最深刻地思考了人类处境的思想者们，多数认为这是我们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上，最终能够得到拯救的唯一希望。被广泛引用的一位美国富豪的名言是，当一个人离开

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留下的财富就是他的耻辱。怎样摆脱这种耻辱呢？只有用我们的行为去响应我们灵魂深处神圣的道德召唤，才能使我们过多的财富不成为我们的罪证，而成为我们道德理想的旗帜。

至善不但超越于个人，而且超越人类。因为人的集合，不管这个集合体有多么大，仍然是有私欲私利的人。比如一个民族，就会把自己的民族的利益置于其他的民族之上。所谓自己的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其实质还是私利私欲支配的结果。把自我扩展到一定尺度上，就是国家。至高的道德理想，既不能属于一人，也不能属于一家和一国。必须有超越于国家之上的、为所有国家、所有人共同接受的东西，那只能是超越于任何人及其组织之上的、终极的道德理想。至善是对所有时代的所有人最好的终极解决方案。我们作为有限的人不可能具有无限的智慧，所以我们只能用我们的灵魂去接受它，在他的引导下超越我们有限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走上一条用我们的行为接近永恒的路。

从感悟至善到良知良能者

我们通常认为人都有向善之心，我们把这称为良心。良心通常是自然状态的。一般人在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时，不损害他人，就叫做有良心。一个人能够做到不损人利己，就

是一个有良心的人。良知则是善的觉悟，它超越自我的行为，超越对个人行为的道德判断，使善成为生命的自觉追求。良知是善的觉悟，是至善作用于人灵魂深处的道德动机，使人的精神发生根本性变化。良心出于本能，良知则需要觉悟。

一个有良心的人，不管他有多少财产，只要符合他所认可的道德原则，不是“黑心”钱就行了。他可以用自己的钱过奢华的生活，可以把它留给子孙，也可以把它埋在他自己的坟墓里。这些都无关乎良心。但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就不可以这样了，因为他已经知道更广阔的善，有更深刻的生命感知。行善已经不是自己的主权，而是一个至高的道德理想的主权行为。

良心不等于良知，但他们是相关的。良心是至善埋在本能中的种子，良知则是这种子长大后的结果。

良能是良知者的能力。这一方面是指，良知使人的能力成为良能，使人的能力及其结果有了新的道德意义。另一方面，良知会使人具有新的能力，并对人的创造行为产生更深刻持久的激励。

为至善创造的财富

财富是人类按照自己的需要设计并创造出来的物质秩序。作为一种特定的物质过程，财富有没有道德属性？当然

有。譬如人们说的“黑心钱”就是一种道德判断。人们不愿意赚“黑心钱”，一方面是出于本能的道德取舍，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利害的考虑。如果收了“黑心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会“晚上睡不着觉”！那是一种真正的来自灵魂的恐惧。他们怕那些受到损害的人来复仇。这是利害的考量。在这里，道德决不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如果你在得到财富的同时，也在制造仇恨，这种财富就是不道德的，同时它也是不安全的。即使是对那些只想得到自我“满足欲望的权利”的人来说，如果因为财产而把人置于危险的境地，也是不合算的。生命没有了，欲望也就消失了。财产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此看来，即便是最初级的道德，也更符合人更本质的利益。

至善不但要求人不懈地创造财富，而且要求人不断地把自己创造的财富积累起来，去创造更多的财富。善在这里不仅要求取得财富的过程不违背一般的道德要求，而且要求人不是为了自己“欲望满足的权利”，而是为了他人去创造财富。在这里，创造财富的过程完全是属于个人的，处置财富的权力也是属于个人的，只是使用财富的是那些需要他人的帮助才能生存下去的人们。那么财富的创造者们得到了什么呢？对自己来说，他得到了他灵魂深处道德理想的满足——那是人的生命唯一与永恒相联系的东西。对于使用财产的人，就是那些受帮助的人来说，得到的是现实的生命和生命的尊严。对于社会来说，得到的是广阔蓬勃永不衰竭的创造

活力、社会和谐与和平。

至善并不要求人们利他。人舍掉自己的财富，去回应自己灵魂深处的道德召唤，得到的是一个与永恒的道德理想相联系的新的生命。不管他舍弃的财产数目有多么大，他的所得都比他所失去的要多。他灵魂深处的道德理想将融入至善，成为人类永恒的道德理想的一部分。他避免了财富的死亡，而且得到了通往永恒的新生命——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呢？

节俭与神圣——为至善处置财富

必须说明，我们在这里说的是资本精神，而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奢侈与财富增长的关系，从来就是一些人热衷谈论的话题。从西方古希腊、中国的战国时期开始，就有关于享乐、侈靡刺激经济发展的理论。松巴特就认为，韦伯所称的新教徒的节俭，正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反对者，最多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的草创阶段。他在《奢侈与资本主义》中说：“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他生出了资本主义。”这一派思想，概要地说，就是享乐奢侈行为刺激消费，消费增长促进市场扩展，市场扩展促进生产，生产增长使人的收入增加，收入增加使人们更趋向享乐和奢侈。“奢侈从许多方面推动过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贵族的财产主要

以债务形式转移到资产阶级手中，在这一过程中，奢侈扮演着重要角色。”“奢侈最令人称道之处是其创造新市场的功能。‘奢侈绝对有其必要；’孟德斯鸠说，‘富人不挥霍，穷人将饿死’。”松巴特还认为韦伯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表述是狭义的，清教主义与“中产阶级的美德毫无关系”。

仅就市场经济过程本身来说，消费增长的重要性怎样说也不过分。但是经济从来就不是纯粹的实验室状态的东西。消费增加的动机出自人的欲望，而人的欲望是没有穷尽的。设想一种经济制度，对人的欲望不加区分、不加限制地满足，是一个疯狂的想法。过度的奢侈、无理性的消费首先会激起社会道德的堕落，其次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和对立，还会导致资源的衰竭和环境的破坏。消费的增进、生活的整体改善必须受道德、社会 and 资源的限制。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经济理性主义，有着深刻的道德动机。而松巴特所说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和资产者，是在某一个特定阶段上的、某种特定结构中的资产者行为，是对于某一部分表层资本主义现象的纯粹技术性分析。韦伯所说的从宗教元素中生长出的资本主义精神，有着松巴特难以比拟的深刻性和完整性。对韦伯最有利的支持是事实：世界上最大的资产者，多数都符合韦伯对于资产者的道德描述。换言之，最成功的资本主义者，最能够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人，是韦伯所说得那样的人，而不是松巴特等人所描述的那种资本家。

个人拥有过多的财富会导致社会的分裂和对立，即便他所有的财富是合乎一般道德规范的。所以，总是要把多余的财富拿出来，分给那些不足的。依照人性的常识，那些市场天才们肯定不愿意为别人创造大量财富。所以他们赚够了一定数目的钱就应该不干了，或者就把它们挥霍掉。因此，社会便失掉了一部分创造财富的动力。如果他们赚了很多的钱又不愿拿出来，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分化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社会的对立，分裂，甚至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最终使大家都付出更沉重的代价。这种局面显然是最坏的——财富是用来建造社会的，而不是用来毁掉社会的。

至善的道德理想是我们对这个两难命题的解答。如果积累的动机是为自己，为家人，为同族——总之是为了人的口腹、色欲、虚荣心、亲情、友情等等欲望和情感，都可以成为积累、创造财富的动机。但这不是我们所说的资本精神。资本精神是指那些超出于这些具体的、现实的、物质的、肉体的至善精神。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这是很不容易达到的境界，可能像“骆驼穿过针眼”那么难，在这个世界上也许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但难做到，并不等于完全不能做到。例如比尔·盖茨等等，把自己所有的财富（几乎）都捐出去了。他是当今世界上最有钱的人，肯定比圣经上的那个青年财主有钱得多。他把自己所有的钱（几乎）都“捐给了穷人”，应该是可以穿过针眼的骆驼吧。

节俭是人类的统一行为准则。对于穷人来说，是生命的自然智慧；对于那些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来说，不但是智慧，而且是道德。它表明人对于自我欲望的道德超越，具有神圣的意义。就像那些乐于助人的人，他从助人的行动中得到的道德满足，比被帮助的人的满足更多，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自己的欲望。

普遍隐藏于资本背后的道德精神，实际上扮演了资本主义拯救者的角色。熊彼特在《大步进入社会主义》中曾经预言，资本主义由于快速改变社会生活，从而使它在这种改变中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但他担心的官僚主义化的政治权力、平等的契约制度对企业科层制的破坏作用、日益壮大的知识分子阶层对大企业和大资产者的敌视、由上述因素导致资本主义价值观失去吸引力等四个问题，一个也没有造成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性破坏。他所担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局面，并没有出现。这四个原因都与韦伯和松巴特的争论有关。而熊彼特所说的情况并没有出现，根本原因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中的清教主义及其政治产品，有效地消解了各种可能导致体制内根本性对立因素出现。

至善是超越生命生命

如果仅从肉体的过程来说，死亡便是一切的终结。由肉体产生出来的欲、情、思等等，脱离肉体便不能存在，只能随肉体化为灰烬。这个过程不独人类是这样，所有的动物甚至是生物都是这样。

但是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生命更本质的意义的追寻。人不是动物，因为人是有灵魂的动物，他可以超越自己的肉体，感知宇宙间更深刻的关切。在康德看来，灵魂就是另一个宇宙。在我们存在的所有中，只有灵魂和宇宙同样具有那种无穷尽的迷茫。如果我们能够感知到灵魂对于生命的深刻影响，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承认它的存在。我们生命中最深刻的激情来自灵魂而不是肉体，我们进行最具创造性活动的动力来自灵魂而不是肉体。只有在我们对于生命的超越的探索时，我们才能感悟我们的灵魂中最深刻的道德理想。人类最杰出的思想者们，无不对它表现出无比的向往。

人类何以有道德感？最深刻的道德理想来自哪里？这不是我们能够解答的问题。我们能够感悟到它的存在，能够用我们的生命过程见证它的存在。当我们感受到了至善的道德召唤，并用我们的行为响应了这种召唤，我们的生命就有了超越的意义。

至善是对人类存在及其命运的终极关切

19 世纪以来物质主义、技术主义、实证主义盛行的结果，使人们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空前的自信，也对一切不能见证的、不可以复制的存在——如灵魂，产生了深刻广泛的怀疑。实际上，人类在宇宙中的有限性，并没有因为人认识上的进步而发生丝毫变化，不管这种进步在某些人看来有多么大。人类的进步不管多么大，都是有限的。对于无限而言，任何有限都可以忽略不计。在某些情况下，进步也许意味着灾难。人类的智慧已经到了原子时代，核武器成了人类面临的最大、最现实的危险。但是人类并没有表现出消除这种自己制造出来的灾难的智慧。工业时代是和对环境的大破坏同时发生的。人类也同样没有表现出解决环境问题的智慧。小孩子会放火，但是救火他就不会了。人类的处境，其实就是一个放了火的小孩子。

至善是超越于一切人类经验的道德理性，它有自身的理由和逻辑系统。我们无从了解，但这种理由和逻辑对人类有终极的影响力。如果人类不能按照至善的道德理想调整文明的体系，改变以自我为出发点的规则系统，改进自身的道德和行为，就无法摆脱自身的局限，无法化解自己制造的危局。任何人所定的规则都必定包含人的、现实的、肉体的、利欲的要求，就不可能具有超越性和普适性。只有我们共同一致的以至善作为我们的原点，从这里出发去寻找共同的最终解决方案，才能解决由人的利欲产生出来的无数对立的、相悖

的要求，使我们在茫茫宇宙中成为一个真正同命运的整体。

至善是普适永在的善。它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任何人类的个体和组织——如国家、民族、家庭。任何人的群体都是扩大的个人。任何从人出发的善，都是有局限的，因为人的本性即是以自己为出发点，扩大而为家，再扩大而为国。任何人自己做出的决定，其最原始的出发点都是私欲，天然趋向于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至善超越意识形态。任何意识形态都是从人类经验出发的，总是为了满足某一部分人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至善不为任何一部分人类所独有，而是为整体人类的终极理性。

至善是超越的，又是实在的

我们回到财富的话题。善不仅是对财富的道德判断，而且是最佳的财富可持续增长方案。人的财富有限，人所需要的财富也有限。一个有真正智慧的人，肯定不会满足于生命就是肉体 and 欲望过程的解释。我们的如此宝贵的生命，难道只有灰飞烟灭一种结果吗？永恒的生命召唤具有无限的吸引力，把那些最活跃、最深刻的头脑吸引过来。财富是用于满足欲望和肉体需要的物，它本身是谈不上什么神圣意义的。但财富的创造和使用是出于一种超越的道德动机的话，这些俗物便有了神性。当财富的创造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标

时，每一份财富都会成为上天的祝福，你生命的每一天都会洋溢着新的光彩。

让财产成为至善的产业，会使人得到他前所未有过的自由。对于陷在肉体欲望中的人来说，财富就是捆绑。财富越多，捆绑越重。因为，人的财富越多，他在死亡时带不走又用不完财富就越多，他对死亡的恐惧就越大。贫穷使人恐惧，财富同样使人恐惧。所谓良田万顷，日食斗米；广厦万间，夜眠七尺。这应该是对财富与生命觉悟的语言了。

把财产留给后代是一个更愚蠢的办法。白白得来的东西，谁会珍惜呢？我们会珍惜我们所呼吸的空气，所喝的水吗？这是多么珍贵的东西呀！但没有人会珍惜，因为它是白白得来的。中国人有富贵不过三代的说法，那就是人类关于财产的经验。妄图在自己的后代身上延续自己的生命，不但证明了人的自私，而且证明了人的愚蠢。

对于真正的大彻大悟者来说，财富只是自己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证物。这和自己的欲望、肉体的需要没有什么关系。当他把它交给那个一切老板之上的老板——至善时，财富就有了最大的用处，而他则得到了生命的超越，从而使自己的生命有了终极的意义。哪里还有比这更合算的买卖。

第五章 创造与再创造

新资本精神

只有超越的动机才可以克服人的有限性。至善是超越的道德动机，所以它可以克服个体的人的有限性，成为整体的可续的行为动力。布罗代尔说，整体的运动才是最重要的。

近 200 年来，随着人的能力的跃进，财富的含义也越来越丰富，与人的整体的物质和精神环境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同样的产品，在不同的环境中就有着不同的道德评价和利益评价。人们开垦草原去种土豆，收获土豆的人得到了自己的财富，却把一片沙漠留给了子孙。煤炭被作为一种财富生产出来，所释放的气体却污染了大气层。从煤炭生产和交易中获得利益的是一小部分人，受害的却是整个人类。砍伐森林，把木材变成财富，在一小部分人获利时，地球整体的生态环境被破坏了。面临更严峻道德考验的是武器和军事技术的交易。这种交易同样只有少数人获利，却使千万人面临死亡。据估计，地球已探明的石油储备还可以开采 70 年，煤炭储量还可以开采 200 年，70 年，200 年以后呢？我们

在 100 年的时间里，烧掉了地球上几亿年留下的动物尸体（石油）和植物尸体（煤炭）。这样的财富难道没有什么道德问题吗？当那个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怪物魔术般地释放出空前的生产力之后，我们不知道它使我们的地球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坏了。

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建构我们的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人类从未如此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人类普适的道德理想的意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现实。资本的意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进行道德判断。面临如此多而又如此充满危机的局面，我们必须找到共同的道德理想、道德原则和道德标准。我们必须超越自己，听从我们灵魂深处的道德召唤，重新检讨我们的价值体系、财富观和发展观，使我们在今天所作的一切，不致成为后代人类的耻辱和麻烦。新资本精神，就是加入了对更为整体性的人类道德元素的资本精神。

自由、和谐与繁荣

20 世纪是市场经济胜利的时代。世界各个主要国家，都先后走上了市场经济道路。进入新世纪后，资本成了世界的宠儿。就连世界上最为封闭的北朝鲜，也开始尝试利用外资。

资本是自由的产物，自由是规则的产物。没有自由就没有资本，资本对奴隶毫无意义。自有资本以来，它就是经济

中最活跃的因素。资本活跃的本质，是它背后人的活跃，是资本精神。在马科斯·韦伯所描述的那个牧歌式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精神是进取精神、诚实守信、平等、节俭生活、忍耐力、冒险精神和无私慷慨的集合体。韦伯描述的是资本早期阶段的状况，那时还没有跨国超级富豪、世界大战、核武和生态危机等等问题，与此同时每年又有数十万人死于饥饿、监禁和战火。那时的人类多多少少还保留着伊甸园的痕迹。

资本不等同于投资，也不等同于货币，它必须与它的监护人——资本精神一起，才能够正常地发生增加财富的作用。资本本身具有欲望的冲动本性，如果不加以约束，他就可能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野猪”，对社会造成破坏，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和社会危机。

在一个缺少诚实精神的环境里，对资本和财富的追逐会造成假货、劣货充斥，欺诈盛行，到处是商业陷阱。更严重的是行贿受贿成风，社会全面腐败，投机取巧、以权谋私成了获得财富的主要方式。财富向权力垄断集团飞速集中，市场经济必须的平等规则和资本自由流动不复存在。暴富者穷奢极欲，获利阶层拼命维护让他们获利的体制。与此同时，底层的状况改变很少甚至在恶化。畸形的经济繁荣，除了激起他们的不满，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每个人、每个企业、每个利益集团甚至政府都在拼命谋求利益最大化，人与人之

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尖锐。资本天然自私的，自私的人必然是短视的。大家都只看眼前只管今天。资源枯竭了，环境破坏了，道德失范了，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一个个被瓦解了——这样的社会会是一个什么结局，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吧？

所以，如果一个社会没有道德基础，没有精神的预备，资本带来破坏的速度甚至比她建设的速度还要快。资本必须由具有资本精神的人使用，必须由具备“良知良能”者使用，也必须由尊崇并践行资本精神的社会使用。如果一个社会还不具有这种精神，甚至还在抑制这种精神，那就最好不要急于向资本开放。引进资本绝不仅仅是“把钱拿来”就够了，更重要的是资本背后的精神和精神背后的道德理想。

资本是野性的，它具有欲望的特征。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他就会为恶。资本，用来贩毒、贩卖人口、倒卖军火、开妓院，都可以增值。你如果去掉其中的道德含义，这也是财富。妓女，已经有人正名为“性工作者”，妓院则叫做“性产业”了。也许有一天，贩毒会改称为“依赖性食品产业”。这种趋向表明，在资本的作用下，这个社会不是向更高的道德开放，而是向人的欲望开放了。

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是逐渐脱离人的动物性而走向神性，也可以说人整个的历史就是不断地摆脱肉体欲望的捆

绑。如果资本使我们重又找回我们肉体贪婪的本能，这能说是进步吗？如果说这是进步，就是人向“畜牲”的方向进步了。这样的资本和这样的进步难道是我们所需要的吗？如果我们任由欲望的摆布，就与一只只知道向地下去翻拱果腹之物的猪没有什么区别。人不是猪，人生命的本质不是向下坠落，而是向上天的仰望。在文明进程中，人性在走向神性而不是走向兽性。

一般而言，自然状态的欲望不导致和谐而导致冲突。欲望是自私的，个体的，它没有处理与其他个体关系的能力。当冲突发生时，只有你死我活的关系。所以，一个没有资本精神的资本家，一定是一个野兽。当一个社会缺少资本精神及其背后的道德文化背景时，放任资本去做为，一定会冲突横生，矛盾遍地，危机四伏。道德，有道德的人，有深刻道德理想根源的文化，是这样的社会最缺少又最急需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无道德则无和谐，无道德则无繁荣。

资本就是发展

我们要再一次谈到传统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太关键了。我们当然要继续传统，但我们认可的中国文化传统不仅仅是儒家，而是儒家以前的诸子百家的传统。我们需要继承的是儒家以前的那个群星灿烂的传统，而不是一家的传统。我们对

于儒家的批评，也并不是全面否定它。我们否定的是董仲舒“罢黜百家”之后的那个专横的意识形态怪物，而不是有诸多合理性的孔孟学说。

秦汉以前的中国是分散的，也是多样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急于统一人们的头脑。它不但要做人间帝王，而且要做统摄灵魂的神。秦二世而亡，汉代儒家兴起，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确立儒家传统，越唐而至宋集其大成。这个儒家利用儒家的部分内容，形成了一套以“人王”为核心的等级社会体系。其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三纲六纪”。有今人一针见血地指出，“三纲”地位也不是平等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君为臣纲”。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开宗明义：“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庶民。贵以临贱，贱以承贵。”这个社会体系，就是一个以君为天的等级结构。整个社会是一个以人为神的类宗教体，帝王的欲望、意志既超越于法律也超越于道德，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既不讲道理也不讲道德，因为他是以圣人的名义所造的神，他被赋予了超越于人的地位。在被尊为宇宙核心的皇帝们来看，董仲舒这一套秩序看起来甚为精致，用起来又有整合天下而归一，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的功效。所以，历朝历代的帝王们，一从改朝换代的腥风血雨中爬出来，就要把圣人抬出来以示自己是儒家秩序下的正统继承者。

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延续 2000 年，主要是指越来越走向绝对化的这种儒家传统的延续。

一个以人为神的文化传统，为什么能够使一个庞大国家长久统一起来？它的整个制度设计是高度向心性的，君王是天地万物的核心，整个社会围绕它运行。这个核心不管换成了谁，是怎么换上去的，整个社会都同样围绕它运转。这种高度向心的结构具有形成大一统的特性，它不断地把在周围游荡的分子吸引过来，纳入自己的系统。在没有其他大的文明系统进入之前，这个系统就有着无可比拟的吸引力和稳定性。中国的所谓正统的观念，就是系统是不是认可它的核心。

这个系统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发展的动力，缺少发展所必需的自由元素。在这个系统中生活的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君君亲亲和主从意识。家有家长，族有族长，各级官员都是百姓的“主”，在这一切之上是最大的“主”——皇上。这套秩序的主要目的是稳定统治。对于皇帝来说，稳定就是最大的利益，因为他是这套制度的终极受益人。皇帝是一切利益的主宰，是一切道德的出发点，皇帝的话就是上苍的旨意，他等同于神。皇帝以下的各层“主”也各有其利益。在每一级“主”都有既得利益要维护的情况下，社会总体倾向于保守。

资本的本质就是发展。商业天生的开放性、流动性和探索性、冒险性一样，都与儒家社会总体的封闭保守倾向相冲

突。自秦汉以后，随着儒家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商人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每况愈下，商业历千年难以有大的发展，资本积累始终没有成气候，都与这种社会文化环境大有关系。当鸟的羽毛一根根慢慢地被拔下来之后，它还怎么飞呢？资本和资本发展必须的社会环境和意识形态背景，已经在日益走向僵化的儒家文化传统千百年的浸泡之下，成为一块板结的土壤。

儒家给了我们两千年的文化统一，两千年中大部分时间的统一国家和统一市场，形成了民族大家庭，功不可没。但是他把人束缚在土地上，把人的头脑局限在一个狭小的领域，扼杀了我们民族的自由精神和创造活力，阻碍了商业的发展、阻碍了资本和市场发育和资本主义的形成。封建宗法经济基础的本质是农村统治城市，农业压制商业。以儒家文化教条为全部内容的科举和人才选拔制度不断再生出束缚商业和资本发展，阻碍市民社会形成的强大政治力量。

不发展，就落后。落后就挨打。资本就是发展。这就是资本精神。

开放我们的灵魂

1840 年，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突然被英国的炮舰敲开了。自此时起，老朽僵化的儒家文化传统第一次遇见了真正

的对手。这是一次必定要一分高下的交锋。我们必须进行深入文明骨髓的检讨。当然皮毛的所谓中西比较，即使难以到位，也比没有好。但是病根并不会在皮毛上。中国的开放到底在那里开放？集我们 20 年身体力行的经验，集中国人 200 年的经验，集我们对两千年儒家文化传统的研判，我们要说，灵魂的开放才是最核心、最要害的开放。其他层面的开放，都解决不了中国最根本的问题。

灵魂向谁开放？向普适的、终极的道德理想——至善开放。我们必须接受普世通行的道德原则，必须承认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切者对我们灵魂的主权。中国人不是孤立地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儒家文明体系和其他各种大大小小的体系一样，都将会为人类共同的普适文明做出贡献，但我们必须放弃以人王作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和道德体系，改变我们文明最核心的内容，而以普适的道德理想和原则——至善来取代它。至善是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切。它是超越人，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超越文明的纯粹道德理想。只有在至善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我们的道德体系，把人从臣民、暴民、小民改变为良心之民，良知之民，才可能有资本精神的发育，也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和真正的自由社会。如果仍然把开放看成是技艺器物、民主共和、市场经济等范畴及层次的事情，我们就不可能真正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我们就只能够跟在别人后面做一个二流三流民族。

我们既批评中国走向极端的儒家文化传统，又同时坚定维护和热烈推崇我们的传统文化。在保守的专制的政治统治之下，文化反而成了人们表现自由精神的舞台。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是在元代。元代的政治统治极其严酷，连老百姓的菜刀都要用锁链把它锁起来。但是由于元统治时间较短（只有 97 年），还没来得及“拧紧螺丝”，所以思想控制上相对宽容。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元代的戏剧、诗歌、绘画、书法都达到了顶峰，是中国历史上文化艺术最灿烂的时期之一。考虑到元代只有几十年的历史，我们民族的这种创造力就更为令人惊叹了。秦汉以后，魏晋小品文、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先后达到顶峰，成为中华民族连绵不绝的文脉，也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道宽阔的河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有最优秀作品，无一例外张扬人的自由精神，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创造力，表现了超越时代的道德理想和人性光芒，成为反抗专制传统的精神旗帜。一个有伟大创造力的民族，不管受到什么样的压制，总会找到释放自己创造力的方式。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在考察国家兴衰的经济原因时，曾表达了对中国文化在现代经济中的表现的肯定。他在《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一书中指出，在 19 世纪、20 世纪的西方思想家中，“甚至一些最有学识和同情心的观察家也曾想当然地认为，中国文化中的某些方面是同现代经济生活格格不入的。”他还在注

释中举例说，汉学家费正清就说过：中国比任何其他古老的非西方国家更不适应现代生活。奥尔森以经济学家的严谨和客观指出：“现在看来，这种观点几乎是违反常识的。近三十年来，世界增长最快的地方大都是具有中国文化或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地方。”

中国文化之精彩、灿烂、丰富和深厚，其实是外人很难有切身感受的，充其量也只能窥见其冰山一角而已。如诸子百家中，庄子老子墨子其实远比儒法兵诸家更具有超越性和现代性。诗经楚辞汉赋魏晋小品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有哪一个民族有这种绵延数千年不曾断绝的文脉？就是琴棋书画等等所谓雕虫小技，也莫不博大精深，那种难以言说的深邃和优雅，早已渗入我们的血液骨髓。中国文化中的深刻性和多元性，使我们在应对民族和人类共同的各种问题时，可以从中华文明的最深处找到接近超越的智慧。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开始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商品经济”。27 年以来的实践证明，中国资本精神的发育，有它丰厚的“文化底蕴”，也有足够的创造力基础。在两千年之前，在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汉中期，中国曾经失去了机会。在新的千年开始的时候，中国面临着新的一千年的机会。我们再也不会失去机会了。

不是改造，而是再造

中国的文化传统可不可以改造？不可以！为什么？因为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以人为神。这是人类所可能犯下的错误中最大的错误。如果人成为其他人的神，这个世界就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敬畏了。人类就没有什么坏事不敢做了。什么坏事都敢做的人，到头来必定使人类陷入灭顶之灾。设想，希特勒当年如果先有了原子弹，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那么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不是要推倒重来呢？不是，我们首先要恢复我们多元的文化传统，承接诸子百家(包括儒家)的时代——就是有很多商人的名字被记载到史书上的那个时代。当然历史无法重现，我们至少应当把它复制出来，让大家看到他们的本来面目，让大家看到我们本来有一个多元的传统。独受尊崇的儒家是专制制度的一个嫉妒的夫人，她把别的“美人”都藏起来了。所以儒家本身也有一个恢复本来面目的问题。除了儒家、法家之外，我们的文化传统里面还有那么多瑰宝，为什么不把它们都拿出来看看，能用的为什么不用。

所谓普适就是共同接受，共同拥有，共同遵守。每个民族、每种文明都可能包含有普适的元素，但每个民族、每种文明也都有自己的问题。所以普适也就意味着超越，不但超越任何人，也超越任何民族和国家，超越任何文化和意识形态。资本精神是有普适性的，它源于我们灵魂深处共同的

道德理想，它的基本内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但在一个具体的环境中，也要根据具体情况有所侧重，有所调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时期，侧重点也会有所不同。我们的缺项比较多，诚信精神、平等精神、公益和慈善精神、合作精神都严重不足，急需大量补充，但中国人也有强项，就是进取心、忍耐力、包容性和基于深刻历史感的远大目光。

我们的历史中，有过资本和资本精神留下的痕迹。我们灵魂的最深处，同样可以感受至善道德理想的永恒召唤。我们民族的精神历史中有丰富的发展基因。我们不是一张白纸，不需要从头再来。但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确实毒化了我们的土壤，我们的土地不加改良就再也长不出参天大树了。所以我们必须开放，从最根本处开放。我们有足够的能力，也有足够的自信。我们根基深厚，脚跟稳稳，开放绝不会迷失我们自己，封闭僵化才会失去我们自己。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新的一千年繁荣，必须开放我们的灵魂，再造我们的文化传统，在新的土地上培育出真正的资本精神。

第六章 实践：资本精神与企业家、企业和社会

我 90 年代初从政府机关下海，历经磨难，亲身体验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潮起潮落，逐步感受和领悟到了经济活动背后资本精神的存在，以及这种精神与企业家、企业和社会共同成长，不断发展的历史脉搏。在本章，我想结合自己的实践，对资本精神与企业家、企业和社会的关系作一些分析。

资本精神与企业、社会的关系

市场竞争实质上是企业的竞争，企业的竞争主要取决于企业家的竞争，而企业家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和发展又和资本精神的发育密切相关。或者反过来说，有什么样的资本精神，就有什么样的企业家；而有什么样的企业家，就会有什么样的企业和社会乃至社会。企业家、企业都是社会存在的一部分。资本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它和社会存在之间构成辩证关系。伟大的事业需要并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

资本精神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唯物主义认为，精神来源于实践，有什么样的实践，就有什么样的精神。资本精神是随着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资本精神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资本精神如同一朵孱弱兰草，长期处于风吹雨打之中。我 2005 年和几位领导同志一起开车重走丝绸之路，从西安经河西走廊一直到新疆天山南北。一路游来，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帝王足迹仍到处可见，一些著名的外交家、军事家、诗人、文学家的流韵遗风乃至一些美女芳影都历历在目。班固墓、苏武墓、李广墓、霍去病墓前人流如织，杨贵妃墓前更是热闹。许多文人墨客在这些地方留下华美诗篇，有感叹，有惋惜，甚至还有为贵妃鸣不平之声。有诗曰：渔阳鼙鼓震秦关，不信曲江信禄山；祸端自是君王起，倾国何须怨玉环。历史悠悠，往事如烟。可一路游来几乎没有发现商人的踪迹。应该说，我国古代形成的是一种官商结合的朝贡贸易体系，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主要还是商人开辟的，马队、骆驼队把丝绸、陶瓷等运到西方，再从西方把西红柿、辣椒等农作物的种子运回中国。多少艰辛事，连日后的笑谈中都找不到了。在西安出土了一个商人的墓碑，这商人是粟特人的头目，粟特人是当时最活跃的一支商人队伍。在当时的长安有聚集地，类似现在的唐人街。他们还有自治机构。但现在出土的这块墓碑上的文字国

内竟无人认识。一支在历史上活跃了一千多年之久的商业民族最后竟然连文字都没留传下来。在《二十四史》里除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为商人写过传外，很少能见到商人的身影。由此可见，一部辉煌壮丽的中国历史是轻商的历史！商人们很难在历史上有自己的地位。以至于历史上的商人们在致富之后或受土地为本观念的影响而广置地产，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土地资本，使本是摧毁封建自然经济结构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巩固这种结构的武器；或在富贵无常的心态支配下肆意挥霍，及时行乐；或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压制下为求生存与发展，大量钱财用于行贿赂买官。在政治主流下，士农工商的排序也就不足为奇。由此，中国商人资本要保持持续的增值冲动，且实现由流通领域向生产领域的转移，这不仅依赖于社会交换规则的健全和完善，而且依赖于整个社会心理结构的改变。在中国封建社会这样的背景下，资本精神是长不大的。

改革开放以来，在商品大潮的强力冲击下，追逐金钱的活动，在中国从未形成这样一种全民参与、铺天盖地的金钱潮；对金钱意义的张扬，也从来没有达到这样一种藐视任何道德法则的地步。那时人们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也仅仅限于生活中的一些经历而已。给作者印象深刻的经历有两次。一次是在湖南株洲街头看到有人在吆喝：“瞧一瞧，看一看，神奇的东西呀，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聪明的人看了会

心一笑，愚蠢的人看了胡说八道！”在那人的极力吆喝下，排队去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我当时也感到有些好奇，也跟着排队去看了。但五块钱看到的，原来只是一只长着绿毛的乌龟而已。看后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但是谁也不愿自己充当愚蠢的人去说破真相，只好一笑了之。还有一次我去海南出差，晚饭后到市中心溜达。只见街上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依顺序到一个木柜前面引颈观看，旁边写着收费五元。我又一次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交钱去排队。到了柜子前面，有人划亮火柴，借着火柴火一看，原来柜子里面站着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女人。每个人只看一根火柴的功夫，火柴灭了，就轮到下一个观看。这就是生财之道！这就是 90 年代初社会的部分真实状况。当时社会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是极其肤浅的，不少是停留在设计看绿毛乌龟、划火柴看女人这种层面上。在那种普遍浮躁的情况下，天津大邱庄的禹作敏提出了“一切向钱看”的口号。这也代表当时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引发了追求财富过程中的不择手段的行径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犯罪行为；富易妻、养小蜜的婚姻家庭模式；奢侈性的消费方式；富裕家庭中第二代的不健康成长等等。这都是当时的社会病。少数人依靠权力这根魔杖点石成金，更是加剧了人们的财富饥渴症。风气所及，不少人在工作中不考虑自己的职业操守是什么，只想本人利益最大化。在一个很多人患了金钱迷幻症的社会中，想要以合乎道德的方式去追求财

富，然后把节俭下来的财富进行捐赠是很难的，甚至会被认为是病态的。但资本精神仍如同长在岩石缝中的青草，只要有雨露，便会茁壮成长。如从做勤杂工起家的富商彭立珊，致富后不忘回报社会，1988年购买了20台公交车，无偿捐献给长沙市政府。这20台公交车被命名为“彭立珊专线”，至今仍成为长沙市连接河东河西的主要交通工具。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资本精神也不断发展，逐渐得以彰显。国内企业在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中，逐渐认识到企业品牌的价值，出现了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如海尔。海尔总裁张瑞敏认为：企业对用户真诚到永远，才有用户、社会对企业的回报，才能保证企业向前发展。另一方面，国家也逐渐认识到市场经济中诚信的重要性并设立了3·15消费者权益日。在国家主导的这种讲诚信、守信用氛围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们认识到，追求企业的持续发展必须要有社会责任感。企业不仅要为股东负责，还要对消费者负责，对合作伙伴负责，对社会大众负责。做有责任的企业，对企业家、企业、社会是个多赢的选择。

同时，国家把对产权的保护写入了法律。2004年，十届全国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首次写入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一突破性规定，使私有财产权上升为宪法权利。2007年，全国人大通过了物权法。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有恒产者有恒心”，保护国家与公民的财产权利，从而激发了中国 13 亿人创造财富、爱护财富和积累财富的热情，推动着经济发展，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孔子云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今天，均已非平均主义的均，而是均衡之均，是财富创造机会均享与机制均等的均。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合理地追求财富，合理地消费财富已成为许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富裕起来的企业家们开始考虑怎样合理有效地处理自己的财富。企业家们对慈善理念逐日接受，企业家回馈社会的慈善捐赠也逐渐增多。自 2004 年中国政府颁发新的注册基金会管理条例，允许非公募包括私人 and 企业的基金会登记以来，目前提出申请和准备申请的企业和个人达 30 多个。

资本精神的历史发展。可以说，财富被创造的过程就是世界形成的过程，一代又一代人对财富的渴求彻底改变了原有的社会，催生了新的时代。伴随财富创造的历史进程就是资本精神的不断发展。从远古到近代再到现代，资本精神如恒久不灭的灯塔，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国家有兴亡，王朝有更替，只有这种精神，始终顽强地向前发展。它有时如同一株小草，只能寂寞孤独地开放；有时却化为原野里迎风舒展的遍地春花，再化作滋养万物的春泥。从时间上来说，资

本精神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就存在。在古希腊、古巴比伦、古代中国，我们都能发现他们的痕迹。资本主义精神就是人类在一个特定阶段对资本精神的历史自觉；从空间来说，资本精神存在于全人类，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意识形态都普遍存在。从秦、汉帝国到古罗马，从阿拉伯人到英国人，从伊斯兰教到新教，这种精神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从普适性来看，资本精神与普世的人类道德精神联系紧密，与公平、正义、善和良心相连，超越于肉体，超越于物质，超越于现世。

资本精神的发展，也呈现出自身的规律性：无论生产力发展水平怎样，也无论社会制度如何，只要有剩余财富的地方，就存在着资本，而只要有资本的地方，就会有资本精神的发育！

资本精神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资本精神是人类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人类在未来的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资本精神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促进社会不断向前发展。在一种文化的经济伦理中，人们对待财富的态度，是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观，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民族的经济行为模式。一旦缺乏伦理约束，人类对财富的追求和使用就必然会出现盲动。资本精神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动力，对经济的

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缺乏资本精神的支撑，追求财富的欲望最后必然沦为纯利欲的冲动，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泯灭、财富的浪费和社会秩序的混乱，财富的积累就难以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资本精神的支撑，社会慈善事业也难以健康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的发展一定是以社会财富的增长为前提的。资本精神以终极关怀为核心，包括经营哲学、行为准则、人格追求等内容。只有建立以资本精神为核心的经济伦理规范，才能使浮躁飘荡的人心有所归依，使茫然无措的行为有所参照，使穷人变成富人，使富人变成好人，使社会和谐发展。这无论是对一个国家，对一个社会，还是对一个民族来说，都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建设。

15 世纪末 美洲新大陆的发现 致使美洲金银大量外流。而美洲金银的最先攫取者是西班牙，但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却是英国。“西班牙就像一张嘴，填进食物，咀嚼食物，仅仅为了把它送进别的器官，除了经过的气味和偶尔粘在牙齿上的一点碎屑外，没能留下任何东西”¹。甚至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阿根廷和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美国，它们后来的国运和成就都大相径庭。探究其原因，应该是跟英国经济上的进取精神紧密相关。美国学者道格拉斯·C 诺斯说：“如果一个社会经济不能增长，那一定是因为它不能激发起经济

¹ 张宇燕 高程著：《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 年版，第 47 页。

上的进取精神。”英国的历程，从反面验证了这一命题。这种经济上的进取精神也就造就了日后英国工业革命的产生。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如果企业家、企业、市场没有一种精神，就等于企业家、企业、市场没有灵魂。没有灵魂的发展是没有生命力的，因而是不能成长的。“资本精神”就是这种市场经济发展的活的灵魂。

资本精神与商道

被韩国企业当作“企业圣经”的《商道》自出版以来，在亚洲被译成多种文字，持续热销。《商道》是试图给现代人指明一条商业正道的小小说，将经商做人的世俗智慧提炼升华为“道”，它深入挖掘民族传统文化传统之根，悉心诠释独属东方的商道精神，最终找到了解读为商和做人的密码，被誉为“参悟商业最高境界”的奇书。小说讲述了19世纪朝鲜巨商林尚沃从一个卑微的杂货店员成为天下第一富商真实而传奇的一生以及他的赚钱之道和花钱之道。林尚沃一生角色复杂多变，历经三次生死劫难的他，实现了从商人到商道之人的转换。三次危机使林尚沃悟出了权、财、色对人的价值和意义，得出了“财上平如水，人中直似衡”的真谛。并为之明言：财物跟水是一样的。水只是随着地势的高低而流淌，流水不腐，如果想拥有它而把它固定，水就失去了生命力，

成了死水。所以，水只能流着，而不能拥有，财物也是这样的。财物原本没有你我之别。我拥有的财物只不过是暂时停留在这里，但人却总想把原本没有归属的财物据为己有。如果能把流水用手握住，也只能暂时将水握在手中，水终究会从手中流失，复成空拳。人也一样，人生来并无贵贱、贫富之分。所以，只要是人，无论是谁都应像秤一样正直。

从商、经商、缔造商业王国是许多人的梦想。生活在两百年前李氏朝鲜的林尚沃至今还被人们称道，不是因为他是富可敌国的天下第一商，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大写的人，身上充分体现了资本精神的要求。他虽一直都是被动地适应，但能做到顺势而为：靠自己的人格成功，成功之后又回报社会，散尽千金，退隐田园。财富于他如浮云，他要做的是事业，而不是敛财。钱象征他的成功，并不是他追求的终极目标。在中国商业史上，从明清时期的十大商帮到当代的五大新商帮，他们创造的中华商道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和深刻的启示。旧商帮有以诚信为德、真善为本等富含儒韵的商道文化；而新商帮既继承传统又有突破。这些商人虽然时代不同，但都是在东方文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在东方文化中，成功的人生，无论是从政、为文还是经商，都是从做人开始的。他们作为时代的成功商人，对诚信的持守、对欲望的节制、对财富的豁达等等，是现代企业家们所应该效仿和借鉴的。经商先做人，这是古今中外一条颠不破的真理，

一个缺乏应有的道德修养的人是不太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商人的。因此，怎样做人成为中外商道之首道！亦可谓商道即人道！

从韩国林尚沃的成功经验和中国明朝大商人沈万山身败的教训，不难发现在封建社会惟有像林尚沃仿效中国商祖范蠡功成身退后的大义散财，才能避免封建王朝时刻犹存的对商人私产恣意掠夺的“杀身之祸”。正如古希腊神话中伊卡罗斯的父亲代达罗斯的告诫：“我们的翅膀并不是真的什么翅膀，只是用蜡制成的人造翅膀……你飞得越高就离太阳越近，你的翅膀就会被太阳融化”。

老子将“道”的本义从“行路”升华为宇宙的自然法则，是天、地、人等一切事物的本体，成为渗透中国文化各个领域智慧与精神的主宰。商业之道应成为企业家永恒的精神追求。那么，当今商道的内涵是什么？作者认为就是要努力地创造财富、节俭财富然后再让财富回归社会。也就是要实践资本精神。实践资本精神，追求商道，是我们这一代企业家和经济理论工作者的重要职责。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实践，作者深深地感到做一个优秀的商人，应该在做好人的基础上，把握市场运行中的诸多要素，在市场上方能出奇制胜，乃至百战百胜。企业家的“德”与“智”贯穿企业运作的始终，“小赢可靠智，大赢必靠德”。厚德方可载物，有多厚的德才能承载多重的物。企业家的诚实、宽容和善待是现代企

业成功的基本的人格前提。我对市场感悟的提炼，虽不能称为道，但都是真实心得，在这里姑且把他们称之为“法则”吧，写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

第一，“三讲”法则。

三讲首先是讲责任。作为一个有使命感、有责任感、有良心的人，不管做什么，都要有承担责任的态度。今天的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需要一批本土企业家的集体崛起。当代企业家必须克服成长的烦恼，摆脱生存之艰难，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寻求集体突围。我们应当清醒的认识到：没有世界级的企业家，没有世界级的企业，中国的和平发展、中华民族的振兴就难以实现！我们就只能成为一个不入流的国家、一个不入流的民族！就不可能在强手如林的今天和未来跻身一流的位置！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是当代企业家应有的一种境界，而企业家的尊严首先应来自这种境界。当然，企业家最基本的责任还是经营管理好企业，使其真正成为现代企业。

企业家管理企业应遵循以下标准：一、效益标准。企业是经济运行的基本单元，是物质财富的承担者，因此，企业一定要产生效益，不讲效益的企业原则上不是企业，最多只是借助企业运行的方式来运作的社会单位。对企业而言，效益是生存的必要条件，而且是达成更重要目的的手段，效益就像人体需要的氧气、食物、水和血液一样，这些东西不是

生命的目的。但是，没有它们，就没有生命。企业只有有了效益，才会有积累，才可以有余力回报社会，否则，连工人都养不活，谈何创造社会价值，更谈何回报国家和社会。追求效益是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

二、人本标准。人本标准指的是企业的参与者无论是管理层还是一般员工，都应能从企业的发展中受益并且都能使自身得到发展。一方面，要使企业不断增长的经济效益转化为企业员工能分享到的利益；另一方面，企业还要为员工自身的发展提供各种便利。人不是企业发展的手段，应是企业发展的目的。这是人本思想的根本要求。企业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人才的竞争。企业只有筑得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因此，企业除了用事业留人，用待遇留人外，还要用感情留住人才。

三、科学化标准。管理是一门极其重要的科学。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管理被作为生产力的第四个要素。所谓科学管理就是对人、财、物的协调，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财尽其能。目标、战略、结构、制度都是管理中的重要因素。企业只有做到科学管理，才可能实现科学决策。

四、国际化标准。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对企业国际化标准的要求越来越迫切。国内企业与国际企业的对接，是中国经济腾飞的要求。这不仅是对企业器物层面、制度层面的要求，更是对企业思想上精神上的要求。市场经济浪潮中的企业，不仅要遵守国际游戏规则，引进国际先进制度，还包括对世界商业文明的研究和遵从。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企业创造神话的时代，而企业家就是神话的主角。企业家要想创造神话，实现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就必须把所有的决策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有真话才有神话，假话只会导致鬼话。讲责任就包括讲诚信。中国一直以来不缺少诚信这种道德资源，无论是儒家、佛教还是道教，都讲究一个“诚”字，“诚”在中华文化里具有很高的地位。但是，我们的前人，没有很好地把“诚”字运用到工商业领域中来。所以有“无商不奸”的说法，认为商人都是奸诈的，致使本来最需要诚信元素的领域，最缺少的偏偏是诚信。应该指出，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治经济、契约经济，同时又是一种道德经济。没有诚信的企业家是骗子商人，没有诚信的企业是流氓企业，没有诚信的市场是无序市场，是没有生命力的市场。

其次是讲义气。企业家所讲的义气是指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企业家应有的正气、大气、霸气和灵气。

正气是一种浩然之气，这种正气首先体现为一种市场人格，如不畏强暴、不仰权贵、不凌弱小、不为五斗米折腰等等。一个商人，一个企业家具有了这样的品格，他就会赢得社会的尊重与支持。相反，如果一身邪气，他就会被社会鄙视并最终抛弃。正气亦非江湖之气，作者不反对做企业的人有些江湖义气，但决不能只有江湖义气，像梁山泊好汉们一样只有那种义气是做不成大事业的，也成就不了大企业和大

企业家的。

大气是一种魄力、大势，是一种大的胸怀的表现。一个企业家在市场上有了宽阔的胸怀，才会有气魄和胆识，才会敢于决策，敢于拍板！说白了才会敢输敢赢！相反，一个“小气”的人是成不了企业家的，一个在市场上胆小怕输的人是很难成为市场大赢家的。

霸气是指企业家做好企业的决心和勇气。企业家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很多意想不到的挫折，甚至会出现企业的经营进入低谷，在这种时刻若没有坚强的决心和克服障碍的勇气，就会打退堂鼓的，事业就不能发展。

灵气是指精明之气。市场上讲精明是指在市场上对人和事把握的准确度。企业家经营企业犹如画家作画，一定要追求一种完美度。只有精明，才可以帮助企业完善这种追求。因此，精明不是一般意义上讲的小气，一个精明的企业家该“小气”时一定要小气到吝啬的程度；该“大气”时一定要大气到一掷千金的水准。怎么把握？唯有靠精明之气——灵气。

三是讲原则。市场上应遵循的原则极多，不同文化背景下有各自不同的商业原则，我在这里只想强调这样三条原则：第一、违背国家基本法律和危害民族利益的事绝对不能做！再大的利益诱惑，如果违背国家基本法律或涉及到危害

民族的根本利益，企业家必须放弃！这是一个民族企业家最基本的责任！第二、违背基本道德准则的事情绝对不能做！这里讲的基本道德准则的对象，包括企业产品所服务的顾客、合作伙伴和企业员工等一切与企业、企业家相关的人！当然，市场是不相信眼泪，有人成也有人败，今天成也可能明天败。如果大家同为市场的参与者，并且在同一市场规则下参与运作，胜败只是一种市场行为和结果，不存在恶意伤害。但如果运用非市场手段或利用市场法则的不完善刻意去伤害他人，那就是市场的败类！第三，争取市场利益的最大化。企业家、企业是为赚钱而存在的。虽然，有时企业、企业家为了大局或根本利益要舍弃一部分利益甚至让企业亏损，但总的来讲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企业家、企业最重要的目标之一。企业不是政府，也不是慈善机构；企业家不是官员，也不等于慈善家，企业家就是财富的创造者！

企业家的责任、义气和原则三位一体方能内化成优秀企业家的素质。

第二，“底线 - 目标”法则。

这里讲的底线是指运作企业最起码应具备的或不能再突破的条件。底线分为客观性底线和主观性底线。客观性底线是指企业以外的非人为要素形成的最基本的客观条件，如国家法令、行业政策等。主观性底线则主要指企业运作中合作伙伴、服务对象以及内部员工的最基本价值取向和正当的

利益诉求。这些都是经营企业应该坚守的。底线问题是不能回避的，它有时候会成为人生沉浮的分界线、事业成败的关键点。在中国商业史上，被称为红顶商人的胡雪岩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个商人。他生意做得很大；也牟取暴利赚了大钱，在借洋款、买洋枪等活动中，扮演着买办角色。但当他眼见外国商人几乎垄断了中国生丝买卖时，为了民族利益便以巨款买下当年全部生丝，与外国商人作价格竞争。在与外商的丝茧大战中，他分明又是散发出民族之光的一个悲剧英雄！而且，胡雪岩在经营管理上主张戒欺、真不二价，这些都是他经营企业的底线。所以尽管胡雪岩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者不足，但他那坚守国家利益，坚守诚信的底线仍然值得学习。

目标则是指企业运作中尽最大努力所能达到的目的的标志。经过努力仍实现不了的目的在市场战略上不应成为目标。在作者看来，底线是经营企业最起码的一种状态要求，而目标则是企业运作最佳的一种状态要求，也就是说，底线是企业家心中企业最差会差到什么程度的起点，而目标则是企业家心中企业运作最好能好到什么程度的标志。底线是基础，目标是方向。企业发展中怎样在底线确立的情况下实现目标？

一，以目标定向。在企业的底线——目标中，底线定位，目标定向。方向决定出路。企业经营发展的方向是否正确，就要看目标是否正确。如果方向错了，再能把握底线，目标

也无法实现。所有的企业都有目标，但一个良好的企业目标本身应极为大胆和振奋人心。明确动人的目标可以促使大家团结，能够激发所有人的力量，使人献身其中。目标成为企业大力前进的推动力。同时，目标远非轻易可达，而企业组织里的人应该有理由相信通过他们不懈的努力和辛勤的付出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目标一旦定了，具有相对稳定性，不得随意修改。而实现目标的手段具有相对的灵活性。企业目标是企业发展的指路明灯，如同地平线上恒久不变的星星一样，不会轻易改变。

花旗银行在 19 世纪 90 年代，是一家毫不起眼的区域性银行，只有一位总裁、一位出纳和若干员工，其总裁当时提出了“要成为伟大的全国性银行”的目标。其继任者后来也提出了“要成为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金融机构”。为了追求这个伟大抱负，花旗银行全力冲刺，195 年来一直以此为动力，经历了这么多位 CEO，目标始终未变，这个目标已经深深铭刻在公司机构里，成为花旗银行的一种内在文化。花旗银行现不单为遍及 56 个国家的 5000 万消费者提供服务，也在近 100 个国家为跨国、跨区及当地的企业客户服务。除了花旗银行，没有哪家金融机构的业务和资源足以在如此之多的地方，应付如此之多的需要。花旗银行已成为金融服务的世界品牌。

二，科学设计目标的层次。在确定企业目标之后应分段

设立小目标，并最终实现大目标。波音以“领导航空工业，永为先驱”为公司发展的目标。而制造 P - 26、B-17 轰炸机，研制 707、747、757、767 喷气式客机则是公司在不同阶段的目标。对于波音而言，“领导航空工业，永为先驱”是恒久不变的目标，而致力制造大型喷气式客机是可以改变的非核心部分，可以根据经济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变化而作出调整。

三，底线和目标是一种动态的正相关，目标可以随着企业发展和企业家个人的发展而不断向正方向发展。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汽车在美国还是奢侈品。当时美国新兴的汽车市场一片混乱，有 30 多家汽车公司在激烈竞争。福特只占有 15% 的市场份额。福特在 1907 年提出“我们要让汽车大众化”这一大胆的目标。这个目标激励了整个福特公司员工，他们投入狂热的工作热情，每天晚上工作到很晚。经过努力，福特上升为汽车工业的最大厂商，而通用汽车的市场占有率则从 20% 掉到 10%。当福特实现“汽车大众化”的胆大目标后，没有再及时制定新的目标，变得自满自足，沉醉在我们已经达到了目标的功劳簿里，企业也就没有新的发展方向，眼睁睁地看着通用定出同样大胆的“要击败福特公司”的目标并成功实现了超越自己。

企业的目标与企业底线形成一个有效的内在系统。如波音公司在追求目标的同时，没有忘记公司的底线：珍视产品

安全，应用商用客机历来最保守的安全标准、测试和分析。通用的韦尔奇明确表示，在追求数一数二的地位时，牺牲正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花旗银行在追求扩张业务成为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世界性金融机构时，继续保证和强化本身的服务质量和信誉。

第三，“快半步”法则。

“快半步”这一提法是华安保险公司董事长李光荣先生提出的，他以华安保险公司在市场实践中的事实说明了快半步的重要性。这里作者把它称之为“快半步”法则。所谓“快半步”是指企业家或企业在市场运行中适度领先市场，相当于多走半步的行为。作为市场的先行者，快半步者首先具有引导性、方向性。方向错了，就不是快半步了，就是走乱步了，就不可能引导市场。其次，快半步意味着踩着政策乃至法律的边缘走，这就必然承担一定的风险，具有风险性。市场经济本质是具有风险的，如果参与者没有风险意识或半点风险不愿承担，那绝对不可能成就大企业，也不可能成就优秀的企业家。再次，快半步具有时效性，市场千变万化，今天快半步，明天就可能同步，后天也许就慢半步了。因此，快半步法则要求企业和企业家，必须准确把握快半步的时机。

要想做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必须比市场快半步，这是因为只有走在别人前面才会有先机，才会死在别人后面；跟

着别人后面者一定死在别人前面，市场是无情的。李嘉诚就经常上演“快半步”的好戏。上世纪 50 年代初，李嘉诚敏锐地发现，刚转入和平时期的人们精神需求在极快增长。而塑胶花正好可以满足这一要求，并且塑胶花代替植物花，既可以节省时间，又可以经常变化，适应了现代生活的高节奏。他由此预测，塑胶花的黄金时代即将来临。李嘉诚率先进入塑胶花界，在塑胶花将热时崛起，独占花魁。而正当李嘉诚在塑胶花行业独执牛耳，获利颇丰时，香港等地制造塑胶花的厂家也越来越多，同时他认为塑胶花作为一种装饰品，时间久了一定会令人厌倦，且发达国家多崇尚自然，因此他感觉到鲜花代替塑胶花的日子不远了。很快，他从塑胶花市场中退出，而将盈利和精力投入了缔造以地产为龙头的商业帝国，从红海跨入蓝海，继续开创新的辉煌。李嘉诚在塑胶花中的进入和退出，都占尽了先机，这也成就了他事业的发达。日本商战高手松下幸之助有一句名言：高明的枪手，他的收枪动作往往比出枪还快。

快半步有理！那么与市场同步呢？慢半步呢？

张瑞敏说：“如果有 50%的把握就上马，有暴利可图；如果有 80%的把握才上马，最多只有平均利润；如果有 100%的把握才上马，一上马就亏损。”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民用飞机制造领域，道格拉斯公司即后来的麦道公司一直是行业的领头羊，波音主要替军

方制造飞机，在民航飞机市场根本无足轻重。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波音的军方订单锐减，为了实现“民航飞机市场领导厂商”的远大目标，研发了喷气式飞机，相继推出波音 707、727 等系列，从此世界进入了喷气式时代。而此时的麦道公司还坚守螺旋桨飞机，守旧的麦道公司眼睁睁地看着波音公司不断推出新机型，自己由行业的领跑者变成一个苦苦追赶的角色，最后落到被购并的地步。

太阳神的广告语“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的爱天长地久”仍犹在耳，而这个昔日保健品老大却从市场中消失已久。太阳神从 1988 年走入市场，由于经营得当，迅速崛起，红遍大江南北，其市场份额最高的时候曾达到 63%。随着中国保健品市场的迅速增长和太阳神的示范效应，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疯狂涌入，而此时的太阳神仍固守昨日成功的经验，采取以不变应万变的策略，靠着生物口服液和猴头菇口服液这两个产品包打天下达 10 多年之久，20 多人的科研中心 10 多年来在新产品开发上毫无作为。研发部如此，销售部更为如此。结果从 1994 年开始，太阳神在红火了六年之后，销售量直线下降，大好河山最终拱手让人。

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上，还有一种情形必须指出，即企业与企业比市场快一步或一步以上的情形。

新疆德隆的失败，其中有一个原因，我认为是迈的步伐太快，至少是快了三四步。德隆的决策者们以非常态的认识

框架和价值框架所形成的思想和观念，时常超越现实，总想领先一步，打破陈矩。而他们更多的是看到了富有诱惑力的投资机会和产业整合的机遇，忽略了公司高速成长所带来的潜在风险。在面对众多机遇的时候，德隆这种过于追求扩张的做法超越了自己的承受能力和资源条件，更超越了社会 and 外界环境的承受。

在正常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一个追求企业过快发展的企业家，他要么会成为一个天才，要么就会变成一个疯子。

因此，我们认为，企业、企业家与市场的关系应是：比市场快半步的企业家是高人；与市场同步的企业家是能人；比市场慢半步的企业家是庸人；比市场快一步以上的企业家要么是天才，要么是狂人。

那么，企业家怎样才能成为市场中的高人呢？作者的感触是：一要靠学习；二要靠悟性；三要靠运气。学习具体包括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一切有作为的市场成功人士学习。只有学习，才会形成悟性，才会有所谓的运气，才能成为有德有知之人。因而，企业家要作市场的高人，那就学习！学习！再学习！

第四，“常胜”法则。

毛泽东是是 20 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当国民党武装对共产党军队进行全面围剿时，他高举抗日大旗，冲出重围，北上抗日，历经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开辟了新

的根据地；面对日本侵略者，他又提出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法的战略思想，成功地使八路军、新四军在深入敌后的同时，也迅速地壮大了自己；当共产党取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后，他又不失时机地发动了跨过长江的决战。

如果从战略上总结一下，我们发现毛泽东的军事战法有以下特点：一、有必胜的信念；二、能打赢时一定不放弃，坚决打到底；三、战争条件暂时不具备，难以取胜时，毫不犹豫放弃，暂时不打；四、虽不能立即取胜，但又必须打时，利用自己的优势，在保存自己的前提下避开正面战场巧妙地打，取得每一个局部战斗的胜利。最后，待条件转化达到成熟时，再由守变攻，直至取得战争最终的胜利。

商场如战场！如果我们认真地思考一下，毛泽东这些军事上的高超智慧何尝不正是我们商战中需要的智慧呢？我们认为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商战，常胜将军是难以产生的。有的成功者之所以被称为常胜将军，是因为这些成功者在制定战略时，只选择能打赢的仗打，明知打不赢的仗放弃打或暂时放弃打。当然，有时为了大局，有些打不赢的仗也要打，可这是另一种胜利。

在市场运作中，企业家要想常胜，应坚持什么？放弃什么呢？

我们认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至少应坚持这样的基本思路：不违背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前

面谈了这也是一个民族企业家的最基本的职责 ;作强作大企业的迫切愿望。企业家要把作强作大企业变成自己的一种欲望、一种激情 ;规范化经营理念和有效的赢利模式 ;以企业职工和服务对象为本 ,以现代科技和现代经济运行手段为工具的科学发

展观。

放弃什么呢 ?

不懂的行业和项目应坚决放弃。当然 ,所谓懂不是对相关的技术、运行全部精通 ,但对某一个产业、某一个产品一定要懂得它的基本市场需求、基本技术特点、未来该行业产品技术的基本发展前景等 ,如果这些全不懂绝对不应投资 !三九集团就是一家迷失在不懂领域陷阱中的企业恐龙。三九在开发出三九胃泰和正天丸等一系列产品后历经数次多元化扩张 ,经营领域横跨医药、汽车、食品、酒店、商业、农业、媒体等 8 大产业 ,控制了三九医药、三九生化、三九发展三家上市公司和数百家直属企业。到 2004 年 ,这家通过多元化之路胖身成为企业恐龙的庞然大物 ,面对的却是分崩离析的危机 ,最终轰然倒塌。三九的多元化经营增添了对非药行业的陌生感 ,增加了经营中的不确定性。当多元化扩张不能提供正方向的叠加效应时 ,企业离失败也就不远了。

虽懂 ,但无法控制的 ,应坚决放弃 !有的行业、有的项目虽好 ,企业家也懂 ,但由于或缺少管理人才、或管理半径太大而鞭长莫及等没有条件控制到位的一律不应投资 !

虽懂，亦可控，但其他条件，如资金、人才、销售渠道等不成熟的行业和项目坚决不做！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很多企业在实施多元化战略时，常常抱着这种想法。但海尔却有独特的理念：东方亮了，再亮西方。例如，海尔在多元化经营中坚持的原则是先把自已最熟悉的行业做好、做大、做强，在这个前提下，再进入与这个行业相关的行业经营。虽然家电产品的相关度较高，但每上一个产品，从冰箱到冰柜再到空调、洗衣机，要打上海尔的牌子，必须经过内部论证，认证分五级，有的产品差不多要过上好几年才能打上海尔的品牌。条件成熟了，再配以纵向排列实行产品的跟进式推进，占领国内市场是这样，占领国际市场了如此，排在这个金字塔形第一位的是海尔冰箱，随后是冷柜、空调、洗衣机，然后是微波炉、热水器、电话、彩电、传真机。

合作伙伴不适合的行业和项目坚决不做！

第五，“规则适用”法则。

这里所讲的“规则”，包括潜规则和显规则。所谓潜规则，是指人们业已习惯的并为大家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在法律政策上没有明确规定的一些做事做人的行为法则，有约定俗成之义。有些潜规则，对社会是有益的；有的则给社会带来危害。在市场运作中，潜规则还正有着较大的空间。比如市场运作中的适度攻关，在一个人情味浓厚的社会是有一定

合理性的，但这种人情攻关一旦超过了界线就会违规违法，甚至走向商业犯罪。显规则包括企业外部的法规政策和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这是企业家在运作企业时必须遵循和执行的准则。作者认为一个有作为的企业家应做到：

要正确运用潜规则中的有益部分。运用潜规则为企业发展服务，关键掌握两个要点：1、主动运用潜规则而不是被潜规则牵着鼻子走。如企业运作中企业家不能完全避免请客送礼，但决不能把企业的发展主要寄托在人情关系上，而应集中精力把企业经营的事做好，再让相关的人际关系发挥应有的补充作用。2、正确运用潜规则应把握好“度”，一方面是过犹不及，另一方面是违法犯罪的事决不能做。

要坚持遵守显规则。显规则一旦被确立，就应得到遵守。一些企业家不把显规则放在眼里，必然受到惩罚。在金融业，遵守显规则叫“合规”，不遵守显规则就会形成“合规风险”，这也是许多金融机构面临的重大风险之一。前段时间倒了一些大的民营企业，有人说这些企业是生于潜规则，死于显规则。这一点不假。企业家创业初期，运用一些潜规则，只要不违法也无可非议，但企业发展起来以后尤其是相关的法规也完善后，还按原来的老套路行事一定会被显规则打得头破血流。这种教训太多了！因此，显规则就是硬道理。在显规则面前必须人人平等！

要引导潜规则向显规则转化。许多显规则是从潜规则里

总结发展起来的。作为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企业家应千方百计引导企业走出相关潜规则，遵守和实行显规则！及时把一些好的潜规则转化为显规则，而不好的潜规则要坚决摒弃。这样才能使创造财富的源泉更充分的涌现。华安保险的决策者们深知这一点，根据目前财险公司的现状，适时把公司的运作推到显规则上来。尽管当下业务受到了一些影响，但从长远来讲，对行业、对企业一定是有大益的，也得到了社会的好评。

第六，“交响乐”法则。

交响乐是一种大型管弦乐套曲，是多种乐器交合发出的音响所构成的一种奏鸣曲，誉为音乐表现的最高形式。从创作到演奏都要求有较高超的技巧，常用于表现重大的题材、丰富的感情和深刻的思想。一部交响乐作品，一般有四个乐章。第一乐章为快板，多用奏鸣曲式谱写；第二乐章为慢板，采用二部曲式或三部曲式等；第三乐章是中快板，为小步舞曲或谐谑曲谱写；第四乐章即终曲，通常为快板或急板，多用回旋曲式奏鸣曲式或奏鸣回旋曲式写成。并且人数众多，结构宏大，一个交响乐队一般有五十至一百二十人，乐器多达四大类：1.木管乐器组(包括长笛、双簧管、黑管、大管)。2.铜管乐器组(包括圈号、小号、长号、大号)。3.打击乐器组(包括定音鼓、件、钢琴、竖琴)。4.弓弦乐器组(包括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大提琴)。一场成功的表演，常使观众如痴

如醉。而这不仅取决于创作，还取决于乐队、指挥和听众，跟演出者们的团队精神密不可分。要知道，只要有一个人有一点点差错，整场演出都很可能搞砸。这么多人、这么多的乐器在一个指挥的指挥下，共同协作，才能奏响出最和谐之音。在现场表演时，一，它的和谐来自于所有人的配合；二，虽然人数众多，乐器众多，但对每个人的表现观众清楚，指挥清楚；三，指挥在演出结束后，一般都要和几位表现最优秀的演出者握手以致谢，此时，往往也是观众掌声最热烈之际。

交响乐的这种和谐精神在市场经济中也是必不可少的。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首先，需要的是各部门，各分公司的团队精神。在一个团队中，有人从事前期工作，有人从事后期工作。有人在台前，有人在幕后。有人从事技术性工作，有人从事非技术性工作。但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发挥整体作战的精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安分守己，共同为一个团队的目标，才能奏出企业的最强音。其次，在突出一个团队整体的同时，在一个团队中，每个人必须做到“认识你自己”，自知者才能明，才能找准位置，发挥自己的才干。第三，对于一个团队中的优秀个体，企业要及时给予肯定，以形成鲶鱼效应。

第七，“买单”法则。

在特华集团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特华中高层员工，任

何情况下只要朋友们在一起消费，都要主动买单。并要求员工随时准备好一张卡和现金，以防在卡不能刷的时候，用现金支付。此准备之周全，此情之真，此意之切，不可不谓为社会新风。这种做人舍得吃亏的做法背后是一种独特的精神，是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思维势态。具体体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是宁可别人负我，我也不负别人。在处理人与财富的关系上，是做财富的主人，而不做金钱的奴隶。这是一种情怀，更是一种社会担当。

在市场经济中，也唯有能吃亏的人，才能赢得信任，获得尊重。唯有对朋友真诚的人，才可能做到对市场真诚，对客户真诚，对合作伙伴真诚。可谓是吃亏是福。老子在《道德经》中有一句话说：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苏格拉底也有一句名言：美德即智慧。一个敢于吃亏，勇于吃亏的人或企业，才会常收获意想不到的“得”。

第八，“大树——土壤”法则。

在自然界有这样一种现象，凡是落叶的树木，生长一般比较快，因为回馈土地比较多，所以它会从新一轮的生命周期中获取更多的养分。从这种现象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没有土，就不可能有树；二，如果土不肥，树就不能长大长快；三，落叶的树，因为树叶可化为养料，土就容易肥，树也就容易长大长快。

把这种现象引入到市场经济中，就会成就这样一种情

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凡对社会这片土壤奉献大的企业就发展得快，如蒙牛和牛根生。蒙牛销售收入从 1999 年的 0.37 亿元飙升至 2003 年的 40.7 亿元，后者是前者的 110 倍，年平均发展速度高达 323%！在中国乳制品企业中的排名由第 1116 位上升为第 2 位，创造了在诞生之初 1000 余天里平均一天超越一个乳品企业的营销奇迹！“蒙牛速度”，成为中国企业的一面旗帜。蒙牛极速成长的奇迹，在传统工业来说，可以用空前绝后来形容。为什么蒙牛能够有这样的成就，作者认为最大的原因是蒙牛董事长牛根生的经营智慧与跳出传统思维的财散人聚的超人生观。牛根生认为蒙牛作为社会企业，如果要永续经营，散财聚人是关键，为此牛董事长不惜将自己的股份全部捐出，10 亿人民币说不要就不要。这种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回馈社会的做法在企业内部，能够聚揽人才，激发员工工作热情；在市场上，善于抢占客户、抢占消费者，建立企业品牌的美誉度与忠诚度。正所谓：舍得舍得，有舍有得，小舍小得，大舍大得，不舍不得。

用资本精神引导企业、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

企业是现代经济的火车头。在现代社会，社会财富，特别是物资财富主要是通过企业来实现的。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财富的增加，企业与社会的关系也就越来越重要。而要培养世界级的企业，首先要培养世界级的企业家。企业家的高度决定企业的高度，企业家的胸怀决定企业的胸怀，企业家的境界决定企业的境界。在现代企业经济里面，企业家是最稀缺、最珍贵的资源。我们必须承认企业家在创造社会财富过程中的特殊作用，财富和财富的创造者必须受到尊重，同时企业家也必须以自己的行为来证明自己值得人们尊重。如果你的财富只是用来满足你自己的私欲，不管你有多少财富，人们也没有理由尊重你。在财富被创造出来并积聚起来之后，企业家必须学会如何处置财富。因为，社会对企业家的道德要求要高于一般人，所以他要“自觉地”承担用自己的财富去帮助别人的责任。如果企业家仅仅是为自己赚钱，赚了很多的钱又不愿拿出来，财富将会出现两极分化，分化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出现社会的对立、分裂，甚至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最终使大家都付出更沉重的代价。所以，企业家必须对企业负责，也必须对社会负责。同样，社会也必须为企业、企业家的创造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给他们以应有的保障和尊重。对于双方来说，这都不是一种完全利他的道德行为，在本质的意义上讲，也是对自己最有利的理性选择。当然，企业、企业家承担社会责任必须是自觉的，也必须是可行的和自愿的。

中国目前，一方面，仇富心态不断抬头。仇富心态的产生，除了和我们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文化传统有关，还和我们现在的贫富差距过大的现状有关。“凡是能显示社会贫富差距的指标，在中国都呈现出一种迅速恶化的态势。第一个指标是基尼系数，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在 0.3~0.4 之间为比较合理，把 0.4 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0.4-0.5 表示收入差距过大，超过 0.5 则意味着出现两极分化。2005 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调研报告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 0.46。第二个指标是城乡差距。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在 1.7 倍以内，只有少数国家超过了两倍。我国的城乡差距已达五、六倍。第三个指标是地区之间的差距。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 2005 年度人类发展报告说，如果贵州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人类发展指数仅刚刚超过纳米比亚；如果把上海比作一个国家的话，其人类发展指数则与葡萄牙相当。第四个指标是行业之间的差距。垄断行业和其他农林牧副业的收入差距巨大。”（以上内容参见中国经济时报 2007 年 3 月 7 日文章《改善收入分配 实现社会公正》）不仅如此，由于真正完善开放的市场经济还没有出现，所以富人在很多领域不是完全靠自己的竞争力，不是靠市场行为，而是靠非市场因素，这就

造成了更多不公平。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现在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企业家不仅需要掌握创造财富的手段，还需要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用来照亮前行的道路，凝聚人们的力量，统筹协调社会的资源，保证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我们所说的资本精神，就是这种能够指引我们的企业长期持续发展的灵魂的那么一种精神。一个没有精神和道德理想的大阔佬，不等于大企业家，靠这样的人无法打造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一个六神无主的人做不成什么大事；一个没有使命感，没有精神追求的企业不大可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企业，也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努力地挣钱，努力地省钱，努力地为神圣的目的而花钱。这是一种神圣的精神。这种精神的神圣性，表现为人和社会对于增加财富、为神圣目标使用财富的极其强烈的欲望和激情。挣钱、省钱、把钱为神圣的目的而花出去变成一种欲望，一种激情。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中国当代企业家首先应当努力地挣钱。企业家在遵守法律、伦理经营的前提下尽可能经营管理好自己的企业，多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由资本的本质所决定的，是由企业的特性所决定的，也是由市场经济的本质决定的。一个发展蒸蒸日上的企业不仅可以使社会财富实现增值，还可以使众多的员工获得就业机会，可以使合作伙伴持续发展，可以为顾客提供合格安全的产品和服务，可以为政府提供税收。

但企业家也应该明白财富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财富是

属于全社会的，全人类的。富人只是财富的社会管理人。这也就是说，在法律上，财富是私有的，但在道德和价值层面，超过生活需要的财富就是社会的。当面对人类的疾苦、贫穷和不幸时，企业家们没有理由在不影响企业发展的情况下，不尽最大努力去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一位旅美作家写道：西方的富人在富起来之后首先要通过乐善好施和厉行节俭来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获取社会的尊重，这种意识在后来逐渐演化成了统治文化，主宰现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于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

从 20 世纪末开始，企业公民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企业公民是指：企业是社会的一个主要部分；企业是国家的公民之一；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之一，在创造商业利润的同时，还应积极承担社会公民的责任，以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等方式来回馈社会。慈善对企业、企业家和社会是一种“多赢”的选择。既能促进社会和谐，又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还能改善企业家的道德形象。

第七章 实践：中外慈善事业发展

慈善在本质上一种文化现象，是至善道德的表现形态。在人类历史上慈善是一种世代相传的传统美德。虽然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文明关于慈善思想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是其核心理念却是极其相近和相通的。因为慈善体现了人类共同的、普遍的至善的价值取向。儒家的“仁”，佛家的“慈悲”，基督教“博爱”，都蕴含着人类永恒的理想和普遍的道德追求，成为中西传统慈善活动的道德指引。当然，由于各自社会的特点、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传统的慈善活动带有浓厚的人伦精神，西方传统慈善活动则具有鲜明的宗教色彩。通过历史的比较，认识这些传统，对于我们选择资本精神作为今天慈善事业的指导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民族的传统慈善观及其实践

中华民族提倡勤劳节俭，又乐善好施。慈善文化和慈善事业在中国古已有之，并源远流长。带有“慈善”意义的敬

老爱幼、扶危济困已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奉行的一种道德规范。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慈”就是“爱”的意思。汉代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慈，爱也”。唐代孔颖达疏《左传》有云：“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又曰：“慈谓爱之深也”。它尤指长辈对晚辈的爱抚，即所谓的“上爱下曰慈”。

“善”的本义是“吉祥、美好”，《说文解字》解释：“善，吉也”。后引申为和善、亲善、友好，《管子·心术下》中所说“善气迎人，亲如弟兄；恶气迎人，害于戈兵”即是此意。

“慈善”二字合用，在我国的典籍中当首见于《北史·崔光传》：“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沉浮，自得而已。”此处的“慈善”应是“仁慈”、“善良”、“富于同情心”的意思，而在此之前，《韩非子·内储》：“王曰，慈惠，行善也。”即以慈爱之心有所给予来做善事。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时期，我国关于慈善的文化思想就已经开始系统地出现了。最为著名的是儒家的“民本”、“仁政”和“大同”思想。孔子以“爱人”释“仁”，将能“爱人”作为人的一种本性，所谓“仁者人也”，无疑是对氏族社会原始人道主义观念的回归和发挥。孔子还向人们描绘了人与人之间以仁爱为价值原则的具有原始共产主义特征的理想的大同社会，即《礼记·礼运·大同》中所描绘的“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孟子在“仁”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的主张。他说：“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认为，恻隐之心，不但为行“仁政”之始，也是每一个人的行为准则。基于“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孟子又提出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的社会互助观。孟子主张的仁政措施是：“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举免于死亡。”他还以伯夷为例，说明何谓“善养老”。由此可见，孟子更多地注重仁爱的实践意义。

这里还不得不提墨子的兼爱思想，他希望“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但是在战乱时期这种理想是无法实现的。令人遗憾的是，颇受梁启超青睐的墨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也甚微。

儒家从孔子到孟子，从仁爱到仁术，形成了系统化的社会慈善思想。在社会慈善方面，儒家是主张政府积极介入（“民本”、“仁政”）和提倡民间互助互济（“大同”）的。但是，显而易见，其目标重在社会控制。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孔孟之道得以继承和发扬，儒家的国家积极干预思想一直得到贯彻。从韩愈的“博爱”到张载的“民胞物与”，仁爱思想一脉相承，并得到发扬光大，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道德构建和慈善实践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从时间上看，中国历史上的国家介入济贫发端于汉朝，比英国的伊丽莎白济贫立法要早 1000 多年。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唐均曾撰文指出：“在儒家的济贫思想中，注重的是社会整体和国家控制，而较少强调个人权利和国家义务。同时，中国古代的济贫实践在传统上较为注重运用政府行政手段，而没有采用立法手段，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憾。”

从村落家族的义庄、义田、义塾到宗教寺院的救济贫病的行善，从政府的开仓赈灾到社会的慈幼济贫，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济贫帮困的优良传统。在中国传统的慈善活动中，有四类团体起着主要的济贫帮困作用，分别是家族、宗教组织、政府以及社会团体。事实上这四类团体的施善也就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四种慈善类型。虽然这四种慈善类型并不表现为单一形态的依次更替，而是在同一时期处于并存状态，但大致上还是看得出其历史变迁的轨迹及其纵向发展路线。需要指出的是，随着近代以来基督教的进入和扩展，教会和信徒成为宗教慈善，以及社会慈善的一股重要力量。

以拯救世道人心，济贫扶弱为基本内容的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仁爱”思想之上的人道主义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具有极其强烈的实践性特征，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下，由封建王朝政府和社会精英推动的慈善救济工作相当发达。从汉唐时期的宗

教慈善到宋元时期的政府救济，再到明清时期蓬勃发展的民间慈善事业，无一不是深深打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慈善思想的烙印。在中国，由社会团体举办慈善事业自古有之，但直至民国时期才首次成为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要形式。当时灾害频发，战乱连年，以致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中央政府为维护统治，疲于应付各种事变。即使有心顾及黎民，也力不从心。由于政府救济不力，大量的救济工作便只得由慈善组织来承担。这一时期，无论是慈善团体的数量，还是慈善家群体，在中国慈善事业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西方慈善观念与实践

西方慈善观念与实践主要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的基础上。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基督徒们以其对上帝的信仰为精神支撑和价值根基，效法基督耶稣，自觉地培育和形成了博爱、罪感、谦卑和忏悔等道德情感，并推动了现代西方的慈善事业。

基督教作为一种带有浓厚道德色彩的宗教，从它诞生起就极其注重培育信徒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情感。

基督教言称“爱人如己”是基督耶稣启示的两条基本诫命之一，因此，人们应该不分亲疏厚薄地泛爱和互爱，人与人之间不应有仇恨，甚至仇敌也应得到帮助和受到宽恕，人

人相爱如兄弟姐妹。换言之，爱上帝，也爱你周围的人。此外，耶稣还特别强调对弱者的爱。他既不嫌弃罪人、妓女、税吏等被社会遗弃的人，也不敌视冒犯自己的人。圣保罗也告诫基督徒，爱是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显然，基督教的博爱超越了民族、肤色、阶层、性别、文化和国家的界限，带有浓厚的普世主义色彩。

与儒家“爱有差等”的仁爱相比，基督教的博爱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博爱是对人类与生俱来的同情心和血缘亲情这一类自然情感的否定。二是博爱排除了对道德回报的期待。从一定意义上说，基督教道德中包含有“为爱而爱”、“为道德而道德”、以博爱自身为价值目的的崇高精神。

在整个中世纪，大多数基督徒关爱弱者、病人、穷人以及下等人，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心和爱心。他们将收入的 1/10 捐给慈善事业，用来帮助寡妇、孤儿、残疾人、病人，为穷人提供葬礼费用，有时还出资赎买奴隶。长期以来，基督教会始终遵守一条普通规定，就是以教会入款的 1/3 或 1/4 分给穷人。此外，每逢重大节日，基督徒还必须特别募捐以救济穷人。就这样，基督徒用他们的博爱精神推动了西方慈善事业的发展。

基督教教义认为人原来的本性是“好”的和善的，但是，当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因偷吃禁果而被上帝驱逐出伊甸园之后，人类就有与生俱来的“原罪”。在“罪感文化”背

景下，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着沉重的负罪感，倾向于以信仰上帝和禁欲主义来保持崇高的道德境界。慈善成为“赎罪”的一种形式。

基督教反对假冒为善的虚伪和诡诈，提倡个体要以一种谦卑之心去行善积德。反之，若一个人在道德实践中持有骄傲心态，则失去了道德价值之本真。在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的所有神职人员，上至教皇、主教和修道院院民，下至普通修士，都秉持谦卑之心做慈善行为，为穷人洗脚，为穷人做饭，为穷人牺牲自尊。

因为基督教的“原罪说”，在这一原罪意识上所产生“人之初，性本恶”的基督教“罪感文化”，同中国儒家“人之初，性本善”思想显然不同。为了救赎罪恶，人人都需要相信上帝和其派来的救世主耶稣来“赎罪”。只要顺从了上帝的一切交排，死后灵魂就能升入天堂，否则在世界末日审判时会被投入地狱。在这种说教的关照下，基督徒失去了自己救赎自己的能力，把救赎的希望寄托在上帝的恩典上。“从本质上看，基督教以‘博爱’为名的慈善看作人类进行自我圣化并接近上帝的方法和途径。慈善也是对上帝和耶稣的信仰而派生出来的一种品质。人要在灵性上净洁自己，才配得上做上帝耶稣的子民。这就是基督教的慈善观。

通过基督教与儒家慈善观的比较，可以看出儒家是将慈善作为一种自律要求，受到内在道德力的驱使，行善与否是

个人的道德操行，无强制性规定。中国古代的儒家传统特别强调慈善的道德教化功能，行善不过是良心上的满足，没有将慈善活动转化成一种本能意识，“本能地从事实际的慈善活动，不管何时何地，都自觉地要求有机会展示这个本能——这种心理状态中国人完全没有。西方的基督教则将慈善作为一种他律要求，教徒有一种恐惧感，有一种外在强迫性，行善与否会有截然不同的来世。因而，基于宗教基础上的慈善要比基于道德上的慈善要昂扬的多。

西方国家的慈善事业最初主要是由教会发起或举办的。宗教规定救助贫民，认为教士保护孤儿，照顾寡妇，帮助老弱病残，既是教会本身的义务，也是死后免遭天谴而使灵魂得救的方法。

16 世纪，英国亨利八世开始规定征收救济品，由地方政府分发救济贫民。伊丽莎白女王于 1601 年制定济贫法，规定政府利用税收举办公共救济事业，确定教区为所在地之居民充实救济经费，为不能工作的人和儿童准备粮食，为体力健全的人准备工作，救济无力自理生活的人。

德国于 1788 年开始实行汉堡制，将全市分为若干区，分别对贫困者实施救济，或介绍职业、医疗疾病等，并设中央办事机构，总管全市救贫行政事务。1852 年开始实行爱尔伯福制，对汉堡制加以修改完善，各区再分段，负责对段内的贫民进行经常性调查，按需给以补助，并办理职业介绍，

以及对游民进行管理训练等。各市设有全市性的赈济组织。在此期间，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的各类慈善组织相继成立。英国于 1869 年在伦敦成立慈善组织会社，其他城市相继仿效，接着扩展到了美国。

基于基督教思想的传统，今天的西方发达国家慈善不仅是一种事业更是一种文化，成为西方人生活的常态。盖茨捐款只是其中的典型。发达国家慈善事业的广泛发展是建立在人们对“慈善”二字的深刻认识之上的。例如，英国人认为慈善的含义在于只是奉献，不求回报；慈善的目的是使接受资助的人从此改变他们的生活和命运；慈善事业不应该是富人良心发现时偶尔的施舍和恩赐，而应该是每个人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对他人的同情与关爱；慈善事业的最终目的不在于给予了多少，而在于有没有一颗同情和善良的心。

美国“慈善革命”及对我们的启示

每一次历史的巨变，伴随着财富的快速积累，都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巨富。一位旅美作家写道：西方的富人在富起来之后首先要通过乐善好施和厉行节俭来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获取社会的尊重，这种意识在后来逐渐演化成了统治文化，主宰现代上流社会和中产阶级的道德。于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富人自己花钱小心翼翼，但给社会捐款则争先恐后。

的确，这种情形尤其在美国，更是常态。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新兴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发育了巨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财富，而且，也导致了一场慈善的革命。这场革命自美国发起，不久即席卷全球。在这场革命中建立的新观念、新制度、新结构迄今仍然影响着整个世界。

美国现代慈善思想的发端应该是卡内基著名的文章“财富的福音”的发表。卡内基在这篇文章中所倡导的对待财富的态度以及处理财富的方法，从思想上对现代慈善基金会的兴起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并对后来的慈善家们产生了巨大影响。卡内基作为白手起家的财富拥有者，具有超越金钱的生活体验和价值意识。卡内基阐述了他财富理念的两大原则。第一个原则是财产所有者有道德义务把他们合法拥有的一部分财产交还给社会。这部分财产，称为“剩余财富”。在卡内基看来，剩余财富是一个人在私有产权的保护下合法获得的财富。这种财富不是用于投资，创造新的经济资源，提高就业的“资本财富”；也不是维持家庭生活的基本财富；而是超出家庭需要又不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闲置财富。在卡内基看来，“剩余财富应该被看作是其拥有者为了社区的利益所接受的神圣信托”，在道德上不应该被其法律上的所有人所拥有。第二个原则涉及到如何执行这一“神圣信托”。这

一原则要求那些富裕的人必须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把所拥有的财富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散尽。为此，他们必须在专家的帮助下系统研究自己的捐赠对社会的影响。这样的捐赠不能以遗产的形式留给社会。他必须亲自履行这一责任，使每一分钱的捐赠都最大限度地增进社会的利益，而不能死后把这样的责任推给别人。卡内基写到：一个人死后留下巨大遗产，不论用于怎样的工艺用途，都不如生前就处理。总有一天，公众会给带着巨额财产死去的人刻上这样的墓志铭：“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

这一时期对美国慈善思想与慈善基金会发挥重大影响还有另一位亿万富翁约翰·D·洛克菲勒。老洛克菲勒有一句名言“尽其所能获得，尽其所能给予”是对慈善思想最深刻的阐述。在这种思想的感召下，1907年成立的“拉塞尔·塞奇基金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慈善基金会。1911年，卡内基创立了卡内基基金会，随后，以洛克菲勒、摩根、福特这些超级富豪为代表的一大批企业家，回馈社会的意识高涨，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基金会，对美国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工业经济的大发展，迎来了美国历史上慈善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到20世纪90年代，在克林顿总统任内美国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以

知识经济为龙头的资本经济的繁荣造就美国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新一批亿万富翁，也使美国出现另一个设立慈善基金会的高潮，在近 20 年美国新成立了 4 万多家慈善基金会，到 2005 年达到 6 万多家。去年，世界第一富豪盖茨决定两年内淡出微软公司的业务，专力从事慈善事业。世界第二富豪、“股神”巴菲特决定向慈善基金会捐资 370 亿美元。他们认为从社会获取的巨大财富必将有一天重归社会所有。当个人财富已扩张到惊人的规模时，处理这笔财富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它回归社会。

慈善基金会之所以兴盛于美国有其独特宗教、文化和社会背景。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催生了美国的现代慈善基金会的发生和发展。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美国的文化也像其人民一样呈多样性，但其主流文化是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中的基督教新教徒所信奉的宗教价值观。新教伦理哺育了近代西方企业家的崛起。从企业家的产生看，新教伦理使他们不仅获得了追求财富的合法性，使其聚财活动受到上帝的恩宠。从工人来看，它使工人认为劳动是一种天职，是获得上帝恩宠的惟一手段，从而使其成为有节制的、态度认真、工作勤勉的劳动者。最具有实践意义的是，它把“为上帝努力赚钱”和“把所有的钱分给穷人”同时作为上天堂的条件，既使经济增长保持强劲动力的动力，又使社会在经济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保持和

谐。现在看来，要实现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解决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重要了。

在美国文化中，特别崇尚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和自由发展。受这种文化的影响，美国的富翁们不愿通过纳税而将自己的财富交由政府来支配，他们认为政府是低效率的，将财富交给它会造成浪费乃至腐败。他们更愿自己亲自或由自己信得过的社会精英来管理和分配自己的财富，这样更能使他们的财富发挥效用，更公平，也更能体现捐赠者的意志。

经济的繁荣为创立慈善基金会提供了经济后盾。宗教文化传统为现代慈善基金会的兴起奠定了思想基础。社会背景成了富翁们把钱掏出来的外部压力。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两次经济增长，一次是 19 世纪末卡内基的时代。另一次则是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盖茨和巴菲特的时代。美国历史上最牛的四次股市有三次是发生在这两个时代。每一次急剧的经济增长，都产生了高度集中的财富，与此同时，在美国社会的另一端，出现了一个与富豪相对照的贫民阶层。他们的工作与生活条件恶劣，收入极低。当年梁启超先生看到这种巨大的反差后曾写到：“杜诗云：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吾于纽约亲见之矣。”贫富差距的过大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如在 1873 年到 1897 年间，美国先后发生了三次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又导致

社会危机，工人农民的社会运动规模空前高涨。

面对风起云涌的政治形势，市场经济最大的赢家如卡内基、盖茨和巴菲特通过慈善事业来处置这些巨额财富以回应这样的挑战。因为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不出来负责重新分配自己受托管理的财富，美国要么选择由国家来进行财富重新分配；要么建立一个由世袭贵族所统治的等级社会。那种小政府治下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就无法维持。美国社会中的现代慈善基金会，就在这样的内外力作用下开始兴起并发展。

新一代的慈善家了解到传统的慈善事业缺乏商业导向的经营，特别是非透明化运作、高额的管理费用、欠缺测试和评估标准，以及基金会的赞助只注重短期项目很少考虑受助机构的可持续发展等等问题。从而萌生了利用自己所熟悉的商业模式导入公益事业，应用资本精神改变现状的想法。他们以灵活的方式利用资源杠杆作用使其发挥最大效用。例如提供诱因来吸引合伙人，藉此获得赞助资金并且将这些资金发展为长期、稳定和有收入的基金。建立网络也是另一种资源杠杆作用的方式，全球慈善网络（Global Philanthropists Circle）透过网络方式集结世界 20 个国家的 50 个富有家庭，让他们能够彼此交换想法和经验共同找出解决贫困问题的方法。

在美国，企业和企业家把钱捐给各种各样的基金会组织，

由他去完成一切。无数的企业家、基金会构筑成了一个庞大的社会服务体系。美国现有基金会 6 万多个，2005 年慈善捐助达 2602.8 亿美元。美国慈善基金会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影响之广，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慈善基金会所不可比拟的。

慈善事业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我参与了一个推进农村社会保障的运动。当时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农业生产责任制刚刚兴起。在当时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大批劳动力迅速脱离传统农业向其他非农产业转移，社会生活节奏明显加快，人的寿命延长。生产过程的社会化、专业化也改变了家庭的职能，原来由家庭承担的一些义务，转而由社会承担。原有的一些由集体承担的保障内容，也需要在新体制的框架内找到适当的替代形式。社会保障是当时方兴未艾的农村工业化进程中必然出现，也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当时认为，中国农村有两个方面的特殊情况“第一是存在着过分庞大的人口和由于控制人口而产生的人口结构失衡状态，以及随着人口老龄化而来的社会负担过重的时期。第二是已经存在几十年的城市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保障意愿的影响。这两种因素再加上前面讲的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所产生的社会保障需求，就是在农村

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紧迫性。”²⁹ 当时在北京、天津、江苏、广东、浙江、福建、上海、辽宁、山西、安徽、河北、江西、湖南、湖北、内蒙等省市自治区都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一批村、乡单位的农村社会保障试点方案，其中多数得到实施。现在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一些概念，如“四二一”结构家庭等，就是在那时提出来的。当时的一些预见，如改革过程中的动力机制和制动机制不匹配可能导致严重社会危机，很快被证明是准确的。当时提出的基金型保险型社区型社会保障体制目前正在实践和完善中。作为这次探索的成果之一，是民政部和各级民政部门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农村新型社会保障制度的机构（这个机构后来成建制转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当时领导和支持这项探索的前辈有崔乃夫、许承琦、赵悌、袁方、朱传一等，参与调查及方案设计的主要有唐钧、李葆义、陈良谨、陈洪、陆学艺、孙建勇、邹骏成、高振荣、张朴、卢德之、朱红、熊学刚、罗本考、程为敏等。积极倡导和推动我们探索的崔乃夫，也是我国新时期慈善事业的主要推动者和领导人，现在的中国慈善总会和社会福利彩票，都是在他的推动和领导下建立、开展推行的。农村基层社保城市社区服务福利彩票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城市基层和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对推动中国城乡基层的社会转型和制度变化发挥了重

²⁹ 崔乃夫《为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的雏形而努力探索》，《农村社会保障探索》序言，课题组编，湖南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要作用。他们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福利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先行者。

进入 21 世纪以来，无论欧美还是亚洲国家，都兴起了大规模的企业家慈善捐赠活动。以至有人惊呼，这是一场慈善革命。而现在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历史上最急剧的财富增长，经济的强势带来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同时中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贫富悬殊、社会保障不健全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国家明确提出了全面构建和谐社会这一长期发展目标。慈善事业是完成这一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慈善业的发展却严重滞后，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以及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极不相称。一方面，我国目前需要救助的人口还很多。目前我国需要社会救助的人口超过总人口数量的 10% 以上，达 1 亿多人。另一方面，我们的国家救助还不够，这跟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社会制度不完善和不成熟有关。同时，社会救助也很不发达。有资料表明，中国人均 GDP 与美国比较相差 38 倍，而我国人均慈善捐款数额与美国比较则相差 7300 倍！虽然近来有所发展，但变化不大。慈善捐献相差这么多倍，绝不单是经济实力上的差距所能说得过去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贫富悬殊对社会心理的负面影响，强化了社会的仇富心态，影响了社会和谐发展。究其原因，一是民众慈善公益理念尚未形成，企业捐赠积极

性不高。据最近一项调查表明，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有90%从没参与过捐赠。二是慈善事业未能得到全社会尤其是富裕群体企业家们的认同和支持。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私募慈善基金只有5个，而慈善机构整体募捐能力较弱，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较差，具有影响力的基金会更是少得可怜。三是制度设计和慈善立法的不完善，导致一些有意愿的企业家想做而未做。

慈善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文化。历史上，中华民族不仅向以勤劳朴实、智慧勇敢而闻名，还以扶危济困、奉献爱心著称。在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体现资本精神的以美国为先导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家慈善更值得我们去学习。在当今，需要我们的企业家勇敢地站出来，去承担社会责任，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慈善事业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目前仍属于初级阶段，少数发展较快的省、市也只是刚刚具有了慈善事业的雏形。据2004年底统计，中国内地100多家慈善机构全年募集的善款总额约为5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0.05%；而美国当年的善款总额占GDP的9%。两国的善款总额虽不能简单类比，但中国善款数量确实较低。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慈善宣传工作的手段和力度不够，企业和公民对慈善事业的认知度、参与度不高，经常主动捐赠的人数很少。此外，专项的

慈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迄今为止，中国没有专门的“慈善事业促进法”，加之税收优惠政策不到位，激励作用不明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种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奔天堂，人们正在直奔地狱”——150年前，狄更斯在小说《双城记》的开篇里这样写道。

从20世纪末开始，企业公民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可。企业公民是指：企业是社会的一个主要部分；企业是国家的公民之一；企业作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之一，在创造商业利润的同时，还应积极承担社会公民的责任，以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方式来回馈社会。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的慈善捐赠是调节贫富差距的平衡器。国际上一般认为慈善捐赠是“第三次分配”。该理论认为，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称为第一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收入分配称为第二次分配；而出于自愿，在习惯与道德的影响下把可支配收入的部分或全部捐赠出去称为第三次收入分配。第三次分配是人们自觉自愿的一种捐赠，它所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无法取代的。客观地说，中国政府在实行第二次分配方

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短短的 20 多年消除了 2 亿多贫困人口。然而，从近年来贫富差距扩大的现实也可以看出政府有失灵的一面。政府需要兼顾和平衡各个阶层和不同群体的利益。虽然政府在提高税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方面还有潜力，但其阻力与难度也可想而知。而基于民间自愿捐赠实现的第三次分配正可以大有作为。如果说第二次分配是第一次分配的补充，即政府弥补市场之不足，那么第三次分配则是第二次分配的补充，即民间捐赠弥补政府之不足，以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另一方面，慈善捐赠可以构建企业竞争优势。开展慈善捐赠等公益事业对企业来说是优化配置资源、获取社会资本的一种新理念。企业与社会发展需要配置有形与无形两种资源，而慈善捐赠等公益事业，是企业配置道德、信誉和形象等社会无形资产。也是企业主动适应社会的反映。所谓“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就是从配置无形道德资源意义上讲的。厚德载物，这是企业生生不息、做大做强、生命长久的根本保证。居高声自远，这也是基业长青、做成百年老店的保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慈善对企业、企业家和社会是一种“多赢”的选择。既能促进社会和谐，又能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还能给企业家带来美誉。

中国的慈善事业近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中国企业家经济实力成长速度的比较来看，或者从国际比较来看，中

国的慈善事业还有很大差距。中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来筹集的十多亿元善款中，来自国外的占50%左右，来自港澳台的占10%多点，而中国内地捐款只占30%左右。连续十几年排名世界首富的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在过去的几年里一共捐出几百亿美元，相当于他净资产的一半以上。很多发达国家享受减免税待遇的慈善公益机构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家，其掌握的资金总额占到GDP的5-10%，而中国目前的慈善公益机构才100多家，而且绝大多数是“官办”的，掌握的资金总额还不到GDP的0.1%。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存在的巨大差距，也说明中国在发展慈善事业方面还有巨大的潜力。

慈善的核心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是对社会制度的完善。在资本精神的引导下，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外相对完善的慈善机制经验相结合，来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慈善事业。我们才能更为从容地理性思考我国的慈善事业，才能探索出解决慈善事业现实难题的正确思路。现代中国的慈善文化只有从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吸纳精华，又借鉴西方慈善文化中的人道精神，方可有中国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

进入21世纪，慈善已从扶贫济困、赈灾援助、社会福利的领域扩展到关爱自然、关爱地球、关爱全人类，慈善事业日益跨越国家和地区，成为更具有和平、互助、进步的世界性的重大行动，可以说，慈善已经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密切相

关。中国传统慈善文化必将随着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富有更加深刻和广泛的国际含义。中国传统慈善文化要发展,就必须与国外慈善文化交流,必须融合国际慈善文化中的慈善意识、慈善体制建设、慈善组织管理、慈善资金运作、慈善法律支持等方面的内容,必须获得来自国际慈善资金和慈善项目的支持,必须为海外关心中国慈善文化发展的机构和人士提供周到而细致的咨询服务。

现代慈善事业的理念和原则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思曾说过,行为是由制度决定,而制度又由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共同构成,其中,正式约束是国家的宪法法律等,而非正式约束是指一个国家的宗教、文化、传统、习俗等方面。尽管正式约束非常重要,但决定制度特征的更主要是非正式约束。发展慈善事业,不仅需要善心,更需要全新的财富理念、科学的投资方式和规范的运作机制。

人类长期实践证明,体现这一目的的最佳手段就是建立符合资本精神的慈善基金会。关于慈善基金会的运作,我认为一定要遵从五个原则:

一是诚信原则。古语云:人无信而不立,诚信可以说是慈善事业的生命,也是我国目前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

最大的问题。

最近被媒体曝光的胡曼莉事件就是一个影响非常恶劣的例子，一度被视为中国民间慈善象征的胡曼莉的形象被戳破了。有关部门的审计显示：2004 年海内外好心人对孤儿学校捐助 120 余万元，账面上只有约 2 万元；胡曼莉把约 33 万元社会捐款说成是自己的个人捐款，不据实列出开支的数额也达 33 万元；胡曼莉对十余名孤儿投了 28 万余元的商业保险，在财务上却隐瞒了分红，也隐瞒了五年后可以全额返还的事实。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爱心和诚信基础上的事业，只有诚信才能唤起人们的爱心，而诚信的保障需要通过法律、政府的力量来实现。因此，诚信原则一方面指的是基金会的出资必须到位，基金会的捐助必须到位，另一方面是对从事慈善工作人员的道德要求。捐出的款物如何得到正确管理和有效使用，是慈善家们最为关心的，确立善款必能善用的公信，显然是个人与企业捐款的前提。慈善事业是个神圣的事业，你连诚信都做不到，那不是对神圣的亵渎吗？巴菲特敢把 300 多亿美元捐给比尔盖茨，前提当然是对盖茨夫人品非常信任。

二是专业原则。专业原则主要有二层意思：一个是指基金会要有一套专业、独立的运作机制，由专业人员来进行管理。基金会管理的专业化，特别是负责财务监管和审计的人员应当聘请各自领域的专家来担当，并从基金会的管理成本

里拿出钱来给予高薪报酬。据介绍，国外的基金会管理成本大多在 10 - 15 % 左右。民政部发布的《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提出，未来五年内将大力推动有条件的大专院校设立相关专业，以培养慈善工作专门人才，为社会输送具有专业知识的慈善工作者。纲要提出，促进慈善从业人员职业化的工作还包括：大力推动慈善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加强培训教材的编写工作，设置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采取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方式，培训现有的慈善工作者，不断丰富他们的慈善工作知识，提高他们的慈善工作技能。

另一个是指捐赠的领域应该固定。当有人为了医疗卫生向卡内基要钱时，他就会告诉说：“去找洛克菲勒，那是他的领地。”因为他本人最懂得怎么兴办教育，建立公共图书馆，洛克菲勒则更专攻于资助医院。而盖茨最大的慈善开支，则是花在第三世界的健康和卫生方面。在美国有影响的大综合型基金作慈善事业非常专业，如福特基金会和比尔·盖茨的盖茨基金会，堪称专业化慈善事业的典范。美国基金会的专业领域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教育，每一个基金都有自己确定的领域，但是共同的投向必然都有教育，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成人教育乃至学科教育等等。美国的教育事业得益于慈善捐助是非常大的。如像斯坦福等名牌大学是私人捐助的，基金会每年都

拿出巨资捐助大学。

其次是医疗卫生领域，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之前，就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研究医学科学的前沿，这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特点。另外一方面是公共卫生，培养护士。培训两年，到农村缺医少药的地方，在中国也培养过。比尔·盖茨把重点放在艾滋病防治上，已经捐了几十个亿，在非洲和亚洲为重点进行活动。它有一个响亮的口号：“让我们的下一代活在没有艾滋病的世界里”。

再一个是社会科学研究，因为自然科学的发达，社会财富的增加解决不了人类的各种苦难，比如说 1929 年的美国经济大危机，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基金会就出钱，资助了很多社会科学的研究项目。

三是规范原则。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基金会，都必须是操作管理规范机构。卡内基在《财富的福音》中说，花钱所需要的智慧和才能并不亚于赚钱。以制度保证基金会规范运作，是西方国家的普遍做法。在美国，政府支持社会办慈善事业，但同时政府对慈善机构的界定及其财务活动有一套完整、规范的管理办法。在现代法治社会，依法创设基金会，严格依法规范运作。为了基金会的规范运作，各项工作必须有法可循，并得到很好的执行。现在我国的民营经济有了一定地位，民营企业家也享受国民待遇。不少聚集了财富的有志之士，想捐点钱来做点好事的，可是这个钱要捐出来

不是那么容易的，你捐到哪儿去，怎么操作，要有一套规范，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加强慈善事业的立法工作，要有一套制度的保证，规范操作。你不能够说人家捐了钱，不知道它干什么去了。当前中国慈善事业之所以难以健康、快速发展，除了观念问题，公众认同问题等之外，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的缺失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这些法律空白如果不能得到填补，慈善机构或个人就难以进行慈善活动，甚至可能还会“出事”。健全慈善法制建设，仍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和重要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郑功成近年来多次呼吁慈善立法。他认为，“中国慈善机构欠发达，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滞后，根本的原因不在于经济发展的落后和慈善资源的不足，而在于法制的欠完备影响了慈善机构的发育与成长。因此，加快慈善机构与慈善事业的立法，在中国不仅具有必要性与重要性，而且具有紧迫性。”从全国来看，地方立法机关对慈善机构的法规建设还没有重视起来。中国慈善机构面临的主要法律问题有以下几点：有关慈善机构的法制规范层次低；要求慈善机构必须有业务主管单位，对慈善机构的独立法人地位造成了损害；慈善机构的运行经费缺乏法制规范；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尚未法制化；政府与慈善机构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规范等。真正有利于慈善机构成长的法制环境还未形成，这是制约中国慈善机构与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基

本、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2007 年 1 月，民政部发布《2006 年中国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称，慈善法草案已经起草完毕。慈善法将会加强对社会公益慈善组织的监管，提高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同时一些慈善机构也积极地在捐赠过后的信息反馈、效果调查等工作方面作着努力。相信不久的将来，慈善家们的乐善之举会在完善法律制度下，通过更多的渠道去实现。

四是透明原则。这是指基金会资金的使用一定要公开透明，并要接受社会 and 政府的监督。国内一些慈善机构在捐助善款在接收和使用上，缺乏完善的监督追惩措施。捐款能否得到公正的监控和公示？捐款的来源、流向、使用情况能否及时准确地告知民众等这些捐款者应该知道的信息并没有公开，捐款者的知情权被忽略了。更令人担心的是善款被一些无良的基层官吏借机中饱私囊，贪污浪费，与其让人挥霍还不如不捐。只有真正建立起企业、公益组织、媒体和政府有效透明的合作机制，我国的慈善事业在公开透明之中才能得到更好发展。根据联邦法，美国的税务局通过三种方式来监督慈善机构的动作，一是慈善机构提供的年度报表，包括年度收支明细账，其付给董事、执行官、骨干雇员和五个收入最高的员工的薪酬等等；二是通过审计慈善机构的财务和经营状况，审计对象每年会有不同侧重；三是通过评估对违规的慈善机构给予处罚或罚金，最严厉的处罚莫过于取消一

个组织的免税资格——这无异于将该组织判了死刑，不过这种处罚很少使用，更常见的是处以罚金，而且受到处罚的是参与违规行为的个人而非慈善机构。在胡曼莉事件中，美国老太张春华七年前发现胡曼莉善款私存，借伙食费、教育费敛财，在财务上作假，把孤儿作为发财工具等问题后，就开始了举报与揭发。遗憾的是，有关部门未能及时审计、调查，致使这一事件至今才水落石出，对我国慈善事业造成了巨大伤害。必须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机制，使基金会工作透明化，公开善款去向。公开、透明是公益组织的关键，只有这样才能体现慈善机构增强善款运作规范性和透明性的决心和信心。

五是高效原则。基金会的运转要高效，同时基金会的资金在保障安全性的前提下，也要做到增值高效。如同富兰克林所说：“慷慨并不是意味着多多地捐赠，而是明智地捐赠”。巴菲特把钱给了盖茨基金会，是因为盖茨基金会是最有效率的慈善机构。这和他做股票生意的逻辑一样：一定要把钱交给最称职的经营者。在他看来，这不是他自己的钱，这是社会的钱。花得没有效率，等于自己渎职。因此慈善组织应将慈善捐赠视为社会投资，像企业家重视经济投资效果和效率那样重视社会投资的有效性，使善款真正做到善用。

在不影响企业成长的前提下，拼命地把钱投入到慈善事业，这是资本精神在企业家身上的具体体现。慈善基金会的

发展，不仅帮助了社会底层“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且，为企业家走向崇高，反哺社会提供了一条科学的道路。慈善家把一部分财富转移给穷人，对整个社会来说，所增加的效用要大于减少的效用，从而会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从这个角度讲，科学的慈善事业也有为“富人着想”的功效。

第八章 资本精神与 21 世纪中国

仅有亚当·斯密是不够的

亚当·斯密把中国(19 世纪以前) 视为重农主义经济体制的典型。他对中国不能重视商业的发展表示十分惋惜。他说：“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允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际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上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

上的各种改良。”³⁰亚当·斯密的这一份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建议书”，被封存了 200 多年。直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仍在把大量城市人口，其中包括知识分子、工商业者、技术工人，迁移到农村从事原始的农业劳动。但这位英国思想家的伟大建议并没有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中国自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的改革，在有意无意之间，在逐字逐句地实行着那份两百多年前用西方文字描绘的蓝图。当历史用它的方式去除了中国神秘的面纱之后，人们发现所谓“摸着石头过河”的石头，竟然是亚当·斯密。经过短短的三十年，斯密所预言的那种制造业的繁荣就出现了。21 世纪初的中国，已经被称为“世界工厂”。

亚当·斯密当然是正确的，因为他的药方被实际发生的历史证明有效。但问题并不能说到这里为止了。有两个问题，一个在此之前，一个在此之后，需要更充分的说明。前面的问题是，自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就在学习西方的经济器物技术等等，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之前，可算是一个高峰。但这一次的学习并没有成功。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在过去的两千年里，日本一直是中国的学生。刚刚进入 20 世纪，八国联军打来，中国又大败。到“九·一八”时，中国更面临亡国的危险。山河震荡，群情激昂，中国进入了一个革命的年代，每一寸土地都在燃烧。中国在努力向西方学习，却一再被西

³⁰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4 篇 2 章，中文节选本 180~181 页，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 2002 年版。

方大败，落得个头破血流的下场。中国人的学习不可谓不认真，态度不可谓不诚恳。学技术不够用就学经济，学技术学经济也不能解决问题就学政治，民主共和，统统拿来。但所有的学习似乎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果。贫穷落后没有赶走，富裕幸福的生活没有到来，危机的警报没有解除，争斗和战争一刻也没有走远。我们仍然必须面对似乎无穷无尽的痛苦和失败。出发的时候一片迷茫，到头来还是一片迷茫。正所谓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中国人似乎不断进入鲁迅的情绪当中：最大的痛苦是看不到希望的痛苦。正是这种深入骨髓的挫折感，使鲁迅发出诘问：中国人正在失去自信吗？这个问号，深深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底。

对于中国近三十年的经济成功，世界始终半信半疑，怀疑和讥讽时刻伴随着我们。然而最不相信的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最清楚，不管表面上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我们的外面可说是面目全非了，但我们的里面，我们的内心深处没有变。就像是风暴中的大海，海面上波涛翻滚，下面却仍然是一片平静和黑暗。我们的城市变了，我们的乡村也开始变了，我们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甚至政治生活都发生了明显的甚至是巨大的变化，但我们的心没有变，我们的灵魂没有变。有时自己都会怀疑，我们还有没有心，有没有灵魂。看来，仅有亚当·斯密是不够的，他只解决了表面上的那些问题。贫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也是心理问题、

文化问题和精神问题。财富的增长并不能使迷茫的灵魂明朗起来，也不能像他所断言的那样带来社会整体的幸福。财富不一定能带来家庭的和睦，更遑论社会乃至人类了。

由此产生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还需要和愿意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吗？

现实：发展中的危机

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这样的分配格局所包含的矛盾，随着财富的增长越来越趋向恶化。事实和历史都表明，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会产生各种严重社会问题，最终倾覆增长的列车。改革开放初期那种绝大多数人都受益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利益分割的时代已经到来。上个世纪末以来，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劳动关系严重失衡等问题的暴露，表明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代已经应该成为历史，而促使全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走向共同富裕的时代应当尽快到来。而这个后改革开放时代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其根本性的任务就是要让全体国民合理地分享到国家经济发展的成果。

贫富不均导致的社会矛盾加剧：经济的增长同时也使得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农民的收入不能说没有增长，但其增长幅度无法与城市人口的收入增幅相比。在东部与西部、

北方和南方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这种不平衡。

如果不能很好的解决贫富差距过大、劳资关系失衡以及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矛盾，社会矛盾激化的趋势就难以控制，而这会给整个国家的健康持续发展带来严重的危机。危机差不多可以说已经到来了。

教育危机：中国教育投资不及非洲的乌干达，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还对初、中等教育征收高昂学费的大国（其他主要国家都是免费向其国民提供）！中国大学四年学费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 41 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日本的 3 倍！

发展改革委通报 2006 年价格举报案件前五位分别集中在教育、交通运输、医药、房地产及物业管理、电信领域，这五个方面的举报占全部举报案件总数的 66%。在过去 6 年中，教育乱收费有 5 年在各类价格举报中位居第一，有 1 年位居第二。因为近年来教育乱收费已引得民怨沸腾，相关部门屡屡誓言坚决遏制教育乱收费，但是教育乱收费的态势没有得到好转，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公众对教育乱收费痛心疾首，一些官员却与教育机构成了利益共同体，致使乱收费的学校有恃无恐。³¹

社会保障问题：中国科学院 2007 年向政协提交的报告显示，中国政府健康、医疗福利预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

³¹ 《市场报》2007 年 4 月 4 日报道

(GDP)的 2.7%，不但低于巴西 (7.9%) 和印度 (5.8%)，而且还不如非洲国家赞比亚 (5.8%)。在公务员不断增加福利时，农民和一半以上的城镇居民连最低的医疗优惠都享受不到。据一位原卫生部副部长称，中国百分之八十的公共医疗资源被提供给公务员，而九亿农民几乎没有任何医疗社会保障。³²2007 年 4 月，多家媒体报道了湖北省一对年轻夫妇因为丈夫疾病无钱医治又得不到救助，相拥跳河自杀，留下了年迈的父母和 12 岁的孩子。当地官员称，没有解决这类问题的政策！中国的大中城市发达程度与欧美接近，但大部分农村和非洲穷国的农村在一个发展水平！

公务员腐败问题 :中国官方公布的其官/民比例目前达到了 1:28，政府财政的使用者相对于提供者的比例高于世界上所有国家，也高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朱镕基在卸任总理时曾指出中国面临的“三大定时炸弹”资产泡沫、供应过剩、公务员腐败问题。四年后，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再次出现了“公务员亡国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正式向全国人大提交的建议书中说，中国公务员去年浪费的公款高达一万亿人民币，从行政费用支出标准看居世界首位。在国家财政总收入中，公务费用支出比重从 1978 年的 4%增至 2005 年的 24%。同期支出金额猛增 140 倍，韩国一家报纸称，中国已为“花天酒地的公务员共和国。”中

³² 见中国网 2007 年 3 月 12 日《两会 任玉岭委员：医疗改革须重视五个转变》

国政府每年公务用车费用折算的金钱数目高达 2000 亿人民币以上。合肥大学副校长、政协委员刘光复说：“中央和地方公务员公车私用造成的浪费每年超过两千亿人民币，相当于总国防费。”用这笔钱可以发射 222 个“神舟 6 号”载人飞船。中国近 10 年贪官转移国家财产 500 亿美元到海外，且几乎永久性无法追回。中国政府每年公款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折算的金钱损失在 3000 亿人民币以上（2002 年为 2000 亿，等于建设一个三峡工程的费用）。³³

环境问题：经济增长的实现是以生态环境的巨大损失和大量的能耗为代价的。在中国每生产单位产品所消耗的石油、煤和其它原料远比其它国家多。此外，中国的经济增长机制是建立在使用廉价劳动力和廉价资源，以及向国外市场抛售廉价商品的基础之上的。日本在改变发展模式时，依靠的是高素质的人才和科学成果。而中国教育和科学的投入还只是维持在最低水平。中国的水问题、空气污染问题、沙漠化及石漠化问题、由环境破坏导致的气候问题等也都已经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

中国正在建设消费型经济。当年西方曾出现了“黄金 10 亿人”，他们消费大量商品和资源。如今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汽车市场了，要是若干年后中国也出现“黄金 10 亿人”那该怎么办？

³³ 见 2007 年 3 月人大和政协会议期间的官方报告和媒体相关报道。这些数字大多未经严格统计。

道德和精神危机：一个长期驻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说，在这个国家，人们被迫时刻保持警惕，以免陷入无处不在的陷阱。每一个人都是受害者，同时也可能是作恶者。普遍、深刻和顽固的信任危机困扰着每一个人。许多人不信任律师，也不信任法官。食品供应充满威胁生命和健康的伪劣品。许多工厂以惊人的速度往空气和水中排放化学有害物质，并设法逃避监督。权力和关系重于正义，社会紧张压力越来越大。腐败的官员一方面嘴边挂着共产党人的理想，另一方面为私利牺牲大众的利益。农民耕种的土地可以被一纸通知征用，朋友亲人之间为了短期利益互相欺诈。有专家指出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政治运动迫使家庭成员和朋友互相公开攻击对方，断绝最基本的关系。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由于各种政治运动的影响，已经恶化到社会可能达到的最低程度。

尽管普遍的不安全感难以量化，分析家认为这敲响了经济和心理的警钟，而且使社会管理更加困难。权力与财富的结合造就了各种黑色和灰色利益带，政府部门往往对其中各种弊端难以有所作为。

体制问题以及过时或故意扭曲的法律法规，鼓励企业或个人钻空子、走捷径。在一个法律法规不完善、又缺乏道德约束力的社会中，人们取利的动机使大量非理性行为产生。例如，造假严重的广告业是由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一个单位和中国广告协会规管的，而这两个规管单位都是政

府运作的。造假者和规管者有隐秘甚至是公开的共同利益。医药部门为了谋取高额利润，不顾病人的承受能力，滥开高价药品、高价检查。杭州一媒体用一瓶茶水送到十家大医院去化验，竟然有六家检验出“炎症”。这六家医院平均每家为这瓶“发炎”的茶水开出 600 多块钱的药品。为了谋利，中国的药厂每年“开发”出大量“新药”。这些药 90%以上是旧药换新名，但售价要翻几倍甚至几十倍。³⁴再比如，司机撞死人有赔偿上限，而撞伤人却没有赔偿上限。这导致了一些扭曲的动机和行为。司机马英豪在 12 月撞伤了行人，他碾轧伤者企图把他撞死，以期逃避高额的医疗以及赔偿费用。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马英豪死刑。有关部门通常通过恐吓来避免类似问题，而不是设法改变一个有缺陷的系统。这些问题也影响了中国一些公共品行业，包括医药、媒体、教育和文化等。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精神体系缺乏宗教或其他深刻的信仰，缺乏内在的制约，人们精神上是漂泊的。

再请教马克斯·韦伯

马克斯·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曾经存在过，但这种资本主义没有他所谓的富兰克林式的伦理色彩，缺乏西欧

³⁴ 2007 年 4 月 2 日的《新京报》即有三条关于医疗的消息：1、广东药品采购暴药价虚高，36.68 元报价 0.13 元成交，小标题分别为一药多名千余“新药”97%是“变脸”，报价虚高 13 种药品水分超 90%，中间盘剥 9 元成本卖 93 元（A15）；2、贫困产妇遭 3 医院拒收，事发昆明，产妇大出血险些丧命（A17）；3、卫生部坚决杜绝见死不救（A17）。

和北美资本主义的独特的精神气质，所以不能发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³⁵韦伯对中国的兴趣甚浓，有大量关于中国没有走上资本主义原因的论述。他认为中国没有一个新教这样的信仰体系，是中国缺乏现代资本主义元素的根本原因。他甚至专门写一本书来发布他对中国宗教研究的成果。

韦伯这种说法间接地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赞同。钱穆在《中国社会演变》一文中指出，春秋时期所有被称为“禁地”的公地实际上为封君贵族所有，不允许农民自由进入。封君贵族们则凭借这些禁地控制一切工商业。工人、工商业者只能依附于贵族。他们“并无自由财产，更谈不上资本主义”。钱穆并认为，这种经济政策影响深远，汉朝的盐铁官营，由王权制约经济自由的思想，渊源即在于此。³⁶

韦伯也认为中国曾经有过资本主义，但没有被他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那种独特的精神素质，即没有源于新教禁欲主义的财富进取精神、节俭和慈善精神、全民的专业精神等等。他认为这些东西促进了分工、资本及相应的文化、规则、市场体系的形成，使西方成为生产力进步的典范。

资本形成从动机开始。人增加财富的愿望有两种，一种是从自己的物欲出发，即以满足自我的欲望为目的的积累和投资动机；另一种是出于精神性的，或者是超越自我的动机。

³⁵ 参阅马克思·韦伯《入世修行》中文版 160 页关于雅各布·福格与富兰克林商业思想的比较。王容芬、陈维纲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³⁶ 钱穆相关论述可见《国史新论》第 7~9 页。北京三联书店 2001 年版。

所谓资本主义精神既是一种为神圣宗教目的的财富创造动机。人如果仍然是自己欲望的奴隶，是不能够超越自己的。

中国在传统上被认为较为注重精神，也不缺乏储蓄习惯，但是缺乏两者之间的联系，或者说这种储蓄与资本的形成较少相关。储蓄是资本形成的基础，但不等于资本形成。其一，中国人的储蓄，主要是出于对充满不确定性、无保障和灾难性记忆所导致的对未来的恐惧；其二，这种储蓄所积累的财富，通常得不到高效率的使用，且与储蓄者本人没有什么关系。中国人公认为是最热衷于储蓄的民族，但一般人又很难从自己存钱的银行得到足够的贷款，去从事较原来更大规模的经营和生产活动。到银行去存钱的人与到银行贷款的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那些使用老百姓一分一毛积累起来的钱财的，是一些与金融业有特别关系的政府机构及有此类背景的经济活动家。这个过程是高度封闭性的。照松巴特、布罗代尔等人的说法，这种“资本主义”与平民百姓没有什么关系。

由于对于金钱缺少宗教和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评价和达观态度，人们就难免过于拘泥于金钱的表面意义和对于物质生活有直接帮助的价值。中国金融业在商业活动上的保守性超过西方“资本主义”金融业，一般他只把贷款放给“熟悉”和“可靠”的客户。而这种标准往往并不是遵循商业的原则来确定的。实际上这类客户的商业能力和信用，由于有诸多

权力、政治、关系等等因素干扰，其实大成问题。而真正创新性的、高效率的经济活动，一般又很难得到银行部门的支持。

所谓新教伦理多多少少是表达在商业活动中，道德精神对物质欲望的超越，从而克服斤斤计较的牟利活动必然带来的狭隘和短视，使一个社会得到长远和持续的发展。在缺少这种东西的环境中，由于资本所有者、银行都缺少对金钱的道德超越，其行为就更多地表现出人性中的物欲和贪婪。这种情况普遍化、持续化，就演变成他们与真正为他们提供“资本”的人民的道德对立。中国有两千年抑商轻商的传统，其中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也有商人阶层缺乏必要的道德追求和自觉约束导致的来自民间的对立。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有钱人”大体上是一个道德评价甚低的群体。而且“有钱人”甚至会包括非商人的较高社会阶层，如官员、教师、医生、法律界人士等。近年来中国社会对传统上受到尊重的教师、医生等等，社会评价和受尊重的程度急剧下降，除了有人确实存在令人诟病的敛财行为之外，也因为他们在分配次序中的位次提前，被一般人民认为也算是“有钱人”了。深层的原因，恐怕也还是表现着“有钱人都不是好东西”的风尚。正因为金融业的这种保守性和商业阶层缺乏道德高度所导致的社会对立，使得真正的企业家难以产生和成长。即使有几个“民营企业家”一时出了头，往往也会被视为道

德异类，在各方打压之下垮掉。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中有所谓“前仆后继”的说法，听起来颇有悲壮感。实际上，纯粹或者主要是民间出身的企业家，即使有个别人积聚的资产规模已经大得连政府都难以忽视，也很难有持续扩张的动机和自信。如果我们真的期待中国的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就必须改变对真正具有经济创造性的人们的道德矮化倾向。这种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圣西门把贵族官员等等看成是法国社会的寄生者，他们对于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可有可无，而商人、银行家和工匠等一样，是“法兰西的社会之花”。

中国的企业家、银行业、政府和社会全部都要完成对财富及其创造者的道德超越。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强大的精神来源，来发动和完成这种超越。这种精神必须为一批大企业家的出现作好精神的准备。这种精神既是企业家的，也是作为企业成员的各种专业人员、技术工人的，还必须是社会各个阶层共同所有的。人们必须各尽所能、各守本分，共同为社会生产的合理进步而工作。这种精神必须为合格的企业家们不懈创造财富提供内在动力，同时还必须使那些拥有大量资财的人克制自己的欲望，过和财产远没有自己那样多的人一样的简朴生活。这不仅是为了资本的积累，更重要的是可以把经济优势转变为道德优势，避免由于财富的增长而造成社会的紧张和对立。

还必须大力培植人民的专业精神。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一篇第一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是这样开宗明义的：“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郭大力、王亚南译文）

被马克斯·韦伯视为新教徒职业道德宗教依据的禁欲主义，不但是资本家的职业道德，而且是劳动者的职业道德。

“对于新教徒归结到不洁生活名下的一切诱惑来说，劳动是一种特别有效的抵制手段，它的功效绝非是无足轻重的。”

韦伯进一步阐释，“除了粗茶淡饭和冷水浴外，用来抵御一切诱惑的药方，与用来抵制宗教怀疑论和道德上寡廉鲜耻的药方一样，就是‘尽忠职守’。不过，最重要的是进一步把劳动本身作为人生的目的，这是上帝的圣训。圣·保罗的‘不劳动者不得食’无条件适用于每一个人，厌恶劳动本属堕落的表现。”

中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托马斯·阿奎那和近代思想家巴克斯特都不同程度把劳动与人对上帝的天职联系起来。巴克斯特认为财富并不能使任何人规避上帝的“绝对命令”，富人也不能不劳而获，他们必须同穷人一样服从上帝的圣训。新教徒禁欲主义者认为，上帝为每个人都安排了一个职业，每个人都必须各守本分，辛勤工作，精益求精，以自己的工作来荣耀上帝。因为每一种工作都是上帝安排的，所以

每一种工作，每一个职业都是神圣的。工作变成了人回报上帝恩典的一种方式，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方式。既然是为了上帝而工作，那么勤勉、忠于职守、一丝不苟、每个人都以毕生的精力来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最好，便是对上帝信仰虔诚的表现，而对于那些有能力工作却靠乞讨为生的人，是不能容忍的。这种把劳动视为天职的职业观，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成为现代工人的特征。韦伯断言，“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³⁷

我们反观中国，上述那些有关一社会资本增长的各种因素中，有些是我们传统上已有的，有些则没有或很少。

钱穆认为，“低水准的必须经济，对人生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不必须的超水准经济，却对人生并无实际价值。而只有农业生产为人生所必需，乃最具低水准经济中所应有之积极价值者。”所以他认为中国人的经济观，是特别注重节与度的“以人生为主而以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经济观”。³⁸他还总结说，中国传统经济伦理重节制且重平均。其一，中国人重土地，以土地为根本。“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大学》）“德”在中国传统思想中

³⁷ 韦伯的上述论述见《入世修行》一书第32章《论职业分工与宗教责任》，第33章《财富意味着人履行职责》。王容芬、陈维纲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文版。

³⁸ 见钱穆《如何研究经济史》一文，《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7~5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

有超验性，其来源难以说明，有很大的包容力。这种由超验的道德理想而得土地，由土地而取得财物，由财物决定消费的人生次序，便是中国人经济伦理的基础。第二个特点是在分配上重平均。儒家原典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社会安定、生活安稳在伦理次序上优先于财物增长，稳定优先与发展。第三个特点重节度。“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二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欲望不可超过物质限度，人的欲望应当与物质的生产相持而长。这大概较为接近现代生态主义经济观了。

上述这些与新教伦理的节欲、平衡有相似的外在表现。如果作为经济行为的道德动机来考察，中西差别在于，以“德”、“天道”、“天理”等为至高者，比较玄虚，难以具有普遍的道德号召力和内在约束力，多以外力来推行；而以道成肉身的上帝为道德动机的原动力，比较具体可行，易于由个人从内在自觉约束自己的欲望和行为。至于部分晚儒把天道与“三纲六纪”相联系，以人为神，以人欲制人欲，更等而下之，难以服人之心了。人心既不服，当然就没有什么道德力量可言。中国财富创造增长及分配，多由人自然的欲望决定，又受农业眼光的局限，所以经济的繁荣只是数量的堆积，而缺少社会结构上、思想上、文化上、精神上的本质变化。中国两千年来，有商人，有资本活动，但资本精神的骨干——创造财富的内在超越性精神动力和人民的专业精神

没有形成，导致分工始终处于初级水平，生产力的发展也因分工的初级而难以跨越农业阶段。有论者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近一、二百年事。这其实是只看表面，未见本质，只看物质，不见精神，只看形式，不看内容的片面见解。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既要在市场经济的形式上广泛学习，迅速发展，更要注重我们内在的精神上的建设。徒有其表的市场经济，即使能够取得暂时的发展，也难以长期持续，甚至可能导致更深重的危机和灾难。

资本哲学

思想透彻才可能对行为有长久的指导力。资本精神必然与人类精神的最深处有确实的相关，才可能有透彻的意义。说明财富如何与最基本的人类问题发生关系，是我们的思想是否有这种透彻的标志。

人最基本的问题是生死问题：人何以生何以死，生从何处来，死往何处去？所有的哲学都是在为死作准备，所有的宗教都告诉我们生死的本质和出路。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那种精神的透彻性来自基督教。20 世纪死于纳粹之手的德国基督教圣徒朋霍费尔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祂是吩咐他来死。”³⁹这个死指的是圣经上所说的那个世俗的属世界的肉

³⁹ 见朋霍费尔《作门徒的代价》，安希孟译，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年中文版。

体完结。圣经的关于肉体完结的思想用“让死人去管死人的事”表达，指世俗的肉体生命没有任何永久的绝对的超越意义。肉体的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圣经和合本《传道书》1章4节）“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人也不纪念。”（《传道书》1章10-11节）《传道书》的叙述者所罗门王在人世间建功立业，尽享荣华富贵，但他从自己的成就中所得到的享受，他的“心之所乐”转眼即逝去。这个人间帝王在思考他的一切作为的最终意义之后，有了新的觉悟：“我察看我的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传道书》2章11节）所罗门思考的结果是，时间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义，丰功伟业没有意义，劳苦愁烦没有意义，享乐没有意义，一切都像风一样，吹过去便什么也不会留下。在所罗门所仰望的那位至高者看来，世间为我们所珍视的一切，都是虚空，都不是实际存在的。人就是得到了那一切，也还是没有真正生命的意义，因为人必死。个体即使得到了一切，还是没有超越死亡的生命，岂不是“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毫无意义吗？真正的有终极意义的生命，必须跨越死亡的鸿沟，到达永生的彼岸。上帝对人说，要得永生，就必须死，让这个暂时的在永远中毫无意义的生完结。世界、肉体、财物、事业等等，都是人去往真实生命的一座用完即弃的桥。

在这里的一切，在彼岸无从再见也无须再见；彼岸的一切，在这里无从验证也无须验证。我们所盼望的生命对我们自身来说是不可能的，这个可能性只掌握在上帝手里。在这里就是信仰的来源了。俄罗斯哲学家列夫·舍斯托夫说：“只有当人看不到任何可能性时，人们才去信仰。上帝意味着一切都是可能，而一切都是可能的，也就意味着上帝。”⁴⁰这就是基督恩典的意义。在领受它的人看来，世上所有的一切和这恩典相比，都微不足道。这就是新教禁欲主义者们甘愿舍弃一切财产的宗教依据。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导师，所罗门等则是他们的榜样。

前面说过，所有哲学最核心的课题就是解读“死”这个事实，哲学差不多就是“预备死”的学问，以穷究生死之理为永远的中心。宗教与哲学，遵循的是同一条思想路径，即以有限的生命去了解无限的存在意义。哲学一定要穷根究底，而生命有限的人又如何能够穷究那无限的实体？所以哲学注定是悲剧性的。宗教是设定了结果的哲学，它通过这个设定避免了哲学的悲剧性。它设定一个绝对的最高者，他超越一切现实，把不可见不可证的永久生命的盼望赐给了人，使被拯救者免于对生命的虚空的恐惧。为了这个盼望，现世的一切都是可以放弃的。现世的一切工作的意义，在于得到和证明自己配得这个恩典。“我看见上帝叫世人劳苦，使他

⁴⁰ 见《旷野呼告》作者序，中文版第17页，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们在其中受经练。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们心里。”（《传道书》3章10-11节）人在世界上的劳碌及从中得到的享受和快乐，同样是神所安排的。“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传道书》3章12-13节）所以人努力工作，享受生活尽管没有终极的意义，但同样合乎超越者的意志。至于超越者作这种安排的原因，是人所不能明了的。因为“上帝自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传道书》3章11节）正因为世俗劳动背后的这种神圣动机，使得获取财富这样充满功利计较、枯燥乏味的活动，成了如同那种“使大地充满奶与蜜”一般毫不令人厌倦的、酒神状态的活动。当人们怀着感激神明之心去工作时，当然会是一种随时可能创造出奇迹的状态。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愉快创造活动，是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文明发展的深刻动力。

如果我们来穷究“财富”、“金钱”、“欲望”、“享乐”一类概念的最根本意义，和我们穷究生命的意义一样，需要从表面的经验逐步向上走向事实的真相。从最初的经验来看，人获取财富的动机是肉体欲望。其实，这种经验就如同柏拉图“洞穴”比喻中的阴影。人被自己的欲望捆绑着，首先看到的是阴影，以为这就是真相了。因为人被捆绑，只能看见从背后投射过来的阴影，而这是他全部的经验，所以只能认定这阴影就是本体。追寻真相的过程如同一个人在黑暗的山

洞里沿着崎岖的路向上寻找阳光。追寻的过程是艰难的，但当他看到真理时往往更加痛苦，如同一个久囚山洞的囚徒突然看见太阳，那明亮的阳光会刺痛他的眼睛。数年前，湖南省有一位官员因为贪污数额巨大被判了死刑。他在临死之前无限悔恨地对人说：“良田万顷，日食斗米；广厦万间，夜眠七尺。你说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在他觉悟之前他看到的是钱财的阴影，却把这阴影当成真相。钱财捆绑了他，他一直做的是钱财的囚徒。当他看清了真相时，真理的光芒却连他的生命都熔化了。还有多少人的财富观，仍然如同山洞里的囚徒，是建立在阴影而不是真相上？⁴¹

圣经和柏拉图都把真理、本相、事实等比喻为阳光。新教伦理的哲学内核，来自旧约智慧书，按所罗门所说，那是朝向太阳的智慧。看透生命才能看透财富金钱，看破生死才能看透生命。生命的核心奥秘在于人的无限广阔、丰富的精神世界。康德把人灵魂中道德感的神秘来源与宇宙相提并论，黑格尔断言“精神不死”。柏拉图在《斐多篇》认为哲学是了解死亡本质，让生命为死亡作好准备的智慧。和圣经的作者一样，柏拉图把欲望看成是道德的对立物，认为必须用德性来对付灵魂中的欲望部分，人才能够使理性专注于对真理的沉思。在他看来，现实世界实质上就是“洞穴”中的阴影，摆脱阴影，了解真相的办法是脱离捆绑（欲望），面

⁴¹ 关于洞穴的比喻见柏拉图《国家篇》514A-519B，中文版《柏拉图全集》第二卷 510-516 页，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4 月版。

向太阳（真理、事实）沉思。沉思是向上寻求光的来源的理性之路，向上的理性导致德性。德性能使我们摆脱阴影的纠缠，既摆脱各种肉体的感知及由此产生的欲望对我们精神的影响。财产、金钱等，是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欲望的代表。只有用德性来战胜他们，才能不受干扰地向上注视，才有真正的智慧，才有可能通过沉思达到永恒存在的本体，才能找到生命的终极意义。

对财富的道德态度，作为人的道德实践，在西方思想传统中，有时甚至被放在比真理、事实更高的位置。善不但被看作是与真理、事实更高的实在，甚至还是真理、事实等的来源。柏拉图说：“善不是本质，而是比本质更加尊严，更有威力的东西。”（《国家篇》509B）这种超然的道德理性，被康德阐述为最高道德立法者——上帝。康德认为，人一方面有服从欲望的软弱本质，又有服从永恒道德命令的内在动机。上帝对人的救赎，即是唤起人的这种隐藏的动机，使人在道德上完美。耶稣基督通过自己的降生、受死、复活，成为永恒的道德楷模。道德律是康德实践理性的核心。新教徒热心于把资财散给穷人，就是在实践他们信仰中的道德召唤。

这种完全超出交易关系的物质牺牲行为，在早期基督教社团、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中，有悠久的传统。圣经中有关于这方面的大量记载。据西塞罗记载，亚里斯多德这样劝人

们去作慈善公益活动：那些有多余钱财的人，与其把它们用于挥霍，不如用来救济人们的急需，如用于向被围困城中的人供水。⁴²西塞罗是古罗马思想家和著名演说家，是慈善活动的热情鼓吹者。他说：“一般来说，慷慨施舍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胡施滥舍，另一种是仗义疏财。前者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浪掷金钱于宴请公众，广济普施，角斗表演、奢华的游戏、野兽格斗等等——这些浮华的事情只能使人们保留短暂的回忆，有的甚至事过则忘。而后者是指这样一种人，他们慷慨解囊，从强盗手中赎回被劫持的人质，或者替朋友还债，为他们的女儿准备嫁妆，帮他们获得或者增加财产。”他还说：“倘若把钱用于修建城墙、船务、港口、沟渠，以及所有这些服务于社会的工程，那么，这种支出就正当了。”⁴³这大概是西方最早的关于慈善思想系统阐述。可见新教徒禁欲主义者对待财富的态度，不但有宗教的根据，也有社会历史传统。

资本精神的核心是财富动机中的道德精神。在康德看来，为使“至善”的道德成为可能，必须假定一个更高的、道德的、圣洁和全能的存在。人的生命的有限性，决定人不可能达到终极性的目的。所以必须有高于人的道德立法者，才可能有确定终极道德目标的能力。道德不可避免地导向宗

⁴² 这个记载见西塞罗关于慈善行为的一次演讲。见西塞罗《有节制的生活》中文版 203 页，徐奕春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⁴³ 西塞罗关于慈善活动的言论，可参见《有节制的生活》一书的《施舍无止境，疏财有限度》和《努力施舍于不同处境中的人》两章，中文版 200~216 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教。⁴⁴康德进一步阐释道，人的道德意志是与人的肉体欲望相对立的。尽管人的“恶”时时搅扰人“成为更善的人”的道德意志，但“这一命令，仍毫不减弱地回荡在我们的灵魂中”，因为我们“使自己能够接受一种我们所无法探索的更高的援助”。在我们身上的“原初禀赋”中，“善的种子以其全部的纯洁性被保留下来了，不能被清除和败坏”，“这种存在于对道德法则的敬重之中的动机，我们永远也不会丧失”。圣经所表明的人类道德重建，“仅仅是建立道德法则作为我们所有准则的最高根据的纯粹性。”⁴⁵

按照圣经的表述，人所需的一切（在圣经中以“吃”象征）上帝已经全部给予。在《创世纪》中，上帝让人作为地上所有财产的管理者。由于人的贪欲，使人背叛了这财产的主人，被主人剥夺了“天上的财产”，便只能“终身劳苦，才能得吃的”，（3章17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3章19节）地上的财产是“死”（归于尘土），而天上的财产隐含的意义就是“不死”，是“永生”。人背叛上帝得到的惩罚是“死”，所以尘世的一切都是“死人”的，因为人必死。人在地上获取财产的意义是通过创造和舍弃，向上表达自己的虔诚和向善的道德意愿，以求得上帝的原谅，

⁴⁴ 康德相关思想见《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第一版序言》，中文载《康德论上帝和宗教》288~289页，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⁴⁵ 康德的这一论述见《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1篇1章总的附释，中文载《康德论上帝和宗教》348~349页，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重行得到“天上的财产”（天国、上帝的国、永生）。“天上的财产”完全由那位至高的道德立法者掌管，所以人在世间的善行可以向被康德和黑格尔共同称为“至善”的上帝，表达人的向善之心。正因为这种相关，获得和舍弃“地上的财产”便成为证明自己是上帝“良善忠心的仆人”的物证。由此，人舍弃“死人”的“地上的财产”，得到的恩典是永生之国的“天上的财产”。这就是新教徒禁欲主义者的财产观、工作观的最深刻道德动机。

中国人的精神建设与建设精神

中国面临着许多危机，但人的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可能是其中影响最广泛、最深刻、最具根本性，解决起来也最困难的危机。

生命就是运动，任何有生命的实体，如人、社会、民族、人类，都必须发展。发展是生命的基本形态，生命持续一天，发展就必然持续一天。生命体不发展了，不变了，那就是死。发展是有方向、有选择的变。对发展方向的选择，即生命运动的最终的目标的选择，是生命的最高智慧。什么决定这种选择呢？是理性。而人类理性的必然结果是道德。道德必然地具有超越性和超验性。一个人或者一群特定的人，都不可能自己给自己发布道德的命令，因为道德的来源是超越任何

个人经验的。对于其他生命体和他们的各种集合体也是这样。道德必然是超越的，不超越就不是道德，而任何人和其群体，由于其必然的有限性，都不具备道德的超越性。康德所说的至高的道德立法者，不可能由任何人去充当。至善是人可向往而不可能达到的境界，而只能由至善的道德出发才能找到生命永远正确的发展道路。所以，对于发展方向的选择，只能是一个随着人的道德完善不断加以修正的过程。反过来说，当人的道德出现危机时，必然难以对发展的方向作出正确的选择。所以说道德危机就是理性危机，发展危机，方向危机，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深刻最危险的危机。

资本精神在最本质的意义上讲，就是指社会物质进步背后的道德动机。它决定物质进步的方向，是财富增长的方向盘、发动机和制动器。这些装置通过人的道德意识，安放在每一个人的里面。这种发展是通过每一个人的道德动机变为人的行动来实现的。这是我们在 21 世纪最需要的东西，是中华民族在新千年里的伟大复兴的前提。

我们的资本精神从哪里来？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一从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最优秀道德精神里面来，二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道德、精神传统里面来，三是从我们时代的伟大实践及对这种实践的思想总结里面来。

这里我们认为必须要强调，这种创造与学习，是高度理

性的，最有效率的创造过程。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其中，得其下；取其下者仅得不入流而已。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最虚心的态度，最科学的方法，学最好的东西，然后把我们的传统和实践加以总结，融合锻造成我们民族的东西。这种融合绝不是简单的拆卸拼装组合，而是一个在最高道德目标指引下，深刻系统的目的和方法融合。我们需要的通过这种结合生出健康的婴儿，而不是一个怪胎。一个成熟的道德体系，和其他任何高级系统一样，其各个部分必定有其合理功能和目的，不能随意取消或者改变。如果我们不能深刻了解和重视这种统一性，把各个部分简单拼装，结果可能不是 $1+1$ 大于 2 ，而是 $1+1$ 小于 1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总结一下历史，失败的教训恐怕远多于成功的经验。

“最”是一个排他的、唯一的概念，从理性来讲，根本没有必要纠缠许多其他。当然这是有立场，有底线的。这个立场、底线就是中华民族整体的、长久的利益。只要站在这个立场上，守住这个底线，什么是最好的，我们就学什么；谁的东西最好，我们就向谁学；怎样做最有效率，我们就怎样做。日本基督教思想家矢原内中雄告诉那些想到中国传教的基督徒，要去中国传教，首先要站到中国人的立场，有中国人的民族情感。你必须是为了中国而传播基督，才有可能被中国人接受。这位日本人是深谙我们的“底线”的。

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资本精神的三个来源，一个底线。这

也应当是各个名族共同的立场。最合乎理性的选择必定是合乎道德的，而道德的本质是超越的，即超越个人，也超越民族，所以合乎道德的选择必定是共同的。道德使我们个人的利益不与他人冲突，也会使中华民族在增加自己的利益时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以及我们地球的生态、环境及全部物种保持和谐均衡的关系。如集中体现资本精神的慈善事业，就从来是没有国界的。试想，如果我们的对外援助都是由民间组织来做的话，可能更有效率，更受欢迎，也较少会受到受援国政治经济形势变动的影响。资本精神不但是发展的精神动力和道德平衡机制，而且是我们经济的道德基础，和谐、和平的内外环境的创造因素。

中国近 200 年来求新变革的过程，大体上是一条由外在形式逐渐向内深化的过程，由技术器物到经济法律，再到政治革命民主共和，再到文化精神、道德信仰。我们的视野不断扩展，境界不断上升，我们的在人类至高理性中发源的资本精神，会影响未来的中国人，影响未来的中国和世界。

后记

我的这本小册子终于写完了。对于那些等待着它，对它抱有希望或者有兴趣的人们来说，恐怕要让他们失望了。这与其说是思想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实践的结果。作为一件作品而言，它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远远不能说是完美，甚至不无粗糙、肤浅、混乱和片面之处。我深知它的种种局限。但出于许多朋友的鼓励，我还是先把它拿出来，以求得到大家的意见，并希望有机会改进。我相信，尽管有许多的不尽如人意，但思想是鲜活的，愿望是真诚的，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来表达我最深刻的关切。

我的挚友、合作伙伴、金融家李光荣博士，曾对我和几位友人说：我们成功与幸福的标志是二十年后还能坐在一起喝今天存放的茅台酒。我想这极有道理：第一，说明我们二十年后还健在；第二，说明我们那时还有能力喝这种好酒；第三，说明我们不管是否直接或间接在一起谋事，但心仍在一起且有着以喝酒而表达的激动的情怀！我们，我们这代人血是热的，心是相通的，对生我们养我们的这块土地是充满热爱与激情的，这本小册子就算是

我献给朋友点燃这种激情的一个火种吧！

有朋友告诉我“卢德之资本精神”已是网上的一个不算冷门的话题。网络时代的传播实在是快得令人惊异。感谢关心“卢德之资本精神”这个话题的众多朋友们，希望我们能够共同来完善它，更希望它能在实际的经济社会进程中发挥一些作用。感谢著名经济学家王松奇教授，为这本小册子写了精彩的序言。感谢我的博士生导师，著名伦理学家唐凯麟教授多年来给予的培养和指导。感谢我多年的朋友朱红先生，他多次参加了讨论，提供了关于基督教思想方面的意见，并核对了大部分引文。感谢我的学生黄震和陈世民，他们也多次参加了本书的讨论，并承担了许多具体工作。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夫人易向红女士长期以来对于我事业的理解和支持！

卢德之 2007年初夏于北京